

● 《书趣文丛》第六辑·序 ●

《书趣文丛》这一辑，是想编入一些海外学人的佳作。这方面，原应是名作如林，大可挑选，只是我们见闻有限，经营有年，第一批只编成五种。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不少作品，或找不到原作者和原出版者，或原出版人不愿转让版权，或因海内外言说处境不同而不得不割爱，如此等等。近年来，海内外虽然交通极便，贸易大盛，两者堪称史无前例，而文化交往却往往拘泥旧范，不易顺畅进行。此中原因不少，也不去多说了。

选书时，颇注意作品的意趣境界和可读性。这中间，自然还有一个老习惯在指使我们：重表达形式甚于内容观点。也就是说，喜欢文章写得意境高，文笔好，可读性强，而不大多去考虑观点如何。年来海外新秀颇多力作，倡言新说新潮，我们极为钦佩，只是写法奇特，内地暂时难有较多读者，不得不勉力割爱。或问：“重形式甚于内容”后，将置内容观点于何地？当然，“内容观点”必有一“底线”在焉。这是违背不得的，不然，我辈就没有了讨生活的本钱。但是，在这“底线”之上，宁愿多考虑表达形式。原因无他，外行（hang）与行（xing）商而已。因是学术上的外行，所以对观点十分宽容，决不强人就己，事实上，也没有不宽容的本钱。因属行商，时时处处要考虑读者的接收，无非让书的销路好一点。方今学者编丛书的日多，他们大多是积学之士，对文章观点之取舍自有确切标准”，相比之下，我辈自然只能走上藏拙一途，在形式上多做文章。这“形式”，就这套丛书言，九九归原，还是第一辑出书时交代过的，一个“趣”字。虽然为这一“趣”字，学者们又另有说头，我们且只将功夫放在自己所理解的“寻趣”之上，不细推敲了。

希望很快有另外的五本问世。如是，六十本的《书趣文丛》算是功德圆满。“趣”不“趣”的讨论大概由是可以告一段落。各方面的种种批评指正，谨承教，在此一并谢过。

脉望

一九九九年

●再见了 白山君·目录●

序言	1
滨德寿司店	7
房东太太	14
打工“大姐”	19
三个“工头儿”	21
弹子机下的悲剧	26
送报者“言”	31
可怜的“造”人身事故者	34
“底层”	37
不光彩的裸露	40
平凡人生	45
别一种“苦恼”	48
永远都不能脱却的印记	51
小草千千	55
附：心的歌吟	59
博士小影	61
寂寞的先生	64
乾嘉为“径”久为“舟”	67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70
“长安一片月”	73
永远的“乐天”	75
论文初步	78
难以逾越的大家	81
“命名”的思索	85
“到位”的思索	87
“印度情结”	89
“忧患意识”	90

“理想社会”	93
日本企业的“战时体制”	95
日本教育的“核心思想”	101
日本的“战争遗族会”	107
战争赔款的民间索赔	110
顽固的根本太郎	113
不协调的声音	116
读《日本人》和听日本人骂他们的政治家	119
新年的争论（上）	123
新年的争论（下）	132
再见了 白山君	139

●序言●

长短不齐的“杂录”三十六则，皆为记叙我滞留日本东京时的所历所感之作。

赴日六载，先是进修留学，后是工作研究，虽然头绪不少，诸事繁复；可说到底不外乎普通事与个人的一孔之见。鸿爪雪泥，固然使人眷恋；可又深知自己的这些东西，既少涉乎宏旨，亦恐不足为旁人道。当然，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归国前，一次与日本朋友的谈话，使我深受刺激；同时也启发我思考更多的问题，以及准备整理杂录。于是，归来稍定，甘冒简陋，把昔日零乱的札记短章，缝补缀连，竟敷衍成篇，记录在案了。这便是眼前的《再见了 白山君——东瀛杂录》。

那次谈话是在我们刚刚接待完几个中国学者之后不久。这位日本朋友是属于那种虽然相知不甚深，但却能使人信赖的人；平时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中国语和中国古代文学，业余时间则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活动。那天的谈话气氛本来是很融洽的，人也显得特别兴奋。可是谈着谈着，这位朋友突然冒出来一句：“你们中国学者，在进行交流的谈话中，假如能少谈些炸弹之类，那就更好了。当然，炸弹的事不是不可以谈；可总谈炸弹，只会招来我们日本人的反感。不能说说完没了吧？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呢？你们总不能置我们于绝地吧！”说完之后，他可能又觉得不大合适，于是急忙道歉，并“顾左右而言他”；没等我说什么，就赶紧打道回府了。

我知道这位朋友的谈话，主要是针对这次接待中的一次争论而言的。但我没想到，当时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立场上的这位朋友，其实内心深处也是赞同他们同胞的观点。

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凌辱的十五年（从“九·一八”至“八·一五”），以及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的灾难的五十年，留给中国人民的是太多太多的凄惨与痛苦。而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文学等等，所有这些学科又无不打上鲜明的那一时代的印迹；因此讨论这些学科的具体问题时，就很难避开战争、历史等敏感而尖锐的时代背景。不仅中国人要谈战争、炸弹，日本人谈起来也躲避不了这些问题。他们总说

的“战争时期”、“二战”等词汇，不就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吗？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说得，中国人就说不得呢！另外，说实在话，关于中国人谈不谈炸弹之事，日本人是没有资格来评论、指摘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谈论中国人不讲炸弹之事，可惟独日本人不配谈。此中根由是不言自明的。况且，我们之所以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他们的政府自己不谈吗！那样一场空前的劫难，难道真的就想以“对不起”“添麻烦”划上句号？如此这般能算完吗？完得了吗？

五十年前的战争，我们最终是胜利了；可是，我们能说，那样的胜利就可以真正洗刷掉我们民族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了吗？！所以，我们该说的地方能不说吗？谁又能管得住我们说呢！当然，或许最主要的还是应当我们自己对自己讲！我们要把蒙受的所有奇耻大辱，始终铭记在心，须臾不可以忘记。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过去所遭受的一切耻辱与痛苦当成紧箍咒，戴在我们的头顶，让我们“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从而催促我们奋进、日新，真正达到先贤“知耻近乎勇”的遗训之标准。

当然，同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身边的日本，这位曾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苦难的近邻！我们应该面对现实！除去情感与激愤之外，我们还需要理性的认识与分析。我们应该作一系列的文章：关于日本人的思想，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的传统与习俗，甚至于他们的起居生活等等，都需要我们作出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认识。只有这样，或许我们才能说对日本有所了解，才能制定出适宜的对策。因为，为了我们民族在下个世纪，以至于下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再有昔日蒙受凌辱悲剧的重演，我们对身边的这块“弹丸之地”是应当有特别充分的认识的。从这个角度讲，我的这位日本朋友的话也有几分道理。除去激情与愤怒之外，我们还必须要有的科学的态度与理性冷静的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既避免悲剧的重演，又可以开启崭新的日月，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落到实处。

归国之后，我的脑海中总出现这样一个念头，这就是套用《怎样管束德国》^①而来的，即我们应当《怎样管束日本》。

当然，今天的世界与几十年前相比，绝不可作同日语；但有些问题的内在实质，却依然如故。有鉴于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我们有理由和日本人民一道，制止住新的危险，从而保卫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尤其是想到那些无辜的同胞们的冤魂，我们能有什么不该做、做不到的呢？！

补充一点想法，兼叙为文之由，是以为序。

一九九七年十月初稿
二〇〇〇年十月修改

滨德寿司店

“滨德寿司店”坐落在东京的繁华街市、并且大公司较为集中的新宿区四谷地带。它背靠着最热闹的中央大道，前斜临一条商业通路，跨在一栋证券交易所大楼旁边突出的二层小楼上。“滨德”的下边一层，是一家专门提供人造冰和毛巾洗涤业务的小店。这家小店的门面极新，但却有些“怯”；“怯”就“怯”在大红大绿上。而“滨德”的门面更新，却显得特别得体；得体就得体现在搭配上。门面全用棕色大理石包砌而成，举凡突出的部分，像前檐、门牌、以及所有的装饰类物品，则一律用雕压成鱼虾海藻状的镀金铜板，很是庄重不俗，又恰到好处。飞扬在半空中的“广岛风寿司”的那面幌子，也甚是别致，为它处所罕见。在这崭新而得体的协调中，“滨德”也就更显得引人注目了。说实在话，在东京都内众多的寿司店里边，仅从外表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凤毛麟角；而“滨德”无疑当算其中之一。

“滨德寿司店”的内部装修很是普通，无非雪白的墙壁，用白纸糊成的木格障子，以及亮亮的地板，一如所有的寿司店那样。据施工的装饰设计者讲，他要得就是外面的效果，室内则无须讲究。

“滨德”店内总共三大间、一小间，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就规模而言可谓是极普通中型店中的小店。三大间房被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较大的主客室，能放七八张不大的矮桌子，客满时挤下三十来人。另一部分又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制作寿司的工作间，一边是进出口。工作间这部分的三边围上稍高的柜台，主人在里边控制各种寿司，外边的柜台前也能摆下近十个高凳。进出口处则设衣帽柜，摆着一部投币电话；紧贴着衣帽柜有一条小路，路中间有一极小的厕所，由此再往里就是那小间房。小间只有四个半平方，用作灶间和储藏室。“滨德”店内的布局紧凑匀称，所有的房间明亮干净，尤其是露出的部分几乎一尘不染。

“滨德寿司店”的老板姓永田，名德一郎，老家在广岛乡下，故居前有一条小河流过，这就是“滨德”之所以为“滨德”，寿司之所以为广岛特色的根由。日本人常用其名或姓，以及居家特殊的什么标志来命名属于自己的公司、小店；而日语之“风”者，汉语之“特色风味”是也。

永田大约四十六七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长脸，眼睛极小，鼻子尖尖，配上一副精致的细金丝边近视眼镜，显得斯文无力。其实他一点也不斯文，满嘴是俚语荤笑话，力气也大得惊人。由于永田的鼻子、眼睛和嘴过分地集中在一起，于是乎下巴就显得格外突出。从外表上望去，小老板的尊容极似日本补习学校中的私塾先生，而不甚像人们概念中那大砍大杀、宰鱼剥虾的“料理人”。因此，常来滨德吃饭的人，有时戏呼永田为“教授”。小老板听到不急不恼，只是摇着头苦笑，颇有感触地说：“我要是教授就好了。只可惜我不是教授，我是一条鱼。”

永田的夫人慧子女士，也是广岛人，四十二岁。她小巧玲珑，面如凝脂；虽然五官长得极平常，可凑在一起却显得挺漂亮，不能不算是日本女人中的美人了。老板娘头发不多，因而长年累月都梳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然后再别上艳丽的装饰发卡。她的绰号是“小白虾”，于她来说虽不甚像，但倒是挺恰切寿司店的内容与实际的。

永田夫妇有一子一女，长为男，次为女。老大是东京一所国立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二十一岁。他的身材像父亲、脸像母亲，算是个标致的美男子；据说他在学校颇受女孩子的青睐。老二则相反，身材像母亲、脸却是活脱脱为父亲的翻版。她已连续两年参加高考，不幸都没有考上中意的学校；可她不甘心、不气馁，仍上补习班，继续充电不已，准备接着再战。大概是由于长相的原因吧，永田夫妇也像很多夫妇那样：父亲喜欢女儿，母亲疼爱儿子。永田虽然脾气不好，但从斥责女儿。他对女儿的两次名落孙山，恨得咬牙切齿；可当面依旧好言劝慰，从不说女儿半句。有时夫人同永田开玩笑，总这样说：“你喜欢的宝贝女儿，其实一点儿也不漂亮；我比你女儿漂亮多了，可你对我老是爱搭不理的。早知如此，真应该让你娶个像女儿

那样长相的丑媳妇！”

永田比夫人大五岁，按说应当该是他处处让着夫人；可是恰好相反，从来都是他冲着夫人大喊大叫，而夫人却总是抿着嘴笑，好像没听见似的。客人中有替夫人打抱不平者，很想站出来主持公道。可夫人却说：“我丈夫太累了，应当让他多吼一吼。如果不发泄出来，憋在肚子里，也许还会生麻烦呢。反正大事上他听我的就行了。”听她这么一说，尽管人们不知所指的“大事”为何物，但大概也就明白了；虽然永田表面上风风火火，可实际上还是夫人当家。我曾看到过一次永田夫人动气，她在地上叫骂犹不解气，竟跳到椅子上大骂。而地板上的永田则禁不住两腿乱打哆嗦，只是把头低下，嘴里一个劲儿地“嗨、嗨”不止。

据永田自己说，他的寿司的制作方法，是得到过广岛某高手的亲炙真传；他的手艺之高，全东京制作广岛风味寿司的人，无有能出其右者。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不过给“滨德”题匾的书法家，到确实是日本书界的名人。然而客人中亦不乏调侃者，他们称那是因为永田给书法家送了整整一年寿司的缘故。还有的说，“滨德”的鱼虾都不算最上乘的，品种不多，味道也未见得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些不满。但他们还是照样来，估计味道未必如抱怨的那样。虽然永田自吹自擂的寿司之高妙与否，我不得而知；但对他同样自夸的“中国料理”，却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他的“杂烩炒”，即把墨斗鱼丝、洋白菜丝、胡萝卜丝、菠菜及黄豆芽爆炒在一起，味臭难嚼，望之食欲全无。每逢食此菜时，我便拧眉不敢下箸。

永田制作寿司，老板娘服务，我作零活，主要是刷碗，整个寿司店就我们三个人。

我的任务很简单，负责盘子、碗的洗涤、擦干，以及餐巾的折叠码放，均是辅助性的。我的工作是从下午五点半开始，至晚上十时整结束，计四个半小时。遇到特殊情况，则延长一个或半个小时。这种工作，如果碰到客人来得很多时，一点也不轻松，洗刷不停；从开始到完结，除吃饭时间外，你甭想有一分钟的休息。下班后，腰已经很难直起来了，走路也不会像平时那么轻松。可也有这种时候，整个晚上连个鬼也不来。

除去永田皱着眉头抽烟、看电视、摔盆、扔家伙之外，你听不到半点别的声响。与永田相比，倒是老板娘更沉得住气，她依然笑哈哈地看报、抽烟，或者走过来和我闲聊几句。因为她清楚，东京餐饮业收入的大头，是新年前后的“忘年”、“新年”之类的“两会”，以及年中间的奖金月。大约全年收入的一半，都是在这两个“忙季”里抓到的。在这两个“忙季”里，店里天天加班，可依然人满为患，折腾得天翻地覆，把什么剩的、破的都能卖出去。我记得新年前的一个星期里，老板娘跑前跑后、添酒上菜，硬把两双鞋的高跟儿都跑断了。至于平常日子，除去永田中午给人订作盒饭的收入是固定的，其余的都不见得有准谱儿；连电话预约来吃饭的，也说不定会爽约。客人来了，自然高兴，“上帝”给送钱来了；客人不来，你也毫无办法，你总不能到“上帝”的口袋里直接去掏吧，只有“守株待兔”。

到“滨德”来吃饭的多为老顾客，许多是附近商社里跑联络公关，或者是推销产品的职员、科长一类的人物，他们手里有交际费，因而花起钱来比较大方。每当“财神”到来之际，永田便极愉快，一边做寿司，一边与客人聊天。遇到客人请他喝酒时，他做诚惶诚恐状，赶紧轻手轻脚地打开柜台边的小门，绕出工作间来到客人面前；他擦干净手，深深一个大鞠躬，然后是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便是又说着无数个“谢谢”地转过身来，紧走几步回到工作间里，继续他的制作。他陪着笑脸，找着话碴儿，不停地鞠躬；同时又根据客人的不同，讲着荤素不同的笑话、佚事、见闻之类，提供“笑”的服务。他的名言是：鞠躬和说客气话都不用付钱！但是如果客人们有正经话要说，重要的事要做，永田便停止谈笑，默不做声，专心工作，只是用眼睛照看客人们用餐，绝不会有一点儿使人不愉快的举动。他是个讨人欢喜、极有人缘，且训练有素的店老板兼“店小二”。所以，他的小店一直经营得不坏。

永田嗜酒、好赌，而去色情场所的事则是偶一为之。他总是说：他太累了，只有酒和赌能刺激他；干别的，他只能想想，而没有力气。“滨德”在四谷，永田的家在练马，如果乘电车连走路的时间都算上的话，最多也就需要四十分钟的时间。这在东京都内是属于绝对的近距离，但他却不回家住，而在小店

的附近租简易公寓。这样他既可省去来回奔跑辛苦，还可方便他去朋友处打麻将。据说他的麻将技艺超过寿司技艺，因而每月下来赚头不少。但这部分钱，他从不交给老板娘，一般用来充作他的零用花费，或添置私物。他的名牌西服、鞋子和手表，都用打牌赚来的钱添购的。一般说来，永田每个月把收入都交给老板娘；有时多给些，有时少给些；但只要这个数目老板娘觉得差不多，也就不追问永田余下的钱是怎么个花法，更不过问丈夫夜里去干什么。她常对永田说：“只要你钱交够了，我们一大家子人不去喝西北风，你干什么我都不管。有野娘儿们管你吃住，你就去找，我才不在乎呢。”当然，话虽说得干脆，但是要说她对丈夫拈花惹草真不在乎，那也未必。我看见老板娘的那次大发雷霆，后来永田告诉我，就是因为“花草行为”所致。永田在陪同一位酒店老板娘喝酒时，花钱过于大方，光喝酒是花不了那么多钱的！尽管永田一再辩解自己同那个老板娘没有“别的”什么关系，但永田夫人则以多花钱为由，不依不饶，大骂特骂。而永田则自知理亏，惟恐事情闹大，才任老板娘大泄妒火，故而“嗨、嗨”地没完没了，但求“宁”夫人以“息事”。

据熟悉永田的人说，永田只是喜欢乱说、乱吹牛，他已经给累摊了；恐怕只有打麻将赌钱和喝酒，能给一些刺激，其余均已不行。永田也总是说他太累，想找个帮手，可老板娘不同意。她的看法是，来了个正式的师傅，但工作量不一定就能增加多少；客人来不来根本不在于店里有几个师傅。这样与其多付一份工钱，不如让永田慢慢干。另外，她还劝说永田想办法收个徒弟，既能少付工钱，还可添个帮手。永田没办法，只得将就着自己干。他每天早上四点半钟起床，五点去附近一家鱼市，取回预定的鱼虾海鲜。虽然鱼市可以派人送货，但运费全年下来也是一笔开支呢，永田舍不得，只好自己干。从鱼市归来，他在店中独自吃过早饭，就该开始收拾这些鱼虾原材料，该切的切，该剥的剥，该煮的煮，一直要干到大约十点钟。十点一到，他又该开始给附近三家公司准备午餐盒饭。于是蒸饭、烤鱼、炒菜，五十份盒饭也够忙活一阵子呢！十一点半左右，永田骑车把盒饭给分头送去；一点前后再取回碗和盘子，分别

刷洗干净后放好，晚上再用；然后他还要把上午余下的活儿作完。三点半钟一到，他又要蒸饭，清拌些下酒小菜；缺什么还要自己去买。不管忙到什么程度，下午五点钟必须开张；也许开门后什么客人也不来，那再从容行事；也许一开门后就来大队人马，那就苦坏了永田，真得甩开膀子大干了。老板娘每天都得下午五点半左右才能到，因为家中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她干呢！遇到大累特累之时，虽然有赚钱的愉悦，可也有仿佛顶不住的苦恼；尽管永田不愿想夫人就是为要累得他干不了“别的”才不增加人，但对夫人不甚爱惜他的劳动力这一点，还是极为不满的。于是，永田也就有意冷落老板娘；有时还当着客人的面，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我们夫妇之间的爱情，也已经是人类之爱了”。客人们大笑不止，老板娘则处之泰然。这句话本出自日本一位著名电影演员之口。一次采访中，记者问这位已年过八十的老人是如何考虑他同老伴之间的爱情时，这位老人道出了上述名言，引得在场的人发笑。于是，这句话也就在日本家喻户晓了。

老板娘每月要到银座的美容院做两次头发，陪她的干爹吃两次饭，这都是她同永田之间的“契约”。前者她得付出几万元日元；而后者她不仅不用付出，还常常有所收获。这位“干爹”是一位名人，曾作过一所著名私立大学的校长。“滨德寿司店”的题匾，除去永田“送寿司”的调侃之外，恐怕还得说是由于这位“干爹”的面子；“干爹”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之“前辈”。在日本，“前辈”与“后辈”的同学，有着很奇特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名人们，常常以此相互标榜。

永田夫妇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滨德寿司店”也说不上有什么变化。

一天，介绍我到“滨德寿司店”来工作的那位日本朋友，约我们去他的一家小店聚会。他的买卖做得不坏，故而在离“滨德寿司店”不远的地方，又开张了一个极小的酒馆。我和夫人，以及永田夫妇等，都前往祝贺。那天，直到很晚我们才告别那位朋友。由于我们和永田夫妇归家恰好同路，便商议一起走。可永田兴致极高，一定要和夫人陪我们夫妇再去唱歌。他还特别挤着小眼睛，神秘地对我们说：顺便见识一下东京深夜的卡

拉OK吧。

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宽大的电视屏幕前，拥抱在一起的永田和夫人深情地握着手，唱着他们家乡的歌谣——广岛小调。他们已是歌三曲而意犹未尽了。那歌声、那神情，都表露出他们夫妇间的亲密，充满了不绝如缕的缠绵之意。这是自我认识他们夫妇以来，所未见到过的。

房东太太

在日本东京生活，首先要解决吃饭和住房问题，所谓东京“米贵，居大不易”是实情矣。可是东京劳动力缺乏，就业机会多，倘能寻到工作，尽管“米贵”还能糊口；而“居大不易”才是始终被困扰的一件大事。

日本，尤其是东京的地价之贵，令人瞠目结舌。但大多数外国人“到此一游”，并没有打算置地买房，因而与地价之贵，尚无太大关系。然而找房、租房、住房之艰辛，则几乎使所有的外国人伤透脑筋。因为许多负责经营租借业务的“不动产”，都有明文规定在先：房屋不租给外国人。即使能够租给外国人的，又必须要由一名有职业收入的日本国籍者作担保人，以便出现任何问题，就拿担保人是问。不仅如此，初租房屋时，还必须多交纳两个月的房租作为押金，多交纳一个月的房租、或数个月的房租作为礼金。押金待契约完成后，视其对房屋的损害程度而扣除，余下的退给房客；而礼金则就作为纯粹的礼品送给房东，不管你乐意与否。当然，租借房屋交纳礼金押金的这种惯例，到不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对日本人亦复如是。据说这种惯例是举世无双的，由此似乎亦可窥见“日本人特会经营”之一斑吧！只是这样一来，即使原本不算太贵的房租，等到你把房子租到手里时，也会感到它的沉重。房租愈高则礼金押金愈重，这是成正比的。

解决了礼金押金的问题，还要有一系列的契约项目必须要确认无疑之后，才能最后签字画押。例如房间不能转租他人，不能作起居以外的他途使用，损坏东西赔偿等等，条目之精细具体，清楚明白，确实表现出房主的深切用心与管理者的组织严密。至于说走路须轻，升堂入室脱鞋穿袜，室内不能摆过重物品，不能弹琴歌唱（有较高级公寓可准弹钢琴）之类，虽不必宣誓签名，但房东及不动产事务所是忘不了在交涉中屡屡明言的，此为约定俗成的东西。等到一系列手续完毕，住进之后，你不仅已疲劳之极，而且还要新增烦恼。原因是大多数的有关

居住条件的说明文件，都是房主与租借中间人所共同拟定的，有时与实际条件出入颇大。如果介绍说明上写着“居住地交通方便，距离最近的电车站行走只要七八分钟”的话，那么要是你来行走，也许至少得费十五六分钟；介绍说房间向阳，室内不潮湿，那么一住便晓，夏天室内阳光直射，温度最少也得在四十二度以上，最适合桑拿浴，夜晚十二点之前，你休想在屋里多待一分钟；倘若告诉你住地与公共汽车站仅一步之遥，那么你就会发现，房间必紧靠马路，大型车辆通过时，室内一切都颤抖不止，如逢四级以上地震。这些实际的条件，在说明介绍上之所以不能实事求是地表现出来，原因在于这些条件被打折了折扣，这是房主与中间人之间的“契约”。除此之外，尚有不成契约的束缚、限制，那就是房主，特别是房东太太身上的许多讨厌的东西。

就中最为突出的，也许要算是房东太太们的“望洋兴叹”慕“洋”成风吧。虽然今天日本的国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初，但“慕洋人”却不鲜见。欧美等白种人入住新居时，房东太太一般总是要亲临现场的，看望之外，再加问寒问暖，虽然不会降低房租，但给人的感受毕竟要好一些。我的一位斯里兰卡朋友，碧眼金发，人高马大，口操英语。当他乔迁后的第一周，他的房东太太几乎每晚必至，或问缺少什么，或是推荐购物地点，热情殷切之至，颇为令人感动。可怜的是这位“斯佬”受宠若惊，竟不知如何应对，着实手忙脚乱了一番。因为在都是外国人的场合，他常以国小，且战乱不已而略感自卑。

在众多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当中“房东太太”大抵为不受人欢迎的角色。其缺点往往是同庸俗市侩、浮夸刁钻、趋炎附势、嫌贫媚富等等联系在一起。最擅长的是琐碎、喋喋不休，怀着敌视房客的心理监视房客。或者无中生有，把道听途说的房客轶事加工制作后，再与其他家庭妇女一起嚼舌头。所有长舌妇当中，房东太太当名列前茅。当然，如此一概而论只是就房东太太的整体形象而言，具体来说则又是千差万别的，其中亦不乏善良美好者。平心而论，我碰到的房东太太应当说是相当好的人，虽然她还远不是尽善尽美。在我入居之前，住在同一房间的是我们中国来的两个女孩子。她们像所有的赴日自费

留学生一样，为了生存和学习，有时不得不工作到很晚。她们生怕影响别人休息，常常是脱了鞋子跑楼梯，再轻轻地溜进她们的房间。算是较为自觉了吧。可是房东太太依然不放松，总要寻问她们如此晚归是干什么去了？因此，由“时间纠纷”而引发的不愉快，也就不停地擦摩开来，弄得关系很僵。及至我一家入居之后，房东太太每言及此，仍很愤然。由于我赴日之前是中国大学里的老师，赴日后所在的学校，一般说来对日本人亦不陌生，因此房东太太从没有过无故找碴儿。又由于我们的起居时间，也属正常，故而也不会产生“时间危机”。房东太太偶来小坐，或是收房租，或是有事相告，或是只为寒暄。

我的一位朋友因家事苍促归国，行李物品都未来得及整理，就委托我给做善后。于是，我就另约其他朋友，把行李物品先集中到我处，然后再给这位朋友寄回国，或者分门别类处理掉。因为行李物品不少，整日整理而未尽其功，于是，我就把尚未处理的物品，放在走廊里过了一夜。谁知第二天中午，房东太太就找上门来，郑重地告诉我：你应当根据契约要求来行事，而契约上没有规定走廊上可以放杂物。我一边连忙解释，一边把走廊内的物品搬至室内。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我，房东太太没有大动干戈就算是很给面子了。

住房除去房租外，还有数目不太大的清洁费。为此房东太太总要在月初和月中，各进行一次扫除，以证明房客付给她钱是一点都不冤枉的。届时，她必定高声说话，动作也异乎寻常，很有些要使“全世界居民”都知道的味道（因公寓除我之外尚有别国留学生居住）。别的房客或关紧房门，默不作声，或者出门在外，敬告房东太太小声点儿！但到我家门口时，只要我在家，一般总是开门致谢，并将她手提的污水桶中的脏水倒到我家厕所的水池内，再换一桶清水给她。为此，房东太太也很领情，说着客气话，因为她干的是契约上所规定的。有时房东太太还前来送些小东西，或瓜菜之类；我一方面表示谢意，一方面也回赠她一些我从中国带来的小礼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免多说几句话，也就有了些礼尚往来。我以为，身处异国他乡，既要入乡随俗，也要我行我素，对人对事都应当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对师友如此，对房东太太亦复如此，因为我是一个

中国人，我来自礼仪之邦。但我讨厌房东太太的信口开河、无中生有。特别是她诉说房客缺点、窘状时的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般的活灵活现的样子，确实是“长舌妇”最好的注脚。

我在那里居住了两年，又经房东太太的同意续签了两年的契约。可是，房东太太怕房子仍为老样子，租不出好价钱，于是犹豫再三，决定翻建。决定之后，她同其他的房客都未再续签契约，也没有再接受新住户。但因为同我契约签字在前，倘若中间毁约，怕我找她麻烦，所以颇费心思。恰在此时，房东太太的丈夫因病住院，需做一个小手术。手术之前，房东太太特意转告我，她的丈夫很想同我见面，急切之中，又显得格外诚恳。为礼貌起见，我略备礼品，前往医院，寒暄之后，真心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房东夫妇很是感动，因为以外国人房客身份前往探望者，我为头一例。他们再三感谢之后，便很快转入正题：夫妇两人双双深低头，恳请修改租住契约，并希望能在手术前进行此事，大有临终嘱托之势。他们不停地说：“对不起，实在是太麻烦了”。看着这种情形，我笑了笑说：“请你们放心，没有任何关系。虽然这里边有法律问题，但我不会为难你们。我随时都可以和夫人修改契约”。

第二天上午，我去房东太太处修改了契约，把原来的“二年”改为了“一年”。本来按房东太太的意思，要在修改的下边还要加上一条注释：原来的“二”字乃今日的“一”字之误。看来盛传的雍正改造遗嘱之事，即把“传位十四子”变成“传位于四子”绝非枉谈。今日之日本妇人在修改房屋契约时，尚且能想得到所谓“二”字为“一”字之误，更何况昔日为争夺王位的残酷宫廷斗争呢？我微笑地告诉房东太太：“还是实话实说吧！根本谈不上‘误’‘不误’的问题。你们今天建新房是好事，我会成人之美的，提前一年搬家。我根本就没想到过要找你麻烦，请别再为此事操心了！”房东太太称谢点头，但还嘀嘀咕咕说要准备个“备忘录”，把修改的前后因果及“误写”的意见作补充说明。

于是，我们只好续住一年就得搬家，就得提前一年重复经历我前边提到的一连串麻烦事。但还有时间，还来得及再找到合适的住房。至于房东太太补充不补充什么“备忘录”，那是

她的事。她要搞小动作，增加误写什么的，那就让她搞吧，我犯不上和她计较就是了。

十月一日是我们的国庆节。我约来了一些朋友到家中聚会，还挂起了五星红旗，我们边说边笑，十分愉快。这时，房东太太也前来凑热闹，她说她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她也替我们高兴。她还说，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在奥林匹克或其他赛场上冉冉升起的画面时，她就想起我们。房东太太又特意竖起大拇指，指指墙上的红旗，再指指我们，非常高兴地端起一大盘热腾腾的水饺走了。如此这般，你说我还能记得房东太太过多的不好吗？

总之，这位房东太太，用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的话来说，可算是日本人中的“难得的好人了”。

打工“大姐”

日本在整个社会发展之后，对于全方位的服务要求则显得尤为强烈，因而劳动力明显不足的问题，就变得愈来愈突出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日本一方面从国外输入劳动力，这便是许许多多的外国人，能够到日本进行工作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日本则是动员退休人员再回到力所能及的岗位上，发挥“余热”。当然，这些方面的工作，必须是退了休的人所能胜任的。

中田老太太已经七十二岁了。她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六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在一家私人医院里作清洁卫生工作。她打扫诊室、病房、休息厅和三个厕所，以及前门与楼道。虽然医院不算太大，但也够老太太忙活的。紧紧巴巴，到中田汗流浹背之时，整个的工作才刚好完成。从八点半到十点，中田还要到医院附近的一家弹子机房去打扫洗脸间、厕所。弹子机房有三层，每层两头各有两个厕所，共计十二个厕所；厕所外边还有挺大的洗脸间，是供赌客们洗涤之用的，共计六个。这些活儿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做完，着实够中田一呛。十点过后，中田老太太结束了早上的工作，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休息，给老伴儿做饭。一年四季，中田风雨无阻，披星而不戴月地匆忙着。像中田老太太这样的打工老妇人，在日本当不在少数；虽然都是出来工作，但理由则不尽相同。

中田说她之所以出来工作，是因为丈夫的退休金太少，仅够吃饭，倘再有什么活动的话，则不免捉襟见肘。而打工一月的收入，用于自己和老伴儿的各种活动，那就活泛多了。所谓的各种活动，也无非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一年一度的同乡会宴集之类。

当然还有不少老太太是所谓“干惯了，一停下来反而难受，不如去干”。她们觉得与其在家里空度日月，不如到外边挣钱干活儿；一来可以解寂寞之苦，二来还可以增加收入，谁会嫌钱多呢？据说在一个弹子机房打扫厕所的老太太，竟是新宿那一带有名的房产主。她的信条是“一分精神一分财，十分精神

福就来”，所谓靠劳动致富吧。有了钱可以旅游全世界；就是把钱存入银行，看着存折上数目的变化，也是件愉快的事情。这些人没有压力，应当说是幸运的。

还有的一些人则就不怎么美妙，原因也各异：突遭变故，死去老伴儿者有之；人虽退休，可房子尚未买到手，还需再分期付款者亦有之；虽说也算退休，但只是年龄退休，没有养老金，因为从来就没有过职业与收入，所谓“退而无休者”，这种人亦复有之，总之是“各有各的不幸”。这些人只好拼老命，做所谓“最后的斗争”，境遇实在不佳。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目前有扩大的趋势。

老妇人是日本清扫卫生专门队伍的主力军。她们虽然年龄大，但干活儿认真负责，经她们洒扫过的房间是尽可以放心的。这些人从事着体力劳动，而且也比较艰苦劳累，但她们却从不忘掉打扮自己。遇到有什么活动时，她们更是极尽自己之所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没有一点不好意思，“老来俏”的说法对她们是合适的。

老妇人如果听到你夸奖她的活儿干得好，她本人也显得年轻漂亮时，会非常高兴，殷勤致谢不已。她们最怕听人喊她们“老奶奶”、“老太太”，甚至“大妈”、“大娘”，而希望人们呼之为“大姐”。如果你没留心，“错”叫了称谓，她们便不很愉快地认真纠正你，“我还没有你叫得那么老，我还能工作呢”！

这些老妇人也同样很琐碎，斤斤计较，有时为一点儿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有那么旺盛；再者说同为干活儿人，哪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一般说来都还比较平和。

在日本，这些赶早清扫的老妇人，以及许多岗位上的老年人，他们都极为普通，可也很了不起。在今天日本的繁荣当中，既有着他（她）们昔日的奉献，也有着他（她）们今日的劳苦。这种勤奋精神是值得人们钦佩和学习的。

三个“工头儿”

“后乐”是一家老字号的“便当”工厂，也就是盒饭加工厂。它生产的盒饭分两类，一类是普通餐，也就是为公园、车站和二十四小时连锁店准备的盒饭，形式虽有十几种，但内容不外是一块烧鱼，烤肉或其他几种小菜和咸菜，售价便宜，比较平民化。另一类则是特殊餐，也就是专为有些会议、大饭店或少数嗜日本饭菜如命者准备的高级“便当”售价较高，较为贵族化。当然，后一类特殊餐数量不很多，一般每天能有个三五百订数，也就相当可观了。而普通餐盒饭需求量极大，一般每天至少要生产两万盒；碰到旅游旺季，或节假日，有时能破三万盒大关。

在“便当”加工厂工作的职工，一般都是“三班倒”，与普通工厂的“一班制”有所不同。“后乐”厂的夜班是从午夜十二点开始，早上七点钟结束；早班则是从六点钟开始，至下午两点结束；而晚班是从下午两点开始，至晚上九点结束。通常上班，以早班人数为最多，因为要在六点至七点的一个小时里，把夜里作出的“原材料”统统装入盒内，运送到各个销售点。这一班是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传送带一开，装饭的装饭，码菜的码菜，有一种内容就有一道手续，一直到盖上盖儿包装好，成箱地搬到外边等待着的运送汽车上为止。七点过后，大忙告一段落，工人们吃早饭与稍事休息，夜班者则交待事项完毕后下班。大约从七点半开始，就接着忙乎午餐盒饭。做饭炒菜，赶在十一点前装好送走以不误各个代销点午饭之用。每天上晚班的人数不算多，因为盒饭主要是早上和中午卖出，他们的工作程序一如早班。上夜班的人数虽然更少，但工作却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上夜班的人得把各处提供的预订数目弄清楚计算好：普通的、特殊的。然后要把制作这些便当所需的原料，即各种不同价格的米、鱼虾、蔬菜、水果等算精确。如果是夏天，则特别要算计好“生食”，即生鱼片，生虾，生菜等物品；一来

是因为这些东西价钱稍贵些，二是因为天气炎热，数目不确切就会出现浪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把关”的作用，倘若因用的材料不佳，出现什么问题，那就不得了了。便当厂最怕的就是消费者因食用盒饭引起食物中毒，那样的话，既得吃官司，又会导致销路大减，总之是跌到“倒霉之谷”中难以翻身。因此，上夜班的全是工厂里最优秀的工人。在“后乐”加工厂的江户制作中心，五百多人中有三个技术最好，又深得老板信任的工头儿，他们全都被安排在夜班。我因赴日留学不久，为筹措生活费与学费，曾利用假期在“后乐”的江户制作中心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我上的是夜班，负责蒸米饭，受夜班领导管理，因此与这三位领班工头儿都打过交道。

三位当中的头一个是石川忠二，那年他四十八岁，已经当了三十一年的厨师。可是当作为领班的工头儿，则刚刚是第二年的事儿。原因是石川脾气太大，爱顶撞领导，与各届负责制作中心的工厂长的关系，都极为紧张。但他的技术是全厂工人中最好的，尤其是他的装盒设计，不仅是厂内，恐怕也是全东京便当业内无人能与之匹敌的。

日本饭菜常被说成是“用眼睛的艺术”，特别看重视觉效果。做便当也就当然特别看重码放，要讲究层次。虽然是大众便当，似乎没有人太追究色彩搭配，过得去就行；可石川却不，他极用心在码放上，并且设计得也特别出色。尽管只是几块萝卜、咸菜或一块烤鱼，两个饭团，却被他堆码得龙凤呈祥、花团锦簇，使人馋涎欲滴，这不能不说是件绝活儿。因而石川虽然是个刺头儿，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看来“一招鲜，吃遍天”，不仅古今皆用，而且也中外咸宜。石川就是这样一个人怀码放盒饭绝技，可竟郁郁不得志，在盒饭厂里默默工作了三十年才被发现的人材。真正发现他有如此“天才”的是便当厂的现任老板，“后乐”的第三代传人。正像许多富于技艺类行当的情形一样，创业的人物多半是开派的高人，而守成者则未必就是行家里手。这位第三代传人原本是学艺术的，酷爱电影、戏剧，还曾亲自导演过电视剧。只因本来要继承家业的长兄不幸暴卒，这位艺术型的继承人才被拖到董事长的位子上。当上了董事长，只得开始管事。可笑的是这位董事长喜欢吃的却是西餐和中国

菜，一般不问津日本“便当”，因此，他还是优哉游哉，而把所有的经营事宜都推给董事会的其他人。这些人勤勤恳恳，有几位竟是从老板祖父时代起，就在董事会工作的，因此非常可靠。直到有一天，在大学的同学聚会时，董事长的一个同学，原是搞舞台设计的，现今则是红得发紫的一位电视剧制片人；他极力称赞“后乐”的盒饭既好吃又好看，并且还半真半假地说：“现在无论是在哪里拍戏，我都派人去买你们家的便当；如果有几天没吃到你们的便当，还真挺想得慌。”对这位朋友的话，董事长将信将疑，因为他从来不吃自己厂子的盒饭，也不知盒饭的内容和制作。于是第二天，他亲自来到工厂，取来便当，仔细观察发现果然是码放得错落有致，出手不俗。及至看到高级便当时，则更不禁为之心动；举箸而食，也是有滋有味，于是，他忙请来了负责码放设计的石川忠二。交谈之后，他不仅觉得石川技术高超，而且某些改革上的想法，也甚是符合自己之意，例如增加洋食便当（简易西餐），工厂革弊更新之事等等。这位三代传人深深后悔为什么早没发现石川这样的人才。于是他召开董事会；又力排众议，提拔石川为工厂长辅佐。从此石川志二才如鱼得水般地大胆工作，除制作高级洋食便当获得成功之外，工厂改革也搞得有声有色。石川忠二从内心深处感激董事长的栽培，当官之后仍然安排自己上夜班，以便把紧质量关。

石川为人不算刁钻，但也称不上忠厚；本来就细致入微，加上被重用，于是就更加仔细，不免有些过分。而他的过分，则常常又使一同工作的人不免心烦意乱，手足无措。所以一般的工人都不愿意和他一起上班。但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抱着只要活儿干得好，怎么都行态度。夜班的工作通常是午夜十二点钟开始，但他都是十一点多一点儿就到岗位，忙上忙下，一般工作至夜间三点钟，是夜班人吃晚餐及三十分钟休息时间。可石川从来都不休息，他总说：“白天睡多了，夜里睡不着。”但他也不阻碍别人休息，因为深夜工作有休息时间这是制度。石川干活儿一个人能顶好几个。

第二个领班工头儿名叫松田大作，个子很矮，五十多岁，胖墩墩的，一看就知道是厨子。他喜欢做菜做饭，钻研技术到

如醉如痴的地步。他手脚极麻利，看他做菜做饭简直是一种享受，一招一式，总让我想起庄子所写的解牛庖丁。据说他原来在东京有名的一家饭店当厨师长，因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被辞退。“后乐”的第三代传人早年就与这位厨子相识，于是把他要到自己的厂子里做饭。日本共产党的组成人员，多为知识界的人士；松田以一介厨子竟然也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使人感到新鲜。他为人活泼，喜欢开玩笑，但是特别喜爱的则是酒色。他的每月收入，除去给家中的生活费之外，几乎全部都消耗在酒色二字上。可听别人说，他的如此荒唐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一次，松田喝醉了酒，在休息间内大哭不止。他边哭边说：“苏联解体了，最早的共产党国家也没有了，我绝望了。”他还说，本来他希望老了之后到苏联去，“给社会主义服务”。可现在不行了，他老了哪里也去不成，只能守在日本活活等死了。但是，说话归说话，一到干活时，他便第一个走进车间，精神抖擞地工作去了。他觉得站在灶台前的煎炒烹炸是一种绝大的享受，可以补充他理想上的不足。他对我这个“外人”是抱有新鲜感的，因为我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有时，他竟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你还相信社会主义吗？”

第三位领班工头儿叫平岗北二，才三十五岁，是日本东京内极负盛名的料理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本来校长想让他留在学校里，但平岗不干。他说他想要把最好吃的饭菜做给老百姓吃，因此他选择了便当厂。虽然他的理想挺让人感动，可他的为人处事却不怎么地道。他的保守、小心谨慎、惟恐得罪上司的作法，很为今天的日本年轻人看不起；但他青云直上，爬得最快。只有三十五岁年纪，就在这样一个有传统的便当厂里当上了大工头儿，他自己不能不沾沾自喜。他是被全厂料理师最讨厌的一个人，原因是他在上司面前讨好，在工人面前耍威风。他的家在外地，但他不张罗把妻子和孩子接来。一来他可以自由些，二来他说那里生活费低，挣东京的工资，在生活便宜的地方花，何乐不为呢？遇到休息日，他便驾着自己崭新的车子回家，颇有衣锦还家的架势。他爱车如命，喜欢开好车、新车。他有三辆极昂贵的车子，那是他所有的积蓄和财产。据说有一次他行车违规，本应罚款，可是警察一看车主是个便当厂工人，大为

吃惊。警察说：“你要是个经理老板，我必重重地罚你；你是个工人，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我佩服你，不罚了”。

这三位领班工头儿，除松田大作我们有过深谈之外，其余两个对我这个外人临时工，既不热情，也不严肃，确确实实把我当成千里万里的“外人”来对待的，但他们对我的工作还是极为满意的。又因为仅仅是短暂的月余而已，假期一结束我就自动辞职，因此谈不上深交。但是，我们彼此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松田大作，我总忘不了他痛哭流涕的样子。每当我在街头看到卖的“便当”时，我总想起夜里做便当的情景。我惦记着松田，我不希望他继续荒唐下去。

弹子机下的悲剧

在东京或其他大城市，为赌博修建的场所不仅众多，而且漂亮。尤其是时代的新宠——弹子机房崭新豪华，又鳞次栉比，犹如雨后春笋。更由于其兼占地利天时，所谓临车站之先，宜于交通，有近水楼台之便；处繁华之地，招摇于市，收得天独厚之功，因而出足了风头。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已有如此之多的弹子机房，可依旧人满为患，不乏站立等候者。据可靠情报说，目前全日本共有弹子机房一万余家，年营业额高达几十万亿日元。当然这个数字还只是弹子机业的年营业额，未计麻将房等其他赌业于其中，倘若再将麻将房等其他赌业的年营业额加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将更为可观。赌风之盛、赌业之规模与气势，在日本真可算得上是一大奇观。

以往的日本“高额纳税者”行列中，成员大都为传统概念中的巨商大贾。然而，最近几年情形则稍有变化。有一年，此行列中的“亚军”乃为一弹子机业的老板。为此，日本人当中亦有不少愤愤不平者，并且也着实疾呼呐喊了一番。当然这种不平，始终未能形成气候。

且不说金钱的魔力与魅力，以及游戏赌博强烈刺激的心理因素，单凭弹子机房内那震耳欲聋的音乐之声，那万马奔腾般的紧张气氛，似乎就足以诱惑人们到此一搏。热衷于弹子机游戏赌博者，几乎各色人等都有，颇符不分阶级、职业、年龄和性别之别而一律平等之实。特别是随着所谓的经济不景气，弹子机房内的“群众运动”则更有如火如荼之势。失业者于此消磨时光者有之，偶一为之的初试锋芒者有之，“半专业化”的出勤者有之，全专业化的“职业杀手”亦有之，难怪弹子机房也被称之为另一种方式的“无烟工业”。然而不论是何等人，几乎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尽了玩兴，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最可笑的是好些自诩为“职业杀手”的人，其实如此称呼最多也只是吹牛壮胆而已，不但杀不了弹子机，到后来被弹子机所

杀倒是恰如其分。

一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的经历，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清水女士是四十岁那年回到日本的。她的父亲是一位大夫，曾随“关东军”侵略到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以后又在沈阳郊区那一带私人行医。日本投降后，清水的双亲只将他们六岁的儿子带回日本，而将三岁的清水及一岁半的妹妹留在了沈阳。收养清水姐妹的是一位中国外科大夫，老人家因自己没有孩子，便将她们视为亲骨肉。不幸的是，大夫的妻子和清水的妹妹在一次车祸中身亡。遭此厄难，大夫悲痛不已，于是就更把清水当成掌上明珠了。大夫以后没再结婚，只是守着清水相依为命地过活。清水在她的中国父亲家里，找到了父爱与温暖，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清水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童年的恶梦，已经离她远去。大学毕业后，清水在辽宁省一家很不错的医院里当医生。二十六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位搞邮电业务的工程师，很快又有了两个宝贝女儿，日子过得更加欢乐。后来，清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调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当老大夫弥留之际，他讲述了清水姐妹的身世遭际。

就在清水的中国父亲死去没多久，她的日本双亲到沈阳来寻找他们的女儿了。没有费太多的周折，他们便找到了清水女士。双亲给女儿跪下，请女儿，女婿及两个外孙女原谅他们昔日的罪过。于是，另一番亲情终于又回到了清水女士的身上。为了填补双亲情感上的缺憾，清水女士终于辞去公职，与丈夫和两个女儿一起回到了她的故乡。四十岁的清水和四十三岁的丈夫，他们所学的专业、职业专长，都因年龄、语言与“残留孤儿”的身份，变得不那么“长”了。为了生存，清水夫妇靠亲友的集资、借贷，办起了一家中国东北风味的小饭馆。惨淡经营数年，生意刚刚有些起色，却招来了兄长一家人的嫉恨，他们极不友好地索回了资金。父母一气之下，双双病倒，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去世。于是，这家清水夫妇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小店，只得闭门关张。清水夫妇觉得气闷，不公平，可是两眼一抹黑，毫无办法。他们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想回中

国，又怕被人嘲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恰在此时，夫妇二人又都迷上了弹子机。

就像所有打弹子机者的逻辑规律一样，清水夫妇也是先有小胜，然后是互有胜负，接下去则是大败，败得一塌糊涂。夫妇二人输掉了积蓄，又输光了借款，直到输掉家中所有的一切，沦为彻底地“无产者”。这时清水夫妇虽然在日本只生活了五年，但却失去了他们刚刚踏上这块土地时的信心与进取精神，同往昔他们在中国时的工作形象相比，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了。堕入赌博的泥潭当中而不能自拔，他们的灵魂也开始变化了。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他们的手里再也不能有钱了，不用说大钱，就连小钱也不敢有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小钱，他们便开始焦躁不安，得赶紧给弹子机房送去方能“后快”。清水夫妇已经成为真正的赌徒。

说怪其实也不怪，人在走下坡路时，“赌运”也特别透着败兴。清水夫妇自交“华盖运”后，就再也没能从弹子机房拿回过一分钱。他们几迁住地，在相当破旧的公寓里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两个女儿甚至中断学业，打些零工挣钱，养活父母。即便如此，清水夫妇丝毫不感到羞愧，还恬不知耻地说“好孩子，等爸妈走运，喂好了机器，将来一定再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条件”。

清水夫妇已经麻木不仁了，除去探讨如何打弹子机之外，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再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清水的丈夫，甚至还撰写了“悠悠万事，惟‘打’惟大，克服急躁”的十二字方针，用来坚定自己的信心。大约五年前，我因朋友的介绍，在一个小小的集会上见到了清水夫妇，他们本来也是要参加集会凑凑热闹的。但不幸的是，那天的上午他们干了一点儿临时性的工作，因而有了大约一万日元的收入，于是他们改变了主意，不准备“耽误时间”，而要去“主动进取”——打弹子机，并且吹牛要在所谓“弹子机房关门之前的有效有利时间里，大捞一把”。众人劝阻，甚至是斥骂都没有丝毫效力，因为他们实在是按捺不住了。他们飞一般地窜进离车站最近的一家弹子机房里，那神情可谓踌躇满志、稳操胜券！看着他们满头的白发，可又童稚般狂喜，真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可恨和可笑！

像清水夫妇这样因打弹子机而沦为赤贫者的，或许不算太多。但大多数上瘾打弹子机者，即所谓的“弹民”，他们对于弹子机热爱的程度，则绝不在清水夫妇之下。只是严峻而深刻的现实，不能允许他们无节制地大玩特玩。因此，对于广大的“弹民”来说，掌握好火候，量力而行是至关重要的。

平素节衣缩食，自奉俭薄，可却一定要慷慨地照顾弹子机房的“弹民”，为数不少。我认识一位自营业主，年近七旬，可依然像小伙子一样“挖山不止”，因为他率领着一小支挖掘机队伍。老人家和蔼可亲，食素，喝白开水，一年四季总穿同一件衣裳，颇有“新生活”之风，然而他却是弹子机房绝好的客人。他曾扳起指尖同我算账，他说他每月纯收入近两百万日元，除去给夫人四十余万生活费，十万余元给住房分期付款之外，其余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他喂弹子机的“活动经费”。他按计划行事，每隔两天去一次弹子机房。这样一个月下来，他不仅能输光所有的“活动资金”，还要再借个十万、二十万来凑数。他总感慨平均每年都“输给弹子机房一辆非常好的汽车”，可他却刹不住闸，还得拼老命继续干。当然，这位自营业主虽非最大的手笔，但也来得相当可观。一般人则没有他这样大方，只可谓“小打小闹”，但“小打小闹”亦不可小瞧。

我熟识的一位国家公务员，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他年已过三十而尚未婚配，故而一直“赖”在家中，吃住全不付钱。为此，他没少招来父亲的冷嘲热讽，有时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但他却忍受着，慢慢地竟也处之泰然。回顾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时，他有些调侃地说：“乍听起来，浑身冒火，真想挺身而出，一走了之，可转念一琢磨，那将多花多少钱呢！骂就骂吧，反正我是他儿子，能把我怎么样？”遇到父亲高兴时，他还笑着说：“我可没白吃您的饭。挨您那么多骂，还抵不上饭钱吗？”这位公务员抽烟而不饮酒，平时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但每逢星期六、日下午，他必定衣冠楚楚，去参拜弹子机房。这位先生还极富机智，偶有“大”胜则从速收兵，“小”胜则草草收兵，一输则立即归家听骂。如此这般，一年下来，他竟然也输掉了近两百万日元。我惊奇地问：“你不是从来都能悬崖勒马的吗？”他苦笑着摇摇头说：“还有勒不住的时候呢？钱就是那

时候飞出去的。”直至今日，这位公务员依然赖在家中，依然听着父亲的漫骂而无动于衷，依然严于律己、勤俭节约，但依然逢周六周日下午，雄赳赳地前往弹子机房一搏，算是为弹子机业的繁荣而尽他的绵薄之力吧！

尽管各类书店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如何打好弹子机的“行动指南”，甚至于热衷教育之士还办起各种名目、层次的研讨进修班，但想来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不然的话，街上早就该没有那么多弹子机房了！

被金钱腐蚀掉心的人——那些赌业经营者，他们是罪孽深重的！被赌博葬送了和正在葬送着的那些弹子机的奴隶，他们又是多么可怜！在人们用劳动创造财富和繁荣的同时，也创造出许多使人失去人格与价值尊严的畸形行当，而当人们一旦误入此行当之中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那么沉重，变得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由此不能不使人思考到，在人类进步的同时，那种理想化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该是何等重要与迫切的事业！

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创造财富与繁荣的过程中，同时创造出一个个毁灭自己的陷阱！

送报者“言”

吉永早上送报，晚上在深夜酒吧作服务员，已经三年有余了。表面上看，他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似乎毫无痛苦与不幸可言。除送报时间外，他总衣着整齐，风度翩翩。虽然如此打扮是为了晚上的工作，但他言谈举止得体，还是挺讨人喜欢的，没有染上“深夜工作者”的诸多不正常。

然而与吉永的一次交谈，使我知道了他的“快乐”乃是痛苦的外衣，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不平静的。

交谈是由一本短篇小说集而引发的。

我所在学校的一位老师，曾很郑重其事地要我们外国留学生读一本五十年代颇负盛名的日本小说。并且还说过这样的话：要了解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社会，没有比读这本小说更好的了。于是，我跑了几处图书馆，终于借到了这本书。一位跟我学习中文的中村君，还特意把有关这本书的评论资料搜集后，复印给我。他的看法同我的老师的看法一样，也认为这本小说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我和吉永谈了这本小说，也谈到我们老师以及中村君的看法。吉永说：“这本小说我看过，写得很好，但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依我看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五六十年代的教材，还反映着现在的社会生活。因为小说所描写的事情，现在也每天都在发生着。”

我初听时有些诧异。“中村君说这种生活，今天已经没有了。你怎么会有依然每天发生的感觉呢？”

“你的老师和朋友肯定都是有固定职业与收入的吧？”

“是的。老师不用说了，中村君也是工作很久的。据说他的公寓房子已经快买到手了。”

“那当然他们会有如此的感觉了。他们的朋友大概也都是同他们差不多的人，他们不会有太苦的朋友。而我就一样了，详情你听我说。

“比如同我一起送报的水上谷吧，他是被老婆赶出家门的。

可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必须由他支付，房租也须他来出。他住在送报人住的小鸽子间里，一个月在五处打临时工；收入虽然不少，可都得给家中送去。现在送钱只到银行就成了，根本不用登门，可他多想登门看一眼孩子！他已经五十岁了，还干送报纸的活儿呢；不是没办法，他能干这么久吗？送报的差事，几乎都固定为学生和短期‘浪人’的工作，只图眼前利益，混个有吃有住，都是短打算。你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什么天气，早上都得起来按时把报纸送去。这里没商量，不能马虎；冬天多大的雪，夏天多大的雨，都只能受着，报纸不能湿，不能损坏。像水上谷那样的人，黑灯瞎火地登梯爬高送报，不知哪天从楼梯上一个筋头跌下去，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忍耐。日本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被视为‘弱虫’‘废物’，公司里升官发财没他们的份儿，只是受欺侮的秧子。在外边受气到也罢了，可怜的是没有职业后，像水上谷连老婆都不要看他，认为是‘败兴’‘倒霉’。可他却总想以德报怨，不仅不恨，反而希望和他老婆和解，他根本不知道赶他出公司的人，现在还霸占着他老婆。他老婆也是少见，开始还有点良心，慢慢也就变坏了，可怜的水上谷却还想入非非。你现在能干时，老婆都不要你；你老了还怎么能团圆呢？既没有保险金，也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你看他不像小说中被女人赶出家门的丈夫吗？

“我们送报人中，哪个人都有挺曲折的经历和生活。当然单纯地为挣钱来打工的学生是例外，他们各有目的，他们有穷有富。可我们职业送报人都是穷人。

“就说我吧，你看我外表活得挺自由自在。可你知道吗，我三年的收入全给家里替父亲还账用了。我高中毕业时，考上了一所名牌国立大学，可偏偏这时父亲破产自杀。他的小印刷厂被折价卖了，可是借了五千万的债呢，那厂子连三分之一也不够！父债子偿的滋味，我算是尝够了。三年来，我没有用自己的钱喝过一次酒，一杯饮料，你相信吗？不怕你笑话，我在深夜里的工作不光彩，是伺候日本女人，特别是老女人的；可我得咬牙干下去，我得替家里还债。直到现在还差二千万的债务，我哪天才能还上呢？这样，从今年初我就不再和家里联系

了，可良心发现的时候我就寄上些钱；我根本就不敢想像我母亲怎么个过法。上个月母亲打听到我的电话，她来电话告诉我说：原来住的房子已经给卖掉了，因为她不忍心看我子承父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她要我好自为之。父亲没有了，孤独的母亲去住租借的房子，小妹离家出走至今仍无下落，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说我们一家是什么日子？”

话说至此，吉永已经没有平时的神态，他是痛苦的，也是真实的。

“所以说一切都没有定数，没有希望。就说我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自己也看不起我们。这样下去能怎么样？如果不改变，我们不也得像水上谷一样吗？我们还不如他呢！他还结过婚，有过自己的家。而我们却没有过家，还没有孩子，像行尸走肉一样白混人间一回。你说，那本小说中的东西改变了吗？一切都没有变，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或许吉永的一番话，真的不再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从表面上看，日本社会的生活，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但我忘不了他说话时的神情与由衷的痛苦。

可怜的“造”人身事故者

有一段时间的夜晚，东京都内的电车大干线——中央线，常常发生“人身事故”，耽误人们归家的时间，影响人们的休息。我就曾数蒙其害，有一次到家时已是第二日的凌晨三点了。

中央线电车横贯东京都，连接许多路的地铁、电车，乃东京都内外“工薪阶级”上下班的必经之线路与当然选择方式。当然，中央线并非东京都内惟一的交通路径，还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可堪利用。但是，乘坐公共汽车与出租车也有具体问题。比如公共汽车虽然便利，可时间有限制，一般晚上十时就结束了，再往后乘车必须要坐“深夜车”。“深夜车”不仅票价翻番，而且间隔大，一个小时发一趟车就算勤的了。另外，乘公共汽车还得舍得出去时间，因为它的运行绕的圈子太大，所用时间往往要超过乘地铁电车许多。乘出租车固然轻便快捷，可价格昂贵，“红字”（公里数及钱数）的跳跃使人紧张异常，因而除非到“山穷水尽”之境，一般人多不敢随意问津。于是，每逢出“人身事故”之际，那些非乘电车不可的人，便只有在给家里打完电话后，聚集在车站内外耐心等待。等待时间的长短没谱儿，也许不用太久就能开通，也许则要拖得很晚才能再运营。整整一夜未通的情况有，但是极少。

询问“明白”的日本人，他们讲这里的电车“人身事故”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说来，所谓“人身事故”即指在铁路线上、电车运行当中所出现的行人死亡事故。这种情况的发生，多半是意外的，特别是就电车司机的主观愿望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几乎没有哪一个司机希望在自己当班时，把行人撞死，给自己的精神招致那么大痛苦。然而就“人身事故”的另一方而言，即那些事故的牺牲者——被撞死的行人，却不一定都是纯粹“意外”。很有些人是“意内”的，因为他们是来寻死的，他们是准备自杀的人。那么自杀寻死，为什么喜欢跑到铁路上来呢？

据有关方面统计，利用在铁路寻死而追求某种“轰动”效

应的人，有，但微乎其微。因为怀抱着“你看，因我之死而把偌大铁路搞乱”心理的人，毕竟不是正常人的心态。而大约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自杀者，是有着极为“正常”的心态，也就是为了金钱的原因。按照一般的保险金付还规则，“自杀”不是自然死亡，也不是“意外死亡”，属于非正常死亡的范围；而非正常死亡，其家属或继承人一般是得不到保险金的。就像阿瑟·米勒笔下的《推销员之死》中的“推销员”一样，他得把自杀隐蔽为“意外”死亡的交通事故，才能把保险金留给自己的妻子。日本的保险制度，大致亦如是。各家保险公司都有极为完善的各种细则与对策，审查各种“死亡”，堵住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漏洞。因为对于像“死亡”这类最高规格的保险金，他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对待。不然的话，其后果与影响也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在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发生在铁路线上的各种“人身事故”。

日本有这样一个惯例，即凡发生在铁路线上的死亡事故，不管是意内的、还是意外的；也不分什么形式，或撞或轧，都一律被称之为“人身事故”，并且按“事故”处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铁路部门就得首先出面承担责任，并付给死者家属或继承人一笔赔偿金。也正是由于有铁路部门的承担责任在先，余下的各个部门、环节也只有“萧规曹随”；保险部门尽管不情愿，也只好“忍痛割爱”。虽然他们会打些折扣，但付出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当然，至于最终保险公司能付多少，是须依“事（逝）主”参加保险的内容、规模，以及每个月交纳金额的数目而定。可这笔凝聚着鲜血与生命代价的金额，数目不会太小；尤其是对那些敢于以“赴铁而亡”来结束性命的人来说，或许就是久旱的甘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下定决心，制造“人身事故”；用一死来为家人或继承者挣得“最后的晚餐”。

虽然这些“造”人身事故者的自杀原因各异，但与金钱相关则是共同的。他们当中不乏身负巨债、可又归还无望者，那么觉得人生沉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然那些虽欠下天文数字的债务，但精神依旧潇洒的人不在此列。因为他们知道，一己之区区性命的代价亦不足以还其一二；铁路上的自杀，所谓

“人身事故”是轮不到他们头上的。而那些为了摆脱自己沉重的精神负担，为了还清债务之后，还能给家人或继承者稍带些小小的利益，也算是作为对家庭或情感缺憾的补偿的人，他们会振作精神，从容就“义（利）”。至于会给上下班的“工薪阶层”带来麻烦，影响休息，对不起，只好请求担待。好在这种麻烦，远不是致命的，于是人们也就不那么恼怒那些“事（逝）者”了；只是以为：这些“造”人身事故者，为死尚耗费如此之精力，且用心良苦，委实更使人觉得凄切悲凉，可怜惨痛。

“底层”

日本有许多人不承认他们的社会与生活中有“底层”存在。如果你说到了，他们总是笑笑，然后纠正你说：“我们都应当算大多数阶层吧。”应当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足，他们普通人民的温饱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但日本社会依然存在着“底层”。这个阶层当中的人们生活还很悲惨；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景气，这个阶层还有着扩大的趋势。

姑且不说在新宿车站内、或者上野公园中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乞丐吧，因为他们的破落是有种种缘由的。但是有一点大致是没有错的，那就是他们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违背任何法律才走到这一步，沦为乞食者的。当然，他们当中不乏身强力壮者，尚能找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本是可以免去露宿风餐之苦的。而对于另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背井离乡，同样在积极努力的工作，却始终没有摆脱贫困，仍然挣扎在艰难的生活里。我所说的“底层”，主要是指这部分人而言的。

普弘整备公司是一家专门为铁路车站、大的公园等地方，提供打扫卫生服务的公司，规模不小，人数很多。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可以分这样几种：纯粹的这家公司的职员，人数不多；别处退休人员到此工作的，人数最多；有一定劳动能力而患某些病症的“残疾人”，以及被原来工作的公司辞退而又没有其他办法的人，这两部分人数亦不算太少。他们多数都是“契约社员”，即较为固定的临时工。我所说的“底层”多为后两种人。

新宿事务所大约有后两种人三十多名，他们连同退休者，即单纯的临时工，负责整个新宿“国铁”车站的清洁卫生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清晨六时到第二天的清晨六时，当然这其中包括吃三顿饭，以及各种休息时间于其中。他们隔天工作一次，一个月至少要工作十四五天。这样一个月下来，他们平均每人的实际工资也就十三四万日元，当然这是纯收入，

各种税金等都被扣除了。这种收入在日本普通行业当中，虽然不是最低的，但也算比较可怜的。况且没什么希望按所谓“年功序列”上升了，因为他们不是正式职员。但对残疾人来说，由于公司给支付了养老保险，伤病等治疗是全部可以报销的，这算是对残疾人的一种实惠吧！可是，这种微薄的收入，对于失业后无别的办法的人来说，则是难以维持生活的。

有几名四十五六岁的失业者，他们也是属契约行列中的。倘若他们没失业，从年轻时起熬到现在的岁数，处于正常情况下，或许还不至于太坏。但他们的“半途出家”，则使他们惨得不能再惨了。这种可怜的收入、低下的社会地位，都使他们陷于精神的苦痛与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窘境里而无法自拔。他们的生活怎么维持？他们尚未买到手的房子还怎么继续分期付款和支付利息？他们的孩子还怎么受教育？虽然日本学校在高中前都是义务教育，基本不收费；但不收费并不意味着全部可以不花钱，因为有些学校活动，以及好的私立学校，都是收费的。这些问题，从他们始终阴沉的脸上似乎寻不到满意的回答。这些人几乎没有那些日本男人身上的恶习，他们倘喝酒则必定不敢抽烟；偶尔没带盒饭，到外面饭馆里必挑最便宜的吃。对他们来说，每天的开支都是算计好的，绝不能超计划。实在忍不住去游乐场走一遭，不是罄其所有，便是负债而归；弹子机和一切赌博好像也跟他们过不去。他们的妻子，不得不外出工作，以同样微薄的收入共同支撑这个家。

还有一些步入契约行列中者，是多年而无所成的“浪人”。他们虽然没有买房、抚育孩子的艰辛，但同样也更没有任何希望。他们离家在外，租下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人尚可应付，可以后的出路呢？却毫无光明可言。他们不敢想有家，更不敢想有孩子。他们只有混下去，走到哪里算哪里。“今朝有酒今朝醉”，根本不管、也管不了“明日死和生”！发工资的时候，他们也敢去“红灯区”走走。当然，不敢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身份。虽然说顾客是上帝，上帝是来送钱的，可每个上帝还是不一样的吧！他们买马券、打弹子游戏机，直到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折腾光为止。

尽管日本是金钱的社会，只要是有钱，没有什么人会难为

你。但是除去钱之外，还有一些维系人们情感纽带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反映着金钱关系，但又不是单纯地为金钱所决定的。比如说亲戚朋友间的婚丧嫁娶这些礼尚往来，是不可少的；因为其中不仅表现着金钱，也折射着与金钱有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可是，失业者也好，昔日的浪人们也好，则只好被统统排除在外，因为只进不出不是“往来”！这无形中又是一顶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一个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获得人们尊敬，是无从谈起的！

在日本社会中，那些从事着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身份又极差的人，就是他们社会与生活的底层。这种人或许确实能力不足，但他们也在尽着自己的点滴之力，整个社会的繁荣当中也包含着他们辛勤的汗水。然而这些人生活还相当悲惨，他们只能求做到大致的温饱：廉价的瓜果菜蔬，或是简易的方便食品，就是他们的主要吃食。不用说，减肥与健美是根本与他们无缘的。

不光彩的裸露

——AV女演员的一席谈

一个极为偶然的的机会，我受一家中文报纸之托而撰写专门报道文章，就经人辗转介绍，并由一位陪同者跟随，采访了从事AV的一名女演员。在日本这种职业被斥之为“淫乱之家”，当然也有人则称之为“人性最充分的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还是持前一种看法。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几乎都是不使用自己真名实姓的；而一般稍微正规些的公司招工都明文规定：凡涉“风俗业”中，属绝对排斥的对象。于是，经介绍而被采访的这位女演员，用的也是“假名”；不是所谓日语的“假名”，而是生活中的假姓名。为了写文章的方便，我们姑且称她为田中君吧。

田中君身材颀长，形体很漂亮，这在日本的女孩子中是不多见的。而且田中君的胸部特别发达，用为她出演的宣传广告上的话说，是所谓“巨乳美女”。

田中君的脸色很难看，牙齿也有些开始发黄。她的言谈举止中总有一种逢场作戏的味道，眼角眉梢上也总闪烁着她那职业性的挑逗意味，颇让人不舒服。

坐定之后，田中君掏出香烟自己点上；然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把浓浓的烟圈吐到我的陪同者的脸上。“找我什么事？”她斜着眼睛问道。其实她本是知道我来采访她；因为倘若是别的介绍者找她的话，那么谈话的地点就不会选择在咖啡店。

“这位中国记者想问你一些问题。”

“是写文章吗？用日文吗？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对我的知名度有好处吗？”

田中君一连串的无礼发问，让人讨厌。

“不用日文，也不在日本杂志上发表。”

“那与我有什么好处呢？纯粹是耽误时间。”

“不对你的知名度有好处，就不能谈话了吗？平常你恐怕

也难得有机会说说心里话吧？”

“这倒也是。我是‘性’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是人拍照、表演，然后是领钱、喝酒、睡觉；或者是争风吃醋，胡打乱闹。是没有人这样坐着同我们讲话，我们的岗位在床上。”说完，田中君扬起头大笑起来，引得周围的客人投来不友好的目光。但她却满不在乎，然而笑过之后，她的眼圈似乎有些湿润。“这是眼睛湿，不是什么别的地方湿。”她又调侃起来，搬出了她们那一套术语乱说。

我想不能总由田中君乱说胡吹，必须得由我提出问题，牵着她讲，才能达到我采访的目的。

“你第一次表演AV时有什么感想？在日本，你可以做的工作多着呢，为什么一定要干这种职业呢？”

“你这种话让人听起来不愉快。社会上的工作，总得有人干；不能说只能干这，不能干那，这种想法恐怕是你们中国人社会主义的想法。”她顿了一顿，接着又说：

“但我告诉你，我和那些东京的，或别的大城市的女孩子不一样；原来我是很纯洁的，直到十六岁，我还没有和男孩子亲热过，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田中君打开了话匣子，慢慢地讲了起来。

“我是农村牧场的孩子。妈妈离婚后，带着我生活很艰难。虽然日本的没钱人艰难困苦，但‘孤儿寡母’经营小牧场的艰辛，是你们城里人所想像不到的。你也许看过《远山的呼唤》那个电影吧。除去没有那个干临时工的男人，我们家同武志家一样。只不过妈妈是妈妈，而武志则换成了我。

“每天喂牛，挤奶等活儿把人累的程度，你们没到过牧场的人，是根本想像不出来的。在这样的环境锻炼下，我慢慢地长大；我很能吃，发育也极好。只是山区远没有大城市那么自由自在，男女孩子可以有机会接触，一起玩耍。

“我们家里很寂寞，除了看电视之外，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消遣。我同妈妈的话也不多，能说些什么呢？又哪里有那么可说的呢？而在干活时，奶牛就变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同它说起来可以没完没了。有一天，在牛棚里，我突发奇想，萌生出我和奶牛比一比乳房的念头。于是，我脱去上衣，按照我想的

那样去做了，结果我很愉快。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粗野大笑。把我惊醒过来，我赶紧穿上衣服。回过头来，又吓了我一大跳。窗口，一张络腮胡子的大脸，正对着我大笑不止，于是我很不好意思。

“这个人的眼睛极明亮，瞪起来使人害怕。他看着我窘的样子，又大笑起来。说实在话，我从来没听到过男人如此的笑声。我更不自然了，谁知他竟从窗户跳了进来。他指着我的胸部说：‘你很美，你的身体是你的好本钱。你愿意让我给你拍个照吗？我是拍电影的，我能让你成名，让许多男人都跪倒在你的脚下。那样，你就能有很多钱！你不想跟我走吗？’

“事后我才知道他是AV界小有名气的导演，他本是到我们牧场拍照，给自己出版摄影集的。看到他手中的摄影机，又听到他诚恳的话语，虽有些不安，到使我不害怕了。想着自己和妈妈的生活，这也算是人过的日子吗？此时我心中一阵阵波澜起伏，似乎坚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可又不能不犹豫，因为长到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呀！

“这个家伙的眼睛极厉害，他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你不用担心，现在不用，将来你出了名，有了钱，你就更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你应当到外边看一看，闯荡一番。东京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凭你的身体，挣到大钱是不用费力的。你年轻美丽，永远呆在这牧场里，不用说那是太浪费了！你可以先用你的身体工作几年，有钱，有名，你不愁找不到好小伙子；那时你再安稳地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呢？’说完，他掏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了起来。很快，他又把名片递给我。‘这上边写的是我现在的地址。你想好了，就到我的房间来找我。不用打电话，我一直都呆在房间里，你可得记住，我明天晚上六点从饭店出发回东京。’

“他说完，用双手紧紧搂了我一下；然后拣起放在地上的摄像机，大笑着，摇摇摆摆地从大门口出去了。

“从那之后的几个小时，我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跟这个人走，不管会发生什么。结果，当天夜里我就去找这个导演。我把我处女的贞操、情感都贡献给了那个日后让我成名的他了。”

田中君的叙述，稍稍停顿了一下，她从手提小包中拣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同今天一样的生活。最初，我想我的出走是对不起妈妈的。我给她留的条子，写得也太生硬了。所以，在录相机前，我心里总喊：‘妈妈，你就当女儿死了吧！你没有这个女儿！’两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家时，我给了妈妈一大笔钱。她是那样高兴，然而我却伤心了。她不问我的钱是怎么来的！她说她已经知道了我现在有名，可却不问这是什么名！我多希望妈妈给我个嘴巴，骂道‘贱货，你还给我回来喂牛！’那样，我觉得我的心到会安宁许多。可妈妈却没有，没有……”

“这之后的生活，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坦率地说，因为最初是和导演一起拍戏，我还不十分反感。他是第一个从我身上摘到果子的人，我至今还遗留着这最初的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他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这之后，又有数不清的女孩子是从他那里接受洗礼，开始摄像机前的生活的。

“你不要听我嘴里说到恋情，你就笑。”田中君突然对我的陪同者大叫一声。“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得生活下去。至于怎么个活法，那是个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正经、正派的日本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的经历和眼泪都博得不了他们一丝的同情，这是应当的。因为不干这一行，人也能活下去，像我妈妈喂牛，还有像很多漂亮小姐开电梯，她们是真实的人。我们不能和她们相比，我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们的职业绝不光彩。可是，我也要说明，干我们这行其实也没有什么！如果大家都那么正经正派，我们那些录相带还卖得出去吗？我们不早就该失业了吗？那么多正经、正派的人，在家里看的不都是我们的可恶表演吗？更不用说今天咱们社会中的伟人、名人，他们干得就比我们强吗？他们的许多表演还不如我们呢！我们是把本来应该秘密的给公开了，而且是那么不光彩地给公开了！而他们是把本来应该公开的给秘密了，而且是那么巧妙地给秘密了。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他们的体面与我们的不光彩。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当然是不合理的，可有些被认为是合理的就那么圣洁吗？”

“说完了，我竟然说了这么多。不过，我还得再干几年，没有别的选择了。当然，假如再活一次，我一定不干这行当。可今天不行了，我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已经没有办法了。不过，我真希望你们中国别有这个行当了，人类有些地方有的东西，其他地方就不必再有了；更何况你们本来没有，就更不必增加了。对人类来说，有这么多已经足够了！”

说完，田中君起身走了。她的神情和初见她时一样，没有喜悦也没有悲哀。

但是，田中君的一席话中，难道就没有值得思考的东西吗？人应当怎样生存才算生存得好。

人类应当怎样建设自己和完美自己呢！

平凡人生

——记公司女职员原田

原田女士四十岁，独身。原来是东京内一所教育类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为一家消费者协会属下的小公司职员，负责事务性工作。

原田女士自己的家在埼玉县内，是两间一套的公寓房。从十年前她就开始分期付款购房，据说在原田女士退休前大概能买到手里了。谈到房子，原田女士总是笑着说：“别人都以为我幸运，退休前就能付款完毕。但别人不知道，我买的房子是旧房子，再过二十多年，谁知房子还能不能住人呢？”

原田女士工作单位的地点，在东京银座。从家到公司仅通勤时间大约就得用去一个小时三十分，加上两边行走的时间，每天上班来回至少得四个小时。通常她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多一点儿离开家，到达车站大概是七点半钟；乘慢车换快车左倒右倒，九点钟能到达银座。在车站附近吃口东西，走到公司正好九点半；虽说距十点钟开始上班，还有三十分钟时间，但是要烧水、给上司准备好咖啡或茶，再做一下自己的工作预备，时间也谈不上有多充裕。一般的时候，原田女士下午五点钟就应该下班，但正像日本所有的公司一样，到了点根本走不了，少说还要再干一个半小时，能在七点钟之前离开公司，就算早的。七点钟离开公司，坐上电车就得七点半，和早上一样左倒右换，九点半钟到家，就算是相当妥当的了。假如再有些活动、应酬之类，那么大概就得凌晨左右才能到家。这样一个星期下来，原田女士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所以，每周六的上午十二点前，照例是原田女士的睡觉时间；所有的其他安排，都是从下午二点以后开始的。但是要作说明的是，像原田女士这样的生活节奏与时间安排，在日本是极普通的，她远不是最累的；因为她既无家室拖累，又不经常出差。日本一位大公司的职员，因超负荷工作而死亡，这位职员的家属起诉，状告她丈夫所在的公司。人们发现这位职员在一年之内，仅国外出差的时间就

达一百多天。

除去体力的消耗之外，最不堪忍受的还有精神上的压力和疲劳。原田女士未婚，对她来说精神压力主要来自异性上司的“性骚扰”和同性上司的嫉妒。日本公司，特别是日本小公司的领导，有时不怎么尊重妇女。倘若是限于时间地点倒也罢了，因为日本有庞大的“风俗业”；那些从事“风俗”工作的女性，大概也够供他们取笑的了。然而不，许多人偏把自己公司中的女性，也视为玩弄欺辱的对象。记得原田女士说过，她的四换职业，主要都是为了摆脱上司的纠缠与胡闹，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她现在工作的小公司，顶头上司是一位女性；虽然可免昔日的“性骚扰”，但却招来了“大”嫉妒。这位女上司年近六十，相貌极平常，但心胸狭窄，处理问题简单生硬；尤其是看不惯原田女士接待男性客户。每见客户中的男性对原田女士稍微热情些，就招致这位女上司的妒火，生发出一些始料不及的小小灾难。为此，原田女士大为苦恼，她常念叨：躲过了异性骚扰，却引来同性嫉妒；我这是何苦呢，找这么多麻烦！

原田女士因学历最高而任股长，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再有升迁的机会了。可就是这么个小小板凳，也常常为其他人所觊觎，总希望有朝一日原田被人娶走、辞职，腾出这把交椅来自己坐。处在如此压力之下，原田选择了学习中文，以便将来考取中文翻译，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样一来，当然也就更忙了。她在临银座不远的一所中文学校学汉语，至今已坚持三年之久了。汉语水平考试，她参加了两次；达到由中国教委认可的汉语水平二级，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冲刺一级大关。由于专心，没有外界干扰，原田女士的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但是对于再选择一次工作，则似乎信心不足。原田女士说：“目前如此之不景气，找新的理想的工作是很难的。如果我现在失去工作，那我可怎么生活呢！我的房子才买了三分之一，余下的部分我拿什么去付呢？我原来想当翻译会很有意思，这也太天真了！我们这个社会里，职业就是职业，根本不能抱有无意思的幻想。我们现在听课学校里的中文教师，是日本很优秀的翻译；可她除了给我们上些课外，别无收入。我害怕成为她那样的人，况且还成不了；她有家庭，有丈夫的稳定收入。我要是那样，你

说会惨到什么程度！”

于是，原田女士把精力放在如何对付她的女上司上面，使之别那么小肚鸡肠，时不时妒火中烧。原田女士想方设法请客送礼，多加恭维，据说已经大见成效。可谁知这位女上司突然中风，一病不起。接替者是总上司的情妇，还是位女性；年龄虽然不大，可原先女上司身上的特点不仅一应俱全，而且还特别喜欢“拉”部下们喝酒，自己却从不付钱。原田女士戚戚然。但是为了生存和继续分期付款买房，她必须得和这位新的女上司打好交道，以求安宁。能否成功，尚不得知。

别一种“苦恼”

——记吉田科长

吉田先生今年四十五岁，夫人是家庭主妇，有二子一女。吉田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化学系，从二十二岁起就任职于专门生产橡胶产品的一家大公司，现在位居公司海外部次长之职。以日本公司的“出世”而论，吉田应当算是幸运的，因为倘若还是四十五岁还不能闯过科长大关，那么可能也许就会是一辈子的老职员了。吉田先生不仅突破了科长，还更上了一个档次，当上了副部长。按理说应该是志得意满了吧，然而他虽也高兴，但却不能尽兴。据他说，他的苦恼最具有“毁灭性”，他的苦处在于没有钱。

吉田先生是从日本的东北部山形县“上京”读大学的，促使他能够考上东京大学的主要动力是因为他家没钱。如果考不上国立大学，他就得去作工，从而失去再学习的机会。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如愿以偿，考取了东大。毕业前，吉田又被这家大公司相中，自然也是十分高兴。二十多年前，许多日本年轻人是把进第一流的公司，当成奋斗目标的。吉田的成功，着实使人羡慕不已。为此，他家乡中最富有的一位老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三小姐嫁给了吉田。婚后，吉田先生过得很不错。可是，岳母的突然病故，拆散了原来的岳父一家。岳父丧妻后另择一妙人，从此几乎与家中的孩子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高高兴兴地厮守着新夫人过活。

吉田先生这位昔日乘龙快婿，无奈也只得退避三舍，携妻子来到东京，住在公司的宿舍里。此时，吉田先生已有一个儿子了。又过了三年，吉田夫人产一双胞胎，一子一女，甚是可爱。那时吉田先生已任科长了，每月收入相当可观。可是他一给你算账，那收入就又不很多了。“扣除各种保险和税金，在我夫人手中也就只有三十余万，五口人吃饭，三个孩子上学，你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就缺起钱来。甭说别的，就是给三个孩子买鞋，也是不少的钱呀。”当吉田谈起他的家庭用度支出，很

是无精打彩。

本来就不大富裕，又因为吉田夫人出身富有之家，不大会过日子。依她看，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但有时还是坚持不到月底。当然，结余与存款是更没有可能的了。

吉田先生的大儿子应试东京大学，未能如愿。为了尊重儿子的意见，也为了减轻给儿子支付私立大学昂贵的费用，大儿子继续复习，准备再做一搏，以求成功。当问及吉田他的孩子这回应试该问题不大时，他笑笑，风趣地说：“‘东大’是没有问题，因为它哪年都招生；有问题的是我的儿子，谁知他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呢？”

再过一年，吉田先生的宝贝双胞胎儿女，又该参加高考了。对小儿子，他希望能考上国立大学；但对女儿，他则只求上个“短大”什么的就行了。他说：“日本人常说，养女儿是‘奢侈’的事。因为培养起来到大学毕业，最后要给人家作媳妇；然后是养孩子，相夫教子，一二十年内根本不能工作。如此算来，不是那么富有的人家，把女儿送进短大，也已经是不易之事了。”

有一阵吉田先生的脸上总是愁云密布，显得极不高兴，问及才知，三个孩子要一块进行补习，可光报名费就要十余万，学费还不计其内。如此一大笔开支，“我哪里去找？”吉田先生摊开双手。如果让夫人出去工作，增加几万余元的收入，日子可能会稍好些。但是，夫人操持五口之家的吃喝用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出去工作，岂不更累？吉田先生心疼夫人，说什么也不让她出外工作。后来，据吉田说是孩子们自己打工赚钱，硬是挣够了补习的全部费用。他很高兴，也感谢孩子们能够如此体贴父母。

就在新年前的一个星期，吉田先生突然被任命为这家公司驻东南亚某国的首席代表。待遇相当于部长一级。他虽然极高兴，但对逼着他即日启程，以便利用新年期间去熟悉工作的计划安排，则大为光火，大骂上司没有人性，不体谅亲情。可是不满归不满，还是无奈，只得按时启程，走马上任。吉田先生说：“辛苦一年了，多想和孩子们一起过个年啊。家我倒不惦记，我夫人身体不错，也还不到生病的年纪。孩子们则更是听

话，而且都能帮助妈妈干事了。平常我太忙，没法和他们在一起玩玩；本来计划新年是回老家的，这下只得分别，在电话里祝新年好了。”

吉田先生赴任去了，他没有后顾之忧。他的夫人仍旧辛勤地操持家务，只是丈夫不在家难免有些寂寞。孩子们都很好，也已经知道惦记他们的父亲了。看到这情景，我又想起吉田先生的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明白事。我根本不担心我的孩子们会学坏，因为我什么钱都没有。”

永远都不能脱却的印记

——孤独的“外国人”

日本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外人”，即主要是与日本人通婚后而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他们虽然有别于短暂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可他们依然是“外人”。日本人在使用这一词语时，毫不含糊，一个“外”字，似乎就能把他们同日本人截然分开了。在这部分“外人”当中，或许以原籍为巴西的人数最多。

木下顺子，原名拉什伊娜的这位老大姐，就是生于里约热内卢，长在里约热内卢，最后嫁给日本人作媳妇的巴西妇女。她已经六十有六了，脸上的皱纹极多，她自己戏称为“五线谱”。她嫁给木下精一氏已经四十余年，在这当中她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倒不是因为她有条件可以不工作，而是因语言、国籍等原因，她不能有一份正式工作，所以才一直为临时工，是一名典型的“外人”劳动妇女。

“星期日大姐准备做些什么事呢？”我问这位老妇人。

“星期日什么都不干，主要就是做饭。做巴西风味的饭菜。最近这段时间太忙了，很久时间没吃家乡菜了。”

“喜欢日本饭菜吗？”

“日本菜很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四十年了，您还没能喜欢日本饭吗？”

“别说四十年，就是再过四十年，我恐怕也仍然习惯不了。在巴西的经历，对巴西的思念，好像是大树上刻下的字迹，它不会随着树木的生长而消失。”

据别人说，拉什伊娜有二女一子，他们都在日本公司驻巴西办事处工作。老伴木下原来是建筑工人，很是精明强干，也很能挣钱。可是从年轻时代起，木下就“好酒及色”，每月只是在送工资时才回家一趟，其余时间都吃住在外，孩子可以说都是拉什一手带大的。虽然木下每月送来的工资不算少，可到月底时，他往往要把本来给家里过日子的钱再取走还债。他有

钱时喝酒、胡闹是用现金支付的，可钱光了的时候就欠债，然后再把给拉什过日子的钱拿走去填窟窿。有时还不够，那么拉什就还得再去作临时工，把挣来的钱也凑上充数。时间久了，拉什就不得不到外边工作，每月所得或是充作生活费，或是替木下还债用。就这样，拉什实际上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俭朴的生活，供孩子们读书。正像俗语所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拉什的三个孩子都非常有出息，他们都是考上国立、公立的大学才得以完成学业的。这些孩子对他们的母亲非常好，但同时又痛恨父亲的所作所为。他们已为母亲在巴西买下了舒适的住房，要母亲同他们一道在巴西生活。但拉什不肯，她要照顾年迈的木下。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缘故吧，木下年老力衰，已非昨日那般荒唐而变得老实、温柔了很多。他悔恨自己昔日的荒唐，更后悔至老未能买下小小一间房。但他已经老了，没有办法了，只好偎依着拉什过生活，住便宜的公寓房。但拉什由于有了可靠的退路，即将来回到巴西生活居住，因此也就不计较仍住公寓。为了把木下照顾得更好些，拉什仍旧外出工作，以便多挣些钱补贴过日子。

在日本，若是到老还不能买下一所，或是一套住房来，那么就会被视为极没有用，极失败的人，至死都只能背着“低能儿”、“穷鬼”的牌子进棺材。因此，拉什忍受着周围人的白眼和房东从心底里的藐视，极坦然地过着生活。

拉什对自己的境遇表示满意。虽然她自嫁给木下后，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今天儿女们的自立，比较安定的生活，甚至是木下的“温柔”，都使她从内心感到满足。虽然，人们对拉什的出身、经历，以及如何嫁给木下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但从她的脸上，从那深深的皱纹当中，依然可以看到残存的诱人的光泽，那光泽在昔日会是怎样的一种风采！拉什总是说，木下曾经救过她的命，救过她一家的命，因此她跟随木下过什么样的日子都心甘情愿。但她沉重地说：“你们能体会那种寂寞和痛苦吗？没有一个亲戚理我们，在木下家族任何一个活动中，我永远都是缺席的。这缘由我是知道的：一半是因为木下没出息，混得不好；一半是因为我为外来者。孩子们总说他们的父亲不好，可是你要知道，在日本一个好人，一个有教养的、

有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找一个外国人作妻子的，除非是有财产有地位的外国女人。外国男人娶日本女人是一回事，日本男人娶外国女人又是一回事。”

玉珍女士的丈夫是一位年轻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曾在中国留学数年，讲得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他不仅语言过关，而且许多习惯已近乎“中国化”了，用日本人的话说，乃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日本男人。玉珍女士同他是在中国结婚，后来又随他返回日本的。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可玉珍仍然说：“和外国人一起过太不容易了。我的先生是难得的日本男人中的好人，没有任何恶习和不洁嗜好，既忠于家庭，又对我很好。在外人看来，我们即使不算是很成功的‘国际婚姻’，也称得上是相当成功的‘国际婚姻’。因为我与一般的中国、东南亚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在日本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并且就地位而言，我也不比我的先生差。而我的先生也远比那些或有恶习陋规，或是因在日本娶不上媳妇而去海外娶女人的日本男人，强不知多少倍。可是说实话，我很寂寞，原因就在于不能相互沟通理解上。有时候，我们谈话总拢不到一起去。在我看来是极容易理解的事情，到他那里就变得特别难。相反，我不理解的，他却处之泰然。传统习惯，以及所受的教育，还有那深深植根于内心的民族本性的东西，都太不一样了。这又是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的寂寞，目前还能忍受；如果哪一天，这寂寞痛苦无法忍耐了，那也许是别的样子！”

小杨是北京人，他娶的是一位比他大十岁的日本太太。他太太的品格、为人、教养和学识都无可挑剔。尤其难得的是，小杨太太还是一位对日本帝国主义罪恶侵略，对当前日本教育中存在美化、抹煞侵略的作法有着极鲜明看法的人。用她的话说，“日本人不对中国赔偿是天理不容的事情。即便是赔偿了，也无法洗清昔日的罪孽；更何况今天既不赔偿，又不从内心深刻反省，还试图歪曲历史呢？这就更对不起中国人民。”小杨太太在民间友好团体中工作，她把从中国、韩国所搜集到的，反映昔日日本灭绝人性的有关资料制成录像带，在学校等团体集会上放映，用来教育日本青年学生，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历史。对于这位老大姐，小杨极为崇敬，由此而萌生爱情。但是结婚

后，太太很愉快，小杨却不能满面春风。他们的宝贝女儿已经开始上小学，但却全无聪明伶俐天真活泼的小杨的半点影子。据医生说原因是母亲岁数太大了。小杨最怕人议论他的国籍问题，更怕人们说他是有所图而娶日本女人的。他总是颇忧郁地说：“我还是中国籍，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的太太和孩子，将来也是要入中国籍的。我不能忍受‘归化’这两个字，所以在日本，我只能坚持‘外人’的立场。我不能放下她们娘俩几个不管。自从有中国留学生到日本，不乏娶了妻之后又甩开的先例。你们不觉得能过下去，干什么娶人家呢？我也是娶了日本女人的，而且还娶了一位老大姐。我后悔尊敬不能当爱情，可这种后悔只能吞在肚子里。我不能像那些利用人家，或者只图一时兴致而不负责任的人一样。我不能离婚，我只能守着她们母女过。我想我这样做，也算是为了给咱们几代留学生中‘始娶终弃’的人扳回些面子吧！我不知道这十字架会有多重，既然我选择了，那我就背到底！”

我很同情小杨。当然，我也更知道他所说“始娶终弃”者的意思：有些留学生为了暂时的利益可以忍受任何的屈辱，可一旦他们觉得自己毛羽丰满，没有婚姻条件照样可以立足的时候，便露出了“大丈夫”的嘴脸，或离或弃，远走高飞。小杨比那些只图一时兴快而不负责的人强得多，也道德得多。可是，另外一位韩国朋友对小杨虽表同情，却对其作法不以为然。这是一位风度极好、教养颇佳的韩国小姐，她是学校中被众多日本男同学追逐的目标之一。有一天，在联欢会上，这位小姐多吃了一些酒，便不同寻常地大声说话：“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对不起我自己，不能对不起别人。因为我一想到同日本人结婚，就有一种屈辱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我不好，但我无法解脱出来。如果一定要让我同日本人结婚的话，那也好办：先杀了我，再结婚。”

小草千千

——世纪末的赴日留学生

当年以“小草”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闯东洋——日本留学一千天》之连载，反响极为强烈；之后出版的单行本亦很畅销。小草的叙述，对于那些在日本的留学生来说，或许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有谁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无论是少的几十天，几百天，多的一千天，几千天，他们大都是像小草所说的那样度过来的。而对于当时成千上万准备赴日本闯荡的后备军来说，小草的文字则是新奇的，她的名字也就是自那时起，飞落到他们的心头之上的。那紧张的生活节奏，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痛苦寂寞，那艰难的跋涉与奋进，以及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其实近在眼前的“历史”，还有精神上特别的熬煎，如此这般对于尚未领略过扶桑风光的人来说，有启示意义，也未尝不是一种诱惑。

小草所描写的自身经历，在我也留过几年东洋之后，仍以为是比较客观实在的。自《闯东洋》之后，虽又有诸多大作面世，还有比“小草”更大红大紫，出足风头的作者。然而其叙述与描绘或过于冷酷，或过于繁华，或过于迷离凄切，或过于大刀阔斧，似乎都缺少些真实的感受与特有的意义，不足与“小草”相伯仲，更不用说那些等而下之的货色了。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纪末的中国赴日留学生，就是那茂密的千千小草。

赴日伊始以及最初阶段，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吃住与说话，即“生活与语言”问题。留学生中的很多人是抱着宏大的学习目的，才踏上那块陌生的岛国土地的，或学语言，或学文学，或学艺术哲学，或学电影戏剧，或学经济管理，或学畜牧电机，虽林林总总，千差万别，然殊途而同归是也。用一个很天真的男孩子的话说：“我不仅要学完大学，而且要读完博士后。”这个孩子的曾祖父，曾是满清政府所派的官费留学生，在法政大学毕业后归国，民国时代及稍后的时间里，曾为国家和人民作了不少好事。于是，他便常以他的曾祖父自况自喻。但是，

当他一踏上这块他的曾祖父也曾踏上过的土地后，他才发现先前的“豪情壮志”是多么幼稚与不切实际。不用说专业学习，就连最初的语言学习，也必须是“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则近乎于“天方夜谭”。为生活而奔走，找房子，找工作，交学费，这些都是在上课学习之前就要完成的。东京是全世界中城市生活费用最高的都市，不仅“米贵”，房租贵，举凡可计所需之物，无一不贵。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而大把的挣钱，则又远非易事。生活费、房租就已经让人头晕眼花了，再加上昂贵的学费，则似乎更像被抽去了底火一般。况且还有语言问题呢？大家不都是得从语言学校开始的吗（直接进大学院的人暂不计入）？这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大多数赴日学生的最初一步，便都是进饭馆洗盘子刷碗，或者是什么别的粗活儿。由此也就知道了：学习乃为遥远之事也。今日的赴日留学生，既无昔日大清国留学生的公派银两，又无赴美留学生的“托福”保驾，其最初时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没有吃的肚子饿，无法学习；没有住地睡不着，亦无法学习；没有钱交学费，或者因打工时间与上课时间冲突，为生活而工作耽误了上课，学校不给你“出勤率”；没有出勤率就拿不到签证，没有签证就更不能学习。因此，有的留学生就唱出了如此的顺口溜儿：“打工苦，打工打得人犯怵；住房（子）难，没有‘礼金’进不来；上学累，眼盯着黑板直想睡；‘入管’^②横，受了气来没处哼。”

会日语的人，虽然也苦也累，可总比两眼一抹黑的强一些。他们或许能找到稍微细些的活儿，体力节省些，收入能高点儿，可以有时间、有精力看上几眼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能干些自己想干的事儿，把自己的专业捡起来，或者学习新东西。当然会说日本话，同以日语为工具，像日本人一样进入某种状态的学习，还是两码事儿；但这进入状态之苦，与那初来乍到的杂乱，无论如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到日本之后，就比较在国内更能懂得“出外靠朋友”的意义。很多实际问题的解决，不能不靠朋友们的帮忙。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朋友亦多半儿是“老困难户”，他们只不过是早来了一年半载的，办法稍多些，如是而已。况且长久请朋友帮忙，

一是于心不忍，二是朋友亦忙得脚丫朝天，能否长时间照顾你也说不定。一般说来朋友们要的是相互帮助，只是一味求助而不能自立者，朋友们也是打熬不起的。

在解决留学的生活与学习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小草所叙述的问题，大多数留学生们都会碰到的。以签证而言，这是凡滞留在日本的人都会遇到的大问题，只是留学生则更为迫切些。且不说到“入管局”衙门的那种滋味，让人很不舒服，就是找保证人开那一堆所需材料的麻烦，有时就让人觉得很不好意思。难怪一位学成归国的朋友说：一辈子不好意思干的事儿，在日本这几年里都干了。

这里所说的“不好意思”还是留学生与保证人之间尚算朋友的关系，倘若节外生枝地发生出别的什么事，那就更为麻烦。要对保证人以“礼”，或者说以“最高级礼”相待，逢年过节也别忘了那点儿“小意思”。如果这种小意思，真变成了某种“不好意思”，那你就只好进行各种补救，或以投资为方式，或以款待为名目，总之你得用精力和身心去奔走。这种不甚平等的关系，使你有时不免陷于窘境之中，制约着你不能像朋友那样开诚布公，该说的有时不便说，不该说的又不能不讲。

日本除去特别需要的部门与专业，缺少外国留学生的通力合作之外，其余部分与专业缺少的多为一般劳动力，而远非高、精、尖人材。因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赴日留学生的去向，以及学成后滞留的性质。见面寒暄之后就问你何时归国的日本人，虽然不见得就有什么特殊目的，或者是一定要让你难堪不可；但在任何场合下的郑重而屡次发问，也未见得是没有任何居心的。最起码使回答者心烦意乱，这就更加重了寂寞生活中的忧郁色彩，让人不很舒服。其实，学费、生活费、房租等一切费用，都不由发问者支付，“滞在”与否，何时归国，“干卿底事”？

真正为学习而来的留学生们，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专业学习，因而他们的日子过得极不宽裕。与此同时，那寂寞与痛苦，有时简直是难以言表的。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朋友，考上了攻读文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几乎是罄其所有，把积攒数年的资金都支付了学费及入学金。当我见到他时，他正在

大病之中，无力地躺在床上。他不无酸楚地对我说：“这几乎是赴日后全部所得，一下子交出去，就像被剥光了皮，剔下了肉一样疼痛。”还是这位老兄，四年之后拿到博士学位，却出奇地平静。他说：“为了学位奋斗了几年，有时我也笑我的迂腐。且不说这博士学位值什么，单说做这种题目的论著，如若在国内，恐怕两个也做完了。不说艰难，单表冷清，就足以让人心里发毛。而且时间愈久，愈觉得心里没有底，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呢？”

那厚厚的论文，是这位朋友心血与才智的结晶，其中亦包含着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另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此论文真乃字字千金也。”

就在这位朋友拿到学位后，学校则令他从速归国，入管局也不再给延长签证。可指导老师的一个题目，尚未完成，必需他的帮助，才可有望成功。于是，这位指导老师以个人名义又留他工作，并且协助他办好了签证手续。同一个教研室的年轻的日本先生，极不客气地“忠告”：“您应当归国研究了，您已经事业有成了，为何还待在日本呢？”我这位朋友没作解释，确实也不好作解释。他知道自己存在，引起了这位日本“新进”人物的不满意，这位先生惟恐我朋友的被“重用”，影响他的前程。当然，他若选择了离开日本，就会省去许多麻烦。可他目前尚不能抬起脚来就走，那就只好继续忍受着吧！

当然，对于真正学有所成的人，日本人当中比较开通的、友善的人都会说：我真心佩服，我脱帽致敬！

是的，对于能以小草的精神努力劳作，终获丰收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表示敬佩。他们的成功，也都应当使我们引为骄傲的。

真希望这些“小草”能够被信赖，他们的艰苦努力，也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从而使他们在远离祖国与亲人的日日夜夜中所忍受的痛苦与寂寞能够有所补偿。或许这种理解与信赖，是会比别的什么都更能够让他们感到欣慰的！

记住他们吧，二十世纪末、特殊环境里的、赴日留学的小草千千！

附：心的歌吟

我希望把一颗痛苦而忧伤的心
留在那遥远遥远的故乡
这倒绝不仅仅因为那里是我的父母之邦
在那处深沉而美丽的土地上
有雄鸡的啼叫和田园的牧歌
有迷人的姑娘与酒醉的芳香
还因为我不愿意把痛苦和忧伤显露出来
不论是置身于大河的彼岸的世界
还是一衣带水的东洋

此刻漫步在有如“天桥”一般的街巷
身影显得那样清瘦悠长
感受着与家乡同样的无限苍穹
不同的情思却在我的心头荡漾
一样的面孔
一样的服装
一样的笑谈
甚至还有一样的心肠
可是今天的命运竟是如此的不同
却又一样属于这世界的东方
我们确实拥有辽阔的疆域
纤细的江南与雄伟的塞上
我们确实拥有悠久的传统
威严的大汉与富强的大唐
然而我们今天还拥有着这些的实质吗
难道我们永远也改变不了昔日的模样

我们需要历史的月亮
她皎洁美丽清辉玉朗
可我们更需要现实的太阳

因为现实的太阳
像圣母的嘴唇一样
温暖着人们的心田并
使人沸腾灼热荣光
我们怀念历史的月亮
我们更呼唤现实的太阳

沉思着 歌吟着
向着我们的家乡
无论是寂静的漫漫长夜
还是熙熙攘攘的大广场
与异域里的每一秒钟同步的
就是内心里无穷无尽的思想
像屈子行吟
驾六龙而飞游上下古今
念及桑梓按辔停车泣涕滂沱
像李杜赋诗
笔走蛟蛇而长歌当哭
天光云影纵横飘逸梦入愁肠

心在流血
心在歌唱
有呻吟
更有悲怆激昂
用生命的狂飙呼唤
掀开盛唐的新篇章
猛醒吧
更生的不仅仅是火焚的凤凰
还有羽化的神仙
与亘古不灭的永恒太阳

博士小影

东尾君是一所大学研究东方哲学的博士研究生，二十九岁。我同他因在一起听一位老师的课，所以慢慢地熟悉起来，经过相当一段的接触，我发现东尾君为人质朴、忠厚老成，加之读书不少，英文又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立志献身学术，且又能使人信赖的年轻人。由于我们专业相近的缘故（我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我们相见时的话题大多数为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的问题，他常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表达出较为新颖的见解，使我获益匪浅。东尾君做学问颇稳重，下笔虽勤，发表却不多，也不太想急于求成。他爱抽烟，亦嗜酒如命，他的业余收入几乎都充作他的烟酒钱。

东尾君第一次到我家时，给我带来了日本很有代表性的小点心，我则请他吃猪肉韭菜水饺。他吃了不少，也吃得极高兴，一手把杯，竟谈起他自己和家里的情况，打开了话匣子。

东尾君出身于日本典型的私塾先生家庭。如果从其曾祖父任教时算起，到他父亲那辈已是三代为“教书匠”了。据他说他的远祖则是幕府武士，至曾祖父才开始“教书育人”。他笑着说：“由武而文，则是汉字的斌字。好像是亦文亦武，其实是武不就而文不成。”

东尾君是独养儿子，至今仍然独身。当问及他“个人的事”时，他便一笑。“我做‘独身贵族’就是了。可是说贵族，其实最多只是精神上的而已；与金钱无缘，于今怎称贵族？日本女孩子是根本不会看上我的，所以‘独身’到恰如其分！”

听到这里，我也笑了。记得在补习日文时，课堂上温文尔雅的女教师教造句，其句型是“假如……一定”，或者说：“如果……一定”。女教师的示范例句是：“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嫁给有钱的人。”看着女教师认真的样子，似乎不是调侃。当她觉得我们有些愕然时，便又用“如果……一定”重复了一遍：“如果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嫁给有钱的人。”接着又大声强调，“这两句的意思完全相同，请务必记住。当然还更

得记住是‘嫁有钱人’”。

我把这个例子同东尾君说了。他点头笑笑，说“没错，没错；她们就是那么想的，老的小的都是那么想的”。东尾君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金钱使日本富足了，可也把日本人的灵魂给腐蚀掉了。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比日本人更热爱金钱的了！今天的日本没有哲学，没有艺术，没有精神上的进取，只有赚钱，拼命地赚钱。普通的国民无可奈何，麻木不仁，甚至可以说是醉生梦死。”在日本听到如此激愤的话语，实不多见。

“日本人都很紧张，很忙。上班的时间要拼命地干，下班后还要加班加点。从公司出来的任何一个职员，几乎都是已疲惫不堪了。他们已没有精力再干些别的，也不想再干别的。业余时间或是睡觉，或是吃喝玩乐，寻求刺激。他们觉得政治、哲学和文学艺术，都是专门人干的事情。特别是政治，似乎更是政客们的勾当、事业。可这些政客呢，‘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只会花国民的血税，根本不干一点正经事。比如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可是日本人对于很多根本问题，或者不认识，或者认识得极差。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的罪恶，这是非常对不起中国和亚洲人民的。这里有日本人的问题，民族性的问题，但最大的责任应当由政治家们承担。”

东尾君的认识应当说是讲道理的，他也不掩饰对“肉食者”的激愤。

“为了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拼命工作，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拼命之余，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还应当问一下为什么在拼命？拼命到何时？可是这些却没有人去想。我虽然算不上是思想家，可我确实是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东西。我也拼命工作，但工作之余我还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任思想四处飞驰。遇到我觉得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们记录下来。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不算太多。其余的人都是满街跑打弹子机，或者捧着漫画看起来没完没了。这也不能太怪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力气了。”

东尾君显得有些激动，言语也有些偏激，但我能理解，他

觉得不公平。东尾君每周大约用四个晚上，给考大学的学生补习英语、国语（日本語）和历史，还有两天下午他要到一家书店去帮忙整理图书，编写内容提要。他痛恨给别人补课，总觉得倘若考大学都得靠别人“补习”，才能合格，那将来这个人能干什么呢？他激动，因为补习者多为有钱人家子弟。东尾君虽然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人，但补教还是很卖力气，效果也极佳，命中率为百分之百。他却解嘲说，因为这些人不愿意再看私塾先生的脸了，所以能有劲头，想摆脱他，于是也就能考上了。整理图书的工作是东尾君喜欢的，尽管这个工作分量不轻，还需动脑子，报酬也少。但他还是支持下来，据他说这是有报酬的读书，因而乐此不疲。

“日本学术界也是一个样。许多人，你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开口就是胡说八道，写的文章则狗屁不通。真正有创见的人、肯动脑子的人简直是太少了。难道有才华的人，都被收买到大公司里去了吗？”

这是东尾君对日本学术界不无偏激的看法。

东尾君该毕业了，可据说出路尚未找好。像他这样有性格、特立独行的人，适合在大学里教书，或大的研究机构里搞科研。但是，教席及研究席这类位置的谋得，远非寻常事也，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还需有重要人物的提携帮助；另外左右逢源，上下交际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都是东尾君之所短。去公司上班，也像成千上万的日本职员一样卖给公司，弄得精疲力竭，没有时间去思想，这又是东尾君所极不情愿的。但他也得生存下去呀！难道他真的要再子承父业，做没有丝毫保障，总与贫困为邻的私塾先生吗？

我既祝福东尾君，希望他能有好运，同时我也为他担忧。

寂寞的先生

文学创作是寂寞者的事业，文学研究亦然。尤其是从事文学研究这种精神创造的人，必须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观察问题的敏锐与冷静，以便运用严密的思维（多逻辑思维，也有形象思维）进行科学的综合概括、分析评说，以求文从字顺，鞭辟入里。很难设想一个始终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中的人，其文字能够严整或能够进行哲理的思辨。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穷而后工”对研究者也是具有极大启示意义的。当然，这个“穷”字，绝不是仅仅指吃不上、喝不上的冻馁之虞。

日本学术界从事文学研究的先生们，特别是那些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先生们，大多数是在大学里任教的老师。他们有着比中国同行较为广泛的社会交际，其中还不乏介于学术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积极分子。这些人除去兼任的课程之外，还有数不清的饭局、演讲、集会或其他活动，弄得学生们摸不到他们的面，家中亦捉不到他们的影，颇似中国的“华威先生”。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先生们的社交活动是比较固定的，如一年一度的忘年、迎新会，还有一些学术团体的集会；余下的时间便是他们自己的授课与研究。青灯黄卷、惨淡经营者当为数居多。时间久了，许多先生们便耐不住寂寞，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增加一些预定外的活动，作为调剂之用。

我熟知的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他与自己研究室内全体同学一年两度的“饺子会”是雷打不动的。届时，这位先生必定高兴到场，并身着长袍马褂，摇动折扇，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在会上，他饮酒赋诗，慷慨陈词；高唱中国儿歌和日本东北地区的民间小调。他还问寒问暖，除去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关切之外，也对日本同学格外热情。先生说，他这样做很高兴，他这样做不寂寞。

有一次，我同这位先生交谈时，无意中透露了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学者要来日本，进行短期文化交流。于是，先生便约我代他向中国先生致意，并安排时间在东京他的寓所小叙。谁知

待这位中国先生到达后，计划全为邀请的日方所控制，且居住地距东京中心部较远，实在无法会面；故而只好通过电话向日本先生致歉，并约定将来在北京再见。过后不久，等我同这位先生见面时，他还有些不快地抱怨：既然是预定好的，就不应当有变化。不过他又很是理解此中根由，说道：“这主要得怪日方。因为经费有限，他们给安排的一切，都是‘特快’节奏，马不停蹄；所以他们最多也只能算是‘跑’马看花，毫无办法。只是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同你的先生见面的机会。”

还是这位先生，本来我们谈得正起劲；忽然间他却显得有些惆怅，颇忧郁地说：“太冷清，冷清得让人心里发毛。整日在书斋里读书、写文章，时间长了近乎于坐牢。真羡慕那些在电视台上大出风头的人，他们的人生有亮色；我们则太寂寞了，基本上是残酷。其实我们也是人，需要安静，可也喜欢热闹；我们也应该大声说话，甚至是叫骂、吵架，可这些仿佛都与我们无缘。有时，我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狼，真想能冲出去畅快地大笑、大嚷，甚至是放荡纵欲一番。”

这位先生的话谈得挺沉重。人是有感情的，人的感情有时是舒缓的、沉静的；有时则是强烈的、奔突的。倘若能够沉静时沉静，奔突时奔突，任其自然的变化，那该有多好呀。不过，也许真是那样的话，诸多评论文字，或作品中的那空灵的色彩，那淡淡的哀愁、静静的相思，也就随着强烈的奔突而转瞬即逝了。当然，那些真正的天才，也许可以不受限制，可以随心所欲，任凭自己情感的变化而一展丰采。他们可以自由挥洒，梦笔生花，“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而，这只限于那种具有天赋才能的人们。余下的，没有如此天才，且又从事这种精神创造事业的人，就只有怀抱黄卷，面对青灯，甘坐冷板凳。尽管可以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但这毕竟还只是誓言。板凳固然是可以冷坐十年、二十年的，然而文章能否字字珠玑、不空一字，那可不是说说大话就能算数的。当然，假如冷坐个十年、二十年的，尚且不能写出“实”文字；那么根本不坐，或者坐不久者，文字的空泛与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人类的分工，也创造了人们表达情感

与贡献才智的不同方式。于是，寂寞者也就只好继续寂寞下去。因为，毕竟人类不仅仅需要热闹和纵情豪迈，还需要经过热闹和纵情豪迈以后沉静下来的寂寞。所以，别太看轻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研究者的成就。在你看来也许什么都不算的东西当中，同样也包含着寂寞者极大的心血！当然，这也不是要人们一定得同情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不是，不是要同情，而是要一些理解。理解寂寞者从事这种创造活动的成绩，以及这种创造本身吧！因为它将永远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乾嘉为“径”久为“舟”

——关于日本的读书研究会（一）

尊敬的钟夏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生前所领导的《春秋繁露》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仍然继续着，他的弟子们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直到把研究计划完成为止。从他们这种精神的继承发扬上，我想到了薪尽火传这句话。

大约十年前，经钟夏先生的倡导和组织，《春秋繁露》研究会成立了。研究会的成员，多为他所在学校里选修他研究课程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以及他所指导过的、现在还从事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毕业生，总之均为他的学生辈。在钟夏先生的组织下，他们决心利用西方的一些思想与方法来指导研究，并且从最基本的字词分析入手，在弄清语句之后重新翻译、注释董仲舒的这部儒学著作，从而达到深入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目的。他们把寻觅西洋犀利理论，乾嘉为“径”“久”为舟，当作自己运用研究方法的最高境界来追求。

在乾嘉为“径”的过程中，他们首先从版本上下功夫，准备把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图书馆中所珍藏的各种《春秋繁露》的版本资料，搜集完全。为此，他们先是跑遍日本的各大图书馆，搜集《春秋繁露》的各种版本。接着，研究会又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点资金，去台湾、去北京、去南京，广泛搜集调查中国的各种版本。有些珍贵的善本，虽然他们不可能购买得到，但善本的复印件或微缩胶卷，都成为研究会的重要收藏。这样几年下来，《春秋繁露》研究会所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的《春秋繁露》、以及有关资料竟为全日本之冠了。据此，他们发表了《春秋繁露研究会所藏〈春秋繁露〉版本简介》，《有关〈春秋繁露〉版本的诸问题》等多篇论文。同时，他们还参照《春秋繁露》的各种版本，并对照原《春秋繁露》的日译本，进行重新翻译、注释。他们具体的办法是，在每月一次的研究例会上，先由某一入将自己的学习研究情况、对原文的理解认识、以及自己新译成的日本译文宣讲一通，然后再把搜集到的有关材料、所用材料的确切出处略做说明。当然疑点、最艰难处的

探讨分析、最晦涩之处的疏通，则是研究例会的重点；有时为一个或几个问题，研究会能争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般学习时，都是先由钟夏先生做有关说明，然后再由重点准备者发言，接下则是大家讨论。当遇到疑难问题时，除去准备者做说明外，就得需要研究会的核心——钟夏先生来讲解，所谓耳提面命、私塾式的教学特点，也在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也有连主讲先生自己也弄不太明白的时候，那就暂时存疑，或去查书、或去向更专门的先生请教、或“带着问题学”，在学习中慢慢理解。据说，《春秋繁露》研究会在啃《春秋繁露》这部著作时，碰到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相当多，因此他们的重新翻译进行得不算快，十七卷尚有七卷未译。而“十年磨一剑”，他们的主要研究方面，即通过研究《春秋繁露》来研究古代中国社会的工作，也还未真正得以实现。不过，从钟夏先生的“出师未捷”，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薪尽火传”上看，他们确实是实现着“‘久’为舟”的持之以恒；而且这种“久”或许还包括着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式的人生追求。因此，研究速度上的快慢也就不显得那么紧迫了。

在日本，像《春秋繁露》研究会这样自由组合的读书研究会为数相当多，几乎所有著名专家教授的身边都有自己的研究会。有的教授既是自己研究会的组织者，又是自己老师组织的研究会的参加者；还有的人同时参加几个研究会。这样的读书研究会无固定的宗旨与人数、体制限制，也没有具体的章程与规定，一切均凭老师的指示与大家的意愿。研究会的研究方向，有依具体的研究内容而定的，例如六朝山水诗、晚明小品；有依文学体裁而定的，例如汉赋、乐府诗；有依作家作品而定的，例如阮籍的咏怀诗、李白的古风与杜甫的律诗；也有完全依研究会“主讲”自己的兴趣而定的，例如唐诗中的树叶、宋词中的色彩，或是现代人郑逸梅的《艺林撷英》的分析索引等等，总之各式各样，简直无所不包。这些研究论题大的可以涵盖整个历史社会，小的也可以仅就“一斑”与“蠡测”而就事论事，显得既有生机，且又不乏新意，确实显示出我们这位近邻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规模、气象与水平。

这样众多且又显得各具特色的研究会也像《春秋繁露》研

研究会一样，采取自学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研究者们思想活跃，没有条条框框，更没有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由于战后日本学术界受西方思想方法的影响既深且大，所以他们在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方法当作一种遵循、一种指导。后来同样带给我们中国极大影响的思想方法，例如民族学、民俗学的，以及弗洛伊德、意识流、结构主义等等，也都对他们影响极大。虽然他们对一些西方的思想与方法接触得比我们早，但由于对方法本身理解得不透彻、不纯熟，后来我们出现的缺乏更深层面上的融会贯通与得心应手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也仍然存在。又由于过于注重细微末节的原因，那种大家式的眼光与才气，也是极难看到的。所以，资料的完备，研究手段的丰富，都未能让研究者们据此而谋其新创。又加上这些研究者精力、以及自身素养的问题，今天的研究水平始终未能有大的突破。看来力求运用西方“犀利”之理论与东方“乾嘉”之功夫的努力，不仅是极具特点的美好追求，而且也还对研究者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没有任何的束缚与行政上的硬性要求，这些研究会的自由参加者用业余时间、围绕着老师坚持学习，表现出他们强烈的事业心和持久耐力。因为处在日本这样一个富于变幻、色彩斑斓的社会里，没有点儿“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与献身精神，坚持下来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有的人已经是相当知名的教授了，他们的时间很紧张，他们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常常使他们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还是执礼甚恭地跟着先生参加研究会的各种学术活动，而且乐此不疲。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古之师风的发扬光大吧。

研究会的研究者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固然远非易事；然而，或许也正是因为社会生存的艰难，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等等这些因素的刺激，研究会这种以自己亲近的先生为核心、又几乎都是学校中的前辈与后辈的小团体，才更能给人一种温馨、愉悦、轻松，甚至幸福的感觉。所以这种读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来的似乎是一种外在的、学术的活动，而体现着的却是一种亲情与心灵相通的内在交流。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读书研究会能历经几十载光阴而始终坚持的原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关于日本的读书研究会（二）

如果说《春秋繁露》研究会的学习研究，尚有些“功利”性质的话（因为他们最终还是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结集而为专门著作出版）；那么《人民文学》研究会的学习研究，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单纯的学习欲望，而没有附带任何其他目的。他们的学习研究，似乎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即最明显的“兴”之所致。

《人民文学》研究会比较固定的参加者为五男八女，另外还有五六人为“游击队”，不定时参加。整个研究会的核心人物是被称为“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日本中国语教授——“大先生”。“大先生”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的小学、中学与大学，都是在中国上的。直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他才第一次踏上自己的父母之邦。所以，不管是作为中国人，还是作为日本人，他的中国语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而且对中国的方言还略有研究，特别是四川话。谁承想他的这一特长，日后竟派上了大用场，着实让他风光了一阵。原因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几位最高层次的领导人，都不大讲普通话而说四川话，因而在给他们配翻译时就得照顾“四川料理”。而普通话、日语说得好的翻译虽然不少，但除此又能粗通四川方言者，则凤毛麟角。于是“最艰难处显奇才”，“大先生”的这一特长被发挥到了至极。中国人喜欢这位能操四川土话的日本翻译，而日本人也习惯了这位翻译人选，于是“大先生”一时竟为口语翻译之风云人物。接而来的是，各处教中国语的日本学校则蜂拥而至，争相聘请“大先生”到校教学。他们倒不在乎“大先生”会不会中国四川方言，他们所最看中的，则是“大先生”在给哪个层次的人作翻译这件事本身。因为这样的巨型照片往橱窗里一挂，无疑是最绝妙的广告。因而，大凡东京的中国语学校，几乎没有没请过“大先生”教课的；于是，“大先生”所教过的学生人数之多、名气之大，简直如

雷贯耳。所谓“有井水处但歌柳屯田词”完全可以化为：但学中国语者，无不师（知）大先生。随着在日本年头的增加，“大先生”早已在大学里谋得了稳定的工作，不必再在各个语言学校之间奔走不息。但他还很想继续自己除工作以外的最大兴趣——读中文小说，于是他想到了组织一个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读书研究会，专读中国语小说。

“大先生”的这种想法得到了“五男”中的两位、“八女”中的三位的一致赞成，他们也在为自己的兴趣而焦急不安，于是便一拍即合。本来他们也想像其他的读书研究会一样，选择一本书或一个作家的作品来读；但又觉得要紧扣语言变化的特点，莫若选择一种时下比较流行的刊物。为选择那种既有档次，又有文学性，语言也得过得去的刊物，他们也着实颇费了一点心思。终于他们从多如牛毛的杂志当中，决定选择《人民文学》作为自己的教材。他们觉得《人民文学》还比较适合他们的阅读心理、感情与欣赏和审美能力，既不觉得很费劲，又可以接受得了。因为有些“先锋派”“意识流”的作品，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从他们的这种选择来看，似乎也可以理解他们这批人的立场、观点，以及价值取向。

除去“大先生”之外，其他几位《人民文学》研究会的固定成员的汉语水平也是极高的。他们有的不但可以极清楚地区别出连东北人都很难念好的“四”“四十”“十四”等字音，而且可以说出地道的“今儿是几儿”的北京标准语；他们有的不但可以轻松地背出朱自清的《匆匆》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现代诗歌，而且可以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他们有的不但参加了数本字典的编辑注解工作，而且还几乎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们翻译汉语作品之多（他们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相当多，但只有几本得以出版，其他的则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无法出版）……他们大都是与汉语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交情的人。他们非常自负自己的汉语水平，因而对选择作品也很挑剔。他们的学习交流不很像其他的学习小组，而有些像我们的专业课题组的探讨研究。对作品的分析批评，也基本上是掰开揉碎式的，说实话被他们所读作品的作家还真得留点神儿，千万别小看这些“鬼子”的汉语水平。因为他们

虽然是日本人，但实际上的汉语水平则绝不会在中国普通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之下。学到高兴时，他们眉飞色舞；学到别扭时，他们哀声叹气。常常是学完之后还不尽兴，还要到附近的“中华料理店”继续说到半夜。

这些人平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在约定的时间里凑在一起学习，相互交流。他们的职业既不相同，年龄也各异：或是教师，或是公务员；或是比较固定的文字工作者，或是临时性的短工；或是五十岁，或是近六十岁；总之形形色色，但工作大都与汉语学习有关系，却又并不直接发生联系。他们的汉语学习，好像只是出于自觉：不仅肯学，而且会学。他们对汉语的痴迷程度，令人难以想像。对他们来说，没有汉语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们的学习是具有相当的水平与很高境界的。

由《人民文学》研究会的读书学习，我想到了陶渊明的《移居》（其一）诗。他的“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深情吟咏，不仅概括出他日常生活的洒脱自由，而且还勾勒出他与“邻”、与友，博览群书、纵谈古今的读书境界。而这种境界又是多么让人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没有任何的功利驱使，又没有任何的精神束缚，只是就“文”之所“奇”与“义”之所“疑”，而进行自由阐发与交流探讨，真有点儿“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

我真诚地祝愿《人民文学》研究会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并且确实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美好的色彩！

“长安一片月” ——意象的色彩

日本人很喜欢中国的绝句诗，以及长篇诗词中他们认为最有光彩的那几句。特别是对长篇中那最有光彩的几句，他们更是情有独钟，觉得这“少少许”实在并不比那“多多许”差。这种审美追求，体现在他们所得意的短小诗篇——俳句中。

日本的俳句正像他们的茶道艺术一样，很看重兴会之迹的反映直觉，即刹那间的永久，也就是铃木大拙^③所谓的“穿越意识的外壳，达到了一种已经超越了科学家所说的无意识的‘无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注意俳句的“意象”，与“意象”的色彩。这种“意象”就像庞德所说的：“是一个叠加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④而所谓色彩，就是附着于这些概念之上的光亮。松尾芭蕉^⑤与加贺千代^⑥的很多俳句，就很可能体现这种风格。

寂寞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泼刺一声响。（松尾《古池》）
来到山路上，那挺拔的紫丁香，真令人难忘。（《山路》）
井边柳罐挂，牵牛花儿爬满了，提水到邻家。（加贺《牵牛花》）

《古池》所描绘的幽深古刹，郁郁葱葱的茂林修竹，以及寂寥空旷之池塘，都在青蛙的一声跳中被打破了，并且又以仍回到原来的宁静而告终。“芭蕉的古池，静静地横卧在那‘没有时间的时间’的永恒彼岸”。“因此，诗人所洞彻的‘无意识’，就不是什么古池的寂静，而只是青蛙跳入水中发出的声响。而且这声响正好被一双耳朵所感知。没有这一声响，芭蕉就不可能洞彻到既做为创作活动之源同时又是一切艺术家汲取灵感的那种无意识。”^⑦思想竟在悠远的境界当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并感染得使色彩也随之而生了。这种近乎于“古香古色”的意象色彩，颇为耐人寻味。

《山路》也是这样。它所强调的那“瞬间的感触”，即所

有难忘的一切，都似乎长久地存留于天地之间。而且在丁香的“紫色”渲染下，景与情、万物与其色彩都被编织到一起了。

如果说《古池》与《山路》的色彩显得深沉而凝重的话，那么《牵牛花》的颜色就稍显明快而新鲜。牵牛花不仅生机盎然，同时还带着春天的光与亮，春天的气息与活力，因而耀人眼帘，沁人心脾。

日本人在阅读与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常也把对诗歌意象色彩的追求融会其中。例如他们喜欢“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茗；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谢庄《月赋》）的“明明如月”，于是代表月光的“意象”色彩也总是晶莹皎洁。像“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地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李白《玉阶怨》）的素光洁白，“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李白《渡荆门送别》）的幻化流天，“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纵横飘逸与清辉玉朗……都让他们把玩再三，叹为观止。惟一例外的是，他们不大喜欢，也不甚理解“一片”的意象与色彩；所以，凡使用“一片”来修饰明月的句子，常使他们感到费解。典型的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等。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使用汉字“一片”时，只是表示少、少许的意思，故而其创造的意象与色彩，也不是明亮的万里无垠。在日本人看来，“明月一片”所展开的意象只是微弱、纤细的月光，充其量不过“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自然，这样理解就有悖于“明月如昼”与“晶莹的月亮挂在苍翠挺拔的松树之上”的原意了。

永远的“乐天” ——最喜欢的诗人

唐宣宗李忱很喜欢白居易，他的《吊白居易》也写得极有感情：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君一怆然。

宣宗确实是白居易的知音。不过宣宗恐怕也没能想得到，不仅当时的“胡儿能唱琵琶篇”、喜欢白居易，而且一千多年后的日本，也仍然喜欢白乐天。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白乐天才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记得曾搞过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知识问卷调查，对象是三所最著名大学的日本文学专业的本科三年级学生。在其中“你所喜欢的中国诗人”这一栏里，总共八十多人的参加者当中，竟有近六十人回答“白乐天”。剩余的二十几个人中，有答喜欢“李白”的，也有答喜欢“陶渊明”与“杜甫”的。由此我知道了年轻学生当中，喜欢白居易的人居多。

后来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日本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告诉我：不仅学生喜欢白居易，就是全日本人当中，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恐怕也得数白居易了。而且不仅现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日本平安时代（八一〇——一一二一）诗人，几乎都宗白居易，著名的菅原道真（八四五——九〇三）就“心摹手追，惟在白傅”地奋斗不止。十一世纪编辑而成的《和汉朗咏集》一书，共选汉诗一百九十五首，而其中一百三十五首是白居易的。白居易受欢迎的道理，也不很复杂。据先生说，首先是因为白居易的作品朗朗上口，且通俗易懂；虽至情至深，但语句简约明快。另外，白居易的作品也是比较早的就被介绍到日本来的^⑤。还在白居易活着的时候，他的诗就被日本留学生带回

了日本。嵯峨天皇（七八六——八四三）曾藏有白居易作品的抄本；村上天皇（九四六——九六六）的第六子具平亲王（九六四——一〇〇九）曾赋“诗古潘与谢，调新白将元”的诗句。于是，先入为主，最早的也就最容易成为最知名的。除开作品风格与流传最早的原因之外，白居易被喜欢的理由还有一个属非文学的因素，即他的名字好：居易和乐天。还是这位先生告诉我：日本是一个特别注意使用“敬体”语词的民族，因此说客气话，说吉利话，是最为常见的。而且，人们也特别喜欢好听、又有讲究的名字。所以，居住的“容易”与精神的“乐天”，是多么令人神往！况且人生不仅如“朝露”，而且还充满艰辛，因而“乐天”是何等难能可贵！为此，白居易——白乐天，也就特别为人们所钟爱。这里，有趣的是人们尊敬白居易，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诗好，还因为他的名字响亮，有象征意义。

“在人生的苦旅上，我们只能永不停息，永远怀抱‘乐天’精神”。布施先生的话，阐述人们喜欢白居易的道理可谓是一语中的。

据说李白被日本人所喜欢，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诗好，还在于李白诗中多有“酒”、且是“美酒”，同时这种“美酒”又很容易与情联系在一起缘故。“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的热情洋溢，“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春日醉起言志》）的彷徨无奈，“美酒卿共挥，长歌吟松风”（《游宴》）的潇洒不羁，“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行》）的明亮豪华，以及“百年三万六千日，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纵情恣肆，总之，他们似乎从酒中感受到了李白，也仿佛从酒中看到了这位天才诗人的精神世界。酒是中国诗人的朋友，酒也几乎是世界上所有诗人的朋友，因而酒所给予诗人的灵感、情怀、气度、雅量，以及万千的风采光华，难道不正好可以从酒中看到、酒中品尝到吗？这可谓是由酒而诗，再由诗而酒，并以此来体验诗人内心的“诗”与“酒”，以及诗酒之情。所以，日本人以酒而亲李白诗，也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

由诗人之名而喜欢诗人白乐天，又由诗人之酒而喜欢诗人李白，都从细微之处反映出“富士”国度里点滴的审美情趣与

审美心理。而且正是从这种点滴出发，似亦可洞见出几分神秘，以及神秘之后的些许情致。

论文初步

——索引的编排练习

记得好像是赵万里先生说过的：一个好的版本目录工作者，起码也得记住一万本书名、一万个人名，以及一万种重点版本。从这种要求本身，已可见传统学问的渊博。当然，这还仅仅是基本条件，与著书立说、表达一种见解，尚有不少距离；更与“成一家之言”的“立言”，不可以道里计。故而旧式学问研究家首先追求淹博，追求成为“博物君子”式的人物。西晋张华那种“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宝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晋书·张华传》）的学识风度，简直太令人神往了。昔日陈寅恪先生从葡萄酒引起的侃侃而谈，融历史与地理变迁于一炉的讲解，除了让人拍案叫绝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时代发展了，信息与知识也变得愈来愈繁复且不可限量，因此，围绕对旧学问的研究，或许是应该有所变化，以便跟上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种变化，无论是在研究的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条似乎是不应该改变的，那就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与基本功。因为，即使再进步发展，但对字、词、句的基本阅读与理解，也就是为研究所需要的基本功，似乎是不可改变的。

日本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几乎都是从“索引”开始的。不管是对先秦的诸子百家，还是对唐诗的初、盛、中、晚，及有关作家，他们大都先作出比较详细的字句索引资料及有关论著的索引资料，然后再进行研究，或是同时研究。于是，凡日本学者所研究过的作家、作品，以及流派等专项问题，大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索引资料系统。

索引资料的研究、编纂，对于完成研究论文有很密切的关系。其重要性中，最实际的一点，就是你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通读原文、理解原文。特别是对有些难读的音、难辨的字，以及讹、假、脱等字句，没有相当的了解，索引绝非那么

容易就能作出来。所以，虽然索引表面上只是一种“字句上的排列”，但实际上却也体现着研究者的用心与水平。

日本的许多学者是在跟随自己的导师学习研究之初，就开始作索引的。许多指导老师还有意识地启发学生作好索引资料，并把它当作培养基本功的重要步骤。高桥先生讲得干脆，“索引乃是论文与论著写作的重要初步，没有索引就没有深入的研究。而培养学生制作索引的能力，就是培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功。”

日本学者重视索引等资料的制作与研究，还表现在他们对索引本身的重视上。他们不仅不轻视索引，有时甚至把索引的价值等同于论文的价值。难怪日本学者们不烦做索引，并且又是那么看重在索引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功。

为了培养基本功，日本先生对学生除去许多基本知识要求背诵牢记（例如日本学生查找中文四角号码的速度快得惊人）之外，还布置他们背诵作品，以及相关作家的生平事迹等等。每当学生愁眉不展之时，十有八九是为背诵所苦。因为有些作品，他们要背诵汉文、日语翻译的音读和保持特点的训读。于是，有人就套用李白戏杜甫的诗相互讥笑说：“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天天背诗苦。”当然，如果背得好，老师就表扬和奖励，并和其他人一道向你表示敬意。

日本学者对“强记默识”之士，都表示特殊的尊敬。十多年前，中国一位大专家表演的“强记默识”之绝妙，至今仍使同行们五体投地，叹为观止。

据说十几位教授中国文学的日本先生，手持《宋词选》（胡云翼选注）、《唐宋词选释》（俞平伯选释）、《唐宋词选》（唐圭璋选注）等通行选本，随意向这位中国专家提问。他们只要提一下词牌或题目，这位先生就没有不能接续下来的。如此提问进行了三小时之久，大专家仍应答如流，滔滔不绝，竟连小小的卡壳都没有。于是，素来相当自负的日本先生们，都起立脱帽，拼命鼓掌表示尊敬。

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培养工作中，假如能更重视些基本素质与基本功的培养，能给“索引”以稍高一点的位置就好了。那样，我们经上代人所改变过的索引的境遇就

能坚持得稍长久些了。因为从陈垣慨叹的“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④，到众多研究大家重视索引、编纂索引，形成相当的规模，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心血！编纂索引本身固然不是最见功夫的研究，但它也极能说明问题。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你得读几遍原文，多从基本的字词义分析入手。也就是说，必须多重视一下基本功的作用。而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吗？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有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当然也就更不会成其为问题了。例如像《论语》中的“宰予昼寝”这句话，即使我们再富于艺术想像力，大概也不会认定“宰予”没有“白日做梦”，而是在“行房事”呢。

难以逾越的大家

——中江丑吉与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

王国维的这种见解，其实亦可以移为对学问（术）研究上的看法。有时前代的研究成果，很难为后世所企及；更有卓然独立的大家，亦很难为后人所逾越。

就像二十世纪中国的古代文学与哲学研究中的很多成果，以及研究大家，很难于为今日所逾越与企及一样，日本的一些研究成果与大家，亦很难为今日所企及与逾越。中江丑吉与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例。

中江丑吉（一八八九——一九四二）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杰出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家。迄今为止，他的研究论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一九五〇年由“岩波书店”初次出版发行）仍然作为一种标志，一种独特与杰出的标志而存在。

中江丑吉一九一四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法科大学¹¹，并作为袁世凯的法学顾问有贺长雄的助手于一九一五年一月来到北京¹²。据说当时的中江只签定了一年的合同，但事实上他在北京住了近三十年¹³，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因病归国。

中江在北京期间，除与日本的一些朋友例如铃江言一¹⁴等来往之外，与中国人过从最多的便是曹汝霖、章宗祥这两位留日学生出身的官僚。五四运动爆发时，当学生们火烧赵家楼曹家，并在曹宅痛打章宗祥时，被误伤的日本人就是中江丑吉¹⁵。

中江丑吉在北京期间，一直居住在曹汝霖提供的住宅里，生活费也由曹汝霖供给。其间日本的“满铁”¹⁶曾以高薪聘请中江丑吉为特约研究员，但中江也只是领薪水，仍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并且始终没有离开北京。在长达三十年的研究中，中江试图运用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古

代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尚书概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尚书廿九篇之我见》等一系列论著，都表现出他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深刻而卓越的认识。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的封建制》与《公羊传与公羊学》两文，前者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封建制度与欧美、日本的根本区别，从而澄清了东西方在理解、认识封建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后者则概括出东西汉公羊学之间在思想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些新颖的见解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以及极为深远的启示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江丑吉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都坚决表示反对，并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苦难，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虽然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中江不可能用更激烈的行为，来表现对残暴的军国主义的声讨。但他坚持比较完整的独立人格，始终采取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同流合污的态度与精神，还是弥足珍贵的。

关于中江丑吉的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的综述评价，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这里仅仅是“点到为止”。

首先，“典籍本位”的基本宗旨。中江丑吉从一开始，就把研究的方向对准了集中记录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尚书》，以及有关“公羊学”方面的典籍，并且立足于这些典籍本身来考察研究。他在《尚书概论》中说：“困惑诚然如此（指尚书遭火焚、兵乱之害后的残缺与混乱），但是欲探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尚书》又是独一无二的、最基本的材料。”于是，他从《尚书》的最基本材料入手，试图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研究之后，“从纷纭错综的有关资料中寻求出比较简单明确的概念与事实”。他的《尚书》研究是这样，其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它们都鲜明地贯穿着立足于典籍本位的特点。正是根据在基本材料上的深入挖掘，细心考辨，他才能从其中找出带规律性、或者反映某些本质特点的东西。中江在根据《尚书》等基本材料，研究中国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封建制与欧美、日本式的封建制是很不相同的。这种独立见解表现出中江的研究精神，不仅为认识中国封建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也为澄清中外在封建制

度认识上的混乱，起到了积极作用。中江还特别强调，研究一定要以典籍自身的实际情况为准，反对个人偏见与主观臆测，以及简单的类比和套用根本不同的概念。例如在对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认识上，中江从“妇”字的基本意义出发，以为在“非权利阶级”内部，妇女的地位并不像想像的那样低下；因为女性的劳动、女性的专门性质的劳动，不仅没有贬低妇女的地位，相反恰恰表明她们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中江也表现出他独立的见解。他的“典籍本位”的基本原则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取外来之观念”，即用新的理论方法来指导研究。中江丑吉在最初发表的几篇论文，几乎全都是他对方法论的研究探讨。另外，中江还广泛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导自己的古代思想史研究。在思想指导方面，他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最多。中江丑吉本来就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比较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像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的国家学说等，对他影响又比较大。及至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铃江言一接触之后，他又读了不少共产主义的经典。他是日本人中通读马克思《资本论》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他还阅读了列宁等人的著作。与此同时，中江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罗马史》、《希腊史》等著作都特别重视，反复阅读理解。于是，就像王国维的现代学术研究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作《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等论著开始一样，中江丑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他一些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古代史学、社会学等，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著作，都给予中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以积极的影响。中江的私人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书就是反映最新理论与方法的典范之作。中江以自己并不纯熟的中国语，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其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指导思想、指导理论的高妙。中江是日本人当中，尝试着用西方现代精神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古代学问的先行者之一。

再次，细心梳理、辩驳考证。中江丑吉作为一个日本人，

特别是作为一个没有进行过专门系统汉语学习的日本人，就语言上讲，他的研究考察之起点不可谓有多高。他的成功，除去指导思想的原因之外，就在于他“用心”的缜密，考证的谨严、细致，特别具有逻辑性。例如他在面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课题时，则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首先细心梳理：政治是什么？它到底存在不存在？以怎样的形态出现？政治思想又是什么？是指政治学说？还是指国家政治学说？什么是思想的构成？思想一经成立时是怎样的情形？有必要的媒介吗？古代的概念是指什么？是指按历史时间的演进排列以前的那段时间？还是指先史时代以后的、比较而言的那段时间？这种追源寻流的精神，使我们想到“古史辨”派顾颉刚的对“孟姜女”流传故事的考察：

*就历史的文化中心上看这件故事的流迁的地域；
就历代的时势和风格上看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
就民众的感情与想像上看这件故事的酝酿力；
就传说的纷异上看这件故事的散落的情状；
就传说的自身解释上看这件故事的变迁的样子；
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看民众与士流的思想的分别。*

中江丑吉努力细心地梳理材料，并且认真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找证明。所以，他下了相当的一番功夫学习文字考据，并且把它同其他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这样虽然他的汉语水平比不过其他一些专家，但往往能发现问题，经过认真地取舍综合，从而表现出新颖的见解。

正是这些新颖的见解与中江丑吉所追求新方法的努力，使他的成就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依然葆有生命的活力。这应当说就是古人所云的“虽久不废”之“立言”的不朽吧。那么，诚哉斯言！

“命名”的思索

普通的起名、或者说命名，充其量不过是起插标签的作用，只要能分清甲乙丙丁、没弄混子丑寅卯就不能算错。但人们似乎都不满足于此，而追求那种恰如其分的命名：突出内容，夸张形式，云从龙起，使之相得益彰。于是，“同仁堂”的仁义博爱，“全聚德”的大开大阖，“五粮液”的醇美深厚，“都一处”与“六必居”的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与各种以“劝业”为名的苦口婆心等等之类，都显得特别耐人寻味。

不管是从“文”字意义，还是从“名”字意义出发；也不管是从思想意义，还是从应用价值意义出发；更不管是从历史价值意义，还是从社会价值意义出发，总之名字本身所寄寓着的理想和希望，则是极为明显的。所以，命名不仅要恰当，而且还要体现命名者有文化素养。

日本是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既深且久的国家，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制定天皇的年号，一定要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找吉利、且有讲究的字词；而传统风俗习惯的说明、阐述，也要以中文记载的材料为准。不仅如此，有时就连“起名”，也强烈地表现着他们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并由此表明那些命名者的教养与文化水平的高低。

像“后乐园”这一大游乐场，却化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后乐”来命名，似乎提醒人们：即便是在游玩之时，亦应想到天下，由此突出“乐而不淫”的境界。又像以“今半”命名，用先贤的“行百里者而半九十”名言，激励自己永远努力。其余像“三省堂”的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之语，而表其重“慎独”精神；像“上智”的以“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既表示人应走“上”而不能就“下”的一种观念，亦显其贵族色彩。总之，都表现出非常真切殷勤的用心，以及相当的传统的气息。虽有的稍显“过”，但总体上说还是过得去的。另外，又如以汉字之“勉强”命“学习”艰苦之意，以汉字之“一生懸命”而赋“努力”、“拼命”之

惨烈，都可谓相宜之至。

比较而言，时下我们的有些命名则令人不敢恭维。如以道家之“庄子”而命皮衣，云“庄子皮衣”；以《红楼梦》之“曹雪芹”而命集团，曰“曹雪芹集团”。侵犯不侵犯人名权暂且不说，那种等而下之的意思则极为明显。如此之势，方兴未艾。长此以往，难保哪一天会有一大堆“老子腰带”、“墨子皮鞋”、“孙膑拐杖”等，以及不知什么样名字的东西出现！

所以，别太小看起名，别不经深思熟虑而就轻易命名。我们不妨多读些书，顺便看看东方的这位近邻是怎么做的，或许就能减少点儿别扭、尴尬、羞涩，以及莫名其妙。如果我们给自己命一个不正的“名”、一个无理、没文化的“名”，那显得与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文化传统是多么不相称！由此看来，命名之事实实在值得我们动动脑筋！

“到位”的思索

近年来我们颇为流行的“到位”一词，其实很能恰如其分地说明日本许多行当的工作状态。那一脸的虔诚与认真严肃，像是对别人可更像是对自己的喋喋不休，一溜烟儿的小跑，忙不迭的点头哈腰，这或许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些日本“工作人员”紧张工作时的肖相描写。不用说，你看不到凑在一起说话聊天的、喝茶看报的、无精打采的，更不用说那些打打闹闹、熙熙攘攘的。人们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劲都使出来，惟恐自己干得比别人慢，比别人差。这种对工作近乎于神圣的态度，既是所谓的敬业精神，可又似乎不是那种单纯的敬业精神所能说得清楚的；因为就中还蕴含着不少民族性格上的东西。这样在效率还不很有惊人速度的时代，日本人以他们独特的工作作风——紧张严肃，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时至今日，有见识的日本人仍然把强调紧张严肃的工作作风，看得格外重要。

谈到民族性格对日本人工作作风的影响，看法或许会有各种不同；但有一点则又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平等意识植入的肯定。也就是说，释放出的能量——紧张严肃的工作作风，是在让你比较充分地感觉到你自己是在“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用钟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把你先放到极低的位置上，然后再给你升高一截，那时你的感觉就不是原来的低下，而是比原来不知要高多少的“高”了；尽管直到最后，你可能也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位置。为了讲明就中的道理，钟夏先生还举例说：“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存在位置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直到允许普通百姓可以有自己的姓了，大家才开始姓，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姓五花八门的原因。地位也是这样，普通的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过人的资格。因而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能够给人以平等的权利，老百姓就感恩戴德的不行，以为自己已经‘到位’了；尽管距离人的真正资格还差得很远。”

我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以及关于这种性格的形成、发展与

影响等方面的问题，都素无研究与分析。所以，也不知钟夏先生所言到底有多少道理。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日本人对自己的地位存在着相当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又是与他们目前客观实在的生活分不开的。因为在典型的“日本料理”店里，当你看到日本人捧着大碗（绝对超过陕北吃饭时所用的）而津津乐道时，你似乎就能联想到贫穷与现代化之间的纽带，以及那种“到位”的喜悦感觉。由此看来，孟子所言不诬，只有客观实际的生活“到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到位”感觉，因而孟子才那样强调他的主张：“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印度情结”

日本人对印度颇有好感。这倒不是因为印度本为佛家思想的故乡、佛的功德泽被世界，也不是因为印度料理的“卡拉慕斯”（咖喱饭）如今已成为日本料理中的主流食品，而主要是因为印度对日本侵略亚洲的行径熟视无睹，并且他们还真为日本人说好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在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起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止的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国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庄严的审判，即所谓著名的“东京审判”。就是在这次审判中，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被处以极刑。罪恶终于得到了审判，正义也终于获到了伸张，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慷慨激昂。为了能够争取到这一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付出了多少生命、青春与热血的代价！然而也正是在这次审判中，大法官中的印度人——帕尔，竟不顾历史事实和道义真理，宣称日本侵略无罪。这也就难怪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当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印度时再三表示：“作为日本首相，对印度政府及国民从内心感谢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的其中之一就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印度法官是在十一国法官中惟一宣布日本无罪的这一事实。”不仅如此，待岸信介之后，佐藤荣作（佐藤内阁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成立）又代表日本政府授予帕尔二等国家勋章。他们都对印度偏袒日本侵略、辩解战犯无罪的作法，感激涕零、礼敬有加。

由此看来，“亲不亲，利益分”还是很有道理的。日本人的“印度情结”不就是明证吗！？因此，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人们是可以高唱《欢乐颂》、走到一起变成兄弟的；可假如有着根本的利益冲突，那么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恐怕都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在这个意义说，“地球人”的出现，还与现实有相当的距离。

“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忧患色彩的民族。

狭小的岛国地理环境、贫瘠的土地与匮乏的资源、恶劣的气候等等，都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与不幸。历史上诸多诗人伤感的情怀，不仅仅是诗人敏感心灵的记录，也包含着对于自然的恐惧与忧患意识。因而众多的由汉民族传来的风俗习尚，特别是像求雨、祈旱、祭天、求丰收等传统仪式至今演练不衰，绝不仅仅是他们这个民族珍惜自己传统的注脚，也是他们始终要接受自然痛苦洗礼的无可奈何的情感发泄。

像日本的四季祭祀与对地震、风的祈祷中就很体现出他们的内心追求、希望与理想。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人们播种插秧，祈盼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时的所有祭祀，都反映着人们的这种愿望。最著名的“稻荷神”就极有代表性。二月的第一个“初午”日，人们放下活计聚集在一起，向稻荷（五谷神）祠敬献炸豆腐等祭物，祈求丰收。“初午”传说是田神由山上下到乡间的日子，因此只有在这时祈求之后才可以春耕。许多农村还把马匹打扮得漂漂亮亮，并且举行祭祀蚕神的仪式，为一年的全面丰收而祈祷。

夏天的祭祀，依然体现的是祈求五谷丰登的意愿；只不过又增加了对风的要求。风，特别是台风对日本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于是，在许多的祭祀当中，把对丰收的祈盼具体化为对风的防备。日本的东北、关东地区，在夏季的农村都可看到高大的屋脊，或是竹竿上绑着的镰刀的做法，这是古代镇风祭祀的沿袭。古代的人们认为，锋利的镰刀是可以杀风的。风平浪静，农业就会丰收，远海的渔船也会平安。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大家终于迎来了收获。这时人们会因天神的保佑而谢恩，感谢上天的慷慨、恩惠，使人们得以幸福。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天神所庇护的人民，

天神春天从山里到田间，变成田神，待保佑人们丰收之后，田神还要再变回山神回到山里。所以，人们在丰收之后是不应当忘记它的。

冬天的祭祀多为镇魂之用，同样是感谢上苍保佑一年的平安无事，并希望来年有更好的季节。另外，日本人把新年后的首次生产劳动活动，看得非常重要，农村所谓的“锹始”就是如此。他们在年神所在方位面前的田头，先挖三锹土，然后再竖起一根松枝，松枝下面摆设好供品，祈求一年中的早中晚三季稻米的丰收。

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地震、雷、火灾、父亲”是被认为最值得恐惧的前后顺序。当然，这里父亲的威严被过度地夸张了；但从中依旧可以看到“天灾”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尤其是地震，它的破坏力最大、威慑力最重，被排在第一位。所以，日本人总把地震当作最大的灾难加以预防。“鲶画”，就反映着人们试图战胜地震灾难的心理和意愿。画面上的“鲶”被鹿岛大神用“拱心石”、或是惠比须神用“葫芦”紧紧压住，于是天下便安宁平稳。因为对地震的爆发原因，古代日本人以为是与潜藏在地下的巨大的“鲶”的活动很有关系的；因此只有把“鲶”镇住，大地才会平静。从把“鲶”压住的愿望，到今天预防地震灾害的各种演习，都表现着日本人对地震的顽强斗争意志。

日本民族要接受自然的挑战，要与一系列天灾、痛苦，做不懈地斗争。那惊天动地的强大台风，那似乎要毁灭一切的地震，使每一个人无不陷于恐慌之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始终是处于对自然的恐惧与痛苦之中！这或许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个重要动力吧！

中岛先生作如是说。

孙子兵法中的“兵置死地而后生”的思想是最容易被日本人所接受的思想之一。因为日本的自然状态，好像随时都处于被粉碎的地位一样，于是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日本很多人学习孙子兵法，不仅只是想运用计谋、克敌制胜；同时也是告诫人们注意：自己始终是

处于不稳定之中，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不断努力。我们要在所有的境遇里都不忘记忧患意识。

田中先生亦作如是说。

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自己恐惧的描写是极多的。这倒不是因为日本人喜欢伤感，而是地理、自然环境迫使你不得不伤感。渔船出海了，可是却被无情的风浪吞没了，这对昔日的岛国渔民来说是再经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把心像弓弦一样绷起来，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的地理环境是另一番模样，幅员辽阔、资源无限，我们也许会是别般风景，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我们“围海造田”，还不是因为我们的田少吗？假如我们的田很多很多，足够我们来开垦、使用，我们何苦以“精卫之举”来哗众取宠呢。

松下先生亦复作如是说。

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始终与日本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今天，随着日本对自然征服能力的增强，随着日本综合国力的强大，昔日的楷模——欧美，似乎也已不堪称其榜样、他们这只船仿佛处于“不知将驶向何处”之际，他们依然有不少人大声疾呼；可以不问方向，但是别忘记忧患意识！

如此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于曾有过大汉大唐历史辉煌的中华民族来说，未尝不是不可以借鉴学习的？！我们的自然地理环境就那么好吗？我们今日的忧患意识究竟有多少？我们是否能说我们也始终把自己处于“兵置死地而后生”的境地里了吗？难道我们的卧榻之侧，就有着一个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且又很有些力量的“弹丸之地”，尚不足以使我们清醒？不足以使我们绷紧那根生命之弦吗？

或许是这样，希望在人间，希望在于我们民族魂魄的重新铸造。但是在铸造的同时，千万别忘记我们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千万别忘记我们应当始终牢记在心头的忧患意识！

“理想社会”

和普通的日本人交谈渐深，他们几乎没有人说其现存制度是好的。无论是对政治、对政府、对税收、对银行贷款等等，都大为不满。然而当说到具体的身边琐事时，又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无不为他们的这个社会高唱赞歌。事实上也是如此，正是这个被普通日本人所不满的社会制度，以及许多的历史机遇，当然还要加上他们自己的勤奋努力，竟然使这个贫瘠的“弹丸之地”摆脱了贫穷，堂而皇之地出现于当今世界。厌之乎，恨之乎，嫉之乎，笑之乎，一切都可以；但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空难”的时候，就赶紧查询有无日本人的现象，却是一个不容易改变的现实。

一位相知甚深的朋友这样说：“世界上所有的人，几乎没有不讨厌日本人的做作，自以为是的丑恶，穷人乍富的暴发户式的举止言谈，当然更不用说那死不认账的冥顽不化的劣根、得志便猖狂的忘恩负义。他们将日本人的这些行径，一言以蔽之地斥之为‘没有教养’，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倘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痛苦贫穷的民族，我们过去从没有能够使大多数人吃饱过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是不是会有些谅解呢！对于一个刚刚能够吃上饱饭的民族来说，我们的言谈举止有些粗俗可憎，谈不上够教养的程度，是否可以被理解一些呢？当然，这种理解必须是要排除掉我们对侵略战争认识的部分在内的；因为，我以为虽然这种错误与民族缺点有关系，但还不能一概而论地推为民族的缺点。与你们具有五千年伟大的古老文明相比，与西欧、美国具有至少二百年以上的近代文明相比，或许我们的教养是不够的。但请给我们些时间，让我们慢慢地改变形象。当然，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牢记自己历史上的辉煌，处处表现出深厚的教养，让东方民族真正站立起来，并且寻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针对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这位朋友又这样说：“在日本

的选举中，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目前执政的团体有多好，但还是投了他们的票。因为至少是现在，日本还没有另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今日的执政者，更不用说改变选民的信仰。选民们也许是希望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友善的关系是极有魅力的；但是他们还要求这种亲切友善的社会，绝不仅仅是摆脱贫困，而且还要向更新更高的目标前进。这应当说是不过分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就是理想社会。”

朋友的话引起了深深的思索。社会主义的成功（当然必须是真正社会主义）应当是超富足的，应当是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得到满足的。说起来也许过于苛刻，但必须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倘若舍此任何一方，那便不能真正使人信服。四十年的实践，终于使我们认识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已经富足了的人相信，既富足又精神愉悦的社会才是理想社会呢？只有一条：那就是拿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优越的硕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应当是有广阔的前景的；因为它的基本精神是与人类前进的目标相一致的。因此，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抹煞掉，也不必去改变说法。但是，或许最重要的还不在于我们怎么说，而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举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累累硕果！如若真有了这辉煌的果实，那么地球上不管是富足与贫穷的人都会相信，也都会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

时代曾给了资本主义一个历史机会，让它充分发展起来；当然，人们今天发现它远非尽善尽美。倘若社会主义也能创造出一个机会，并且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把理想改变成为现实，开辟出一条幸福之路，那么人们的归宿则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记得列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必须杜绝一切说谎和吹牛，社会主义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绩。

日本企业的“战时体制”

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有众多的历史原因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客观机遇；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他们企业队伍的勤奋努力。

日本社会曾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上一流大学，进一流企业。许多学生考试的最终目的和理想，就是能够进入到梦寐以求的一流企业当中去。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景气，这种把一流企业当作自己终极目标的观念稍有变化。有些人不满意大企业的条件、待遇，冲杀出去，自谋生路而获成功；也有些人，转向中小企业、由于谋略有术，同样另辟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日本大企业，尤其是一流企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日本大企业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中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支撑日本经济的主要力量。日本人喜欢这样说：你们中国是社会主义，我们日本是会社主义（“会社”者乃“公司”之日本汉字也）。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社会为“会社主义”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他们还在概念中，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基本观念，以及其他等等，都演绎为“公司主义”的结构形式。当然，对于日本“公司主义”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命题；然而对于呈现于外表的“公司主义”之特点的认识，则是直观、且显而易见的。例如，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公司的命令不容置疑，为了公司的生存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等等。在这其中，除去所谓的“敬业精神”之外，尚有更深切的原因蕴含于内。这种深切的原因之核心，就是被简而言之的，所谓企业“战时体制”。换句话说，日本企业的内部依然沿袭着“战时体制”的运作、管理方法与上下级关系。再明白地说，日本今日之企业管理，乃是运用他们昔日之军队的管理方法。这样的话听起来颇使人毛孔悚然，但实际上却不无道理。

所谓“战时体制”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整个国家处于对外侵略战争状态下的一种国家机制。这种机制出笼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强化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

典型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机制。第一次近卫内阁（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成立，不久就爆发“芦沟桥事变”；七月十一日又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在向中国派遣军队的同时，提出开展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强调“举国一致，征服世界”，从而使日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转入到全面战争的轨道上。国内的极端法西斯分子的提出“速战速决”、妄图在“三个月”之内鲸吞中国的战略方针。因此，这种机制按战争的要求运作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同时还从战争的需要角度强化国家机器、强化对国民的统治。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战争，一切在所不惜。这种体制是由以军队为代表的法西斯分子所提出的，并粗暴地要求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所有的精神与伦理方面都应当表现出来。

这种体制要求在思想精神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支持侵略战争，还把有反战思想的进步人士投进监狱，实行高压政策。与此同时，这种体制在物质基础方面，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按经济军事化的原则直接管理和控制经济部门。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在战时，国家随时可以对劳务、物资、贸易、资本、设备、物价实行统制。不久又进行物资总动员计划，目的是以军工生产为中心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制，为扩大军工生产能力而由国家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强行管理、使用、征收，用以生产、维修、储存和运输各种武器装备和军需品。将工人的雇佣、工资、劳动时间等等严格置于国家统制之下。以后又实行统制资金、利润的条款，总之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状态下控制和管理。

“战时体制”的核心是强调军队为天皇的军队，服从长官的命令就是听从天皇的命令；而国民为天皇的国民，遵守政府的法令就是听从天皇的命令。因此，所有国民，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为了与天地共存之天皇伟业，在战时奋勇作战，为天皇尽忠”，都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战时体制”的实施，使“弹丸之地”的日本，实现了“蛇吞象”的目的，侵占了几乎整个的中国，以至几乎整个亚洲。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法西斯分子的“战时军事体制”这一“国策”也宣告结束。

随着麦克阿瑟所代表的“盟军”对日本各种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由于解散军队、解散财阀，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金融资本等都进入到重建阶段。

在日本重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非常熟悉自己企业在战争状态下的角色与工作态度、方法，因此就全面继承了下来。战败后的惨景与凋敝的经济，似乎也把“忧患意识”更具体、形象化了。于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初就是自觉的进入到企业管理当中的“战时体制”，更以企业生存、发展为特征的“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存在，并且发展起来了。

这种渗透着“战时体制”特点的“企业文化”，首先强调企业应当形成共有的价值观与目的性。企业存在的价值、企业发展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的每一个人的认识与想法。就像战争状态下的人一样，经过从上到下的“命令”之后，几乎都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位置、以及应当怎样干；今天企业当中的一员，也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当成自己的目标和想法。为了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观与企业的一致，也为了能够突出自己集团的一致性，大多数日本企业都统一着装。工厂的工人与管理人員统一着工作装，公司的白领女性也一律着工作套服，而公司的男职员则强调根据季节穿整齐的西服。所谓着统一服装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人从外表的服饰上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外表的统一，应当表现着内心的统一，表现着统一的价值观与目的性。

其次，这种“企业文化”强调的是成员对集团的忠诚。这种忠诚从企业方面来说是所谓“年功序列”，一包到底；作为成员来讲，则是坚持下去，即便有更高待遇的公司招聘，自己也不跳槽。同时，这种忠诚还要具体化为对企业与企业领导者的忠诚，因为企业本身就是天皇！企业的领导者也是天皇！他们都是自己应当崇拜的目标！

再次，这种“企业文化”重视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在这里，企业继承过去军队中谍报机关的传统，最大限度地收

集情报，并分析发掘情报中有价值的成分。日本的几乎所有企业，都把情报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在情报上所投资金的数量之大，以及情报所涉范围之广、研究之精，都是非常惊人的。

第四，这种“企业文化”强调评价报告制度。日本在“战时体制”中，就非常重视评价、总结这样一系列“战后”分析制度；现在的企业也是这样。他们把对企业自身的评价、对企业对手的评价，对市场的评价，都看得很重要。而且他们的评价并不仅限于成绩与成功，他们对失败、教训的评价，则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第五，这种“企业文化”突出强调那种“义无反顾”的责任感。“战时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天皇而战的责任意识，以及经反复宣传所形成的一种自己与民族、国家的休戚与共的责任关系。现在的企业也强调这种责任意识，并且把意识，即公司等于自己身家性命的观念，渗透到所有职员的心灵当中。于是，这种成功养成的职员自觉的意识观念，就成为日本公司发展创造的法宝之一。

当然，我们所说的“战时体制”之实行，并不是一种把原来战争时期的“战时体制”的全部照搬，也不是当初所有的限制、规定一成不变地实行；而是有所扬弃的取舍、改造。但是，其基本的精神的包含，以及根据这一基本精神而改造出的“企业文化”，无疑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此，应当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日本的政治与政坛可以风云变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日本的经济则比较稳定。日本政治的变化，一般也不对日本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因为日本的经济界、企业界自成规模体系，他们有自己的“财界总理”，以及各种各样表面与政治“无关”、却有紧密内在联系的组织与机构。所以能在日本政治显得混乱的局面下，仍然比较稳定。

有些日本人抱怨他们的国家是“一流的经济，三流的政治”，对于政治家极为不满，甚至不乏指斥者。但是在经济界、企业界内，任何组织的领袖人物，都具有绝对的权威；当然公司内部那就更不用说了。公司经理的地位是不允许怀疑的，他们的意图必须贯彻执行，这中间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

果说昔日人们最崇拜的是陆军大将的话，那么今天人们最崇拜的乃是公司经理”，这种说法虽然比较陈旧，但却概括得极为准确。有些政治家不很光彩的“表演”，被人们嗤之以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人们总忘记不了加上这样一句话：这种人如果是在公司的话，早就该被经理开除了，用以衬托经理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关于日本企业内部的“战时体制”的分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铁一般的纪律，本质上残酷无情的管理，以及“地狱”样的压抑空气，家族“奴隶制”似的维系纽带，这几种因素又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力量所催发出的经济之花与物质之果，今天已被全世界所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产品、物质存在，这种现象似无可厚非；但是，倘若这种“战时体制”的力量，一旦用于非经济领域的时候，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日本企业内部的“战时体制”问题，似乎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如果联系历史与现实的某些实际，特别是着眼于日本综合国力的提高，这样一个新的变化来考虑，也能看到这个问题具有极强的“非经济性的实在内容”。

日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却没有吃什么苦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首先，日本没有对中国、即对遭受他们侵略最为酷烈、掠夺最为疯狂的中国人民进行应有的赔偿。这种没有赔偿，本身就是极不公正的；不管是由于怎样的一种原因。因为侵略者没有赔偿，就在相当的程度上意味着对侵略的容忍与姑息。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止，这灾难的十五年，给予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应当说，即使是赔偿了，就算是连本带息都加在一起进行了财产的赔偿，也未见得能为中国人民所宽恕，因为无数的冤魂是无法复生的。更何况是既不赔偿，又不从内心反省侵略罪恶呢！不赔偿，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教训日本侵略者，以及步“其”后尘者，也没有说服力去教育广大的日本国民。不管是“三流”人物，还是那些“不入流”人物，他们之所以胆敢出来饶舌，还不就是因为他们躲过了赔偿，庆幸自己占了便宜吗？倘若他们真正吃到了苦头，他们还敢出来说三道四！没有吃苦，当然就不会被深刻

教训。今日众多放肆无理之举，其源无不导于未吃苦头。

其次，作为侵略国的日本，他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始终也没有达到中国人民所能接受的程度。这种现象又被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内容，即朝鲜战争，冷战格局时代的一切所淡化、掩盖，及至今日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后，人们才又从蓦然回首中，看到了当时历史的巨大欠缺。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再次，日本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又使前边所叙述的欠缺，同今日狂热者的盲目结合起来了，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因而又使日本人当中的不正确的认识固定了，是非也颠倒了，更不用说原先颠倒的东西也就根本无法复原了。明明是侵略，战败时也承认是侵略，可今天却又侈谈起“大东亚共荣”及其他；当时的杀人魔王、刽子手，不仅已堂而皇之地被请到神社里，受人顶礼膜拜，甚至还想重新改写历史。如此伤害中国和亚洲人民情感的做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虽然国力可以提高，但是是非却不能颠倒。“玩火者必自焚”的规律，既适合他们的先人，也同样适合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后人。

现在有一些所谓对“日本政治感到绝望”的人，他们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对“一流经济，三流政治”的认识上，甚至每念及此，“哀怨不绝”。倘若为了修明自己的政治，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如果这种不满主要是针对：所谓目前日本的“与经济不相称的国际地位、国家政治”。如此这般，难道不就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吗？当然，目前他们的“一流经济”，还能受控于“三流政治”，暂时可以安宁；但是，假如有一天，他们的“一流经济”已觉毛羽丰满，必欲取“三流政治”而代之，那么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与经济？这种经济与政治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难道还仅仅是汽车和电器吗？

由日本企业的“战时体制”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番“胡说”。但愿这种“胡说”，只是个人昏热的呓语，但愿再也没有那灾难历史的重演，甚至连同对昔日灾难的记忆也随风飘逝。然而清醒地认识日本社会中的诸多不正常，以及绝非偶然的现象，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且促使日本一些人对历史、现实，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既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的事情；同时，在相当程度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情。

日本教育的“核心思想”

日本教育的指导思想，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是百年前福泽渝吉所鼓吹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说教的继续与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其体制，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的核心思想不是“孔孟之道”与所谓“新儒学”，而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与精神。日本式教育的成功，不是对“孔孟之道”与所谓“新儒学”的肯定，而是否定；“东渐于海”的哀叹，至今依然、或者永远只能是哀叹。日本教育不论是就其整体，还是就其部分而言，都只能是资本主义式的。

说日本教育是资本主义式的，当然就包含着教育及其本身，以及学术领域内具有相对的自由思想，即在日本的大学中，在讲台上可以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研究斯大林；可以讲孔孟之道，也可以研究毛泽东，甚至于有的教授最喜欢的作品是《矛盾论》《论持久战》；当然最多的、最深入实际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单凭日本学校所开的几门课、所列的几本参考书，就认定日本的教育是什么，日本教育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这绝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据说日本的教育当中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即人的危机。因为目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都是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所谓忧患意识，对于传统等等，一般不怎么关心；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享受、如何酒地花天（当然这只是不充分、不完全的看法）。而目前进行教育的教师，大半也都是战后出生的，他们的人生洗礼是仿照美国教育式的洗礼。忧患意识、传统，对他们而言同样是陌生的东西。对此，日本是有些人大声疾呼：改掉这种教育缺陷。特别是要加进日本固有的许多东西于教育内容之中，当然这包括着日本式的孔孟之道及其“儒学”。但是，这种疾呼还仅仅止于形式与有些舆论；收效亦不明显。

这种收效极微的努力，并不是根本没有接触到隐患的所在。

接触到了隐患，并且都承认这种隐患有着扩大的趋势；但这还都只限于某种认识。这种认识有不可能变为“实践”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隐患虽然存在，但不可能发展起来、爆发出来，更不会妨碍社会。所以，人们才对此听之任之，掉以轻心。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有如此神奇的魔力？

这种缓解“隐患”危机的魔力，用日本教师简洁明白的话来说就是：学生变成了公司职员，即他们经历了由“天堂——学校而至公司——地狱”的巨大转变。

日本企业的管理体制，一直沿袭着日本战争时期的“战时体制”。也就是说，公司的一切管理、运作，以及上下级关系，都沿用着战争时期的那一套，或者说“帝国军队”的那一套。于是，先前所受教育之松散，思想之自由浪漫，开始被整肃、压抑的气氛，以及无情而有形的“奴隶制”式的公司统治所替代。留给公司职员头脑中的仅仅是这样的信条：拼命干吧，把一切都卖给公司！

每逢新的财政年度的开始——四月一日，各个公司都要为新参加工作的学生举行隆重的就业典礼。所有的“新人”都要聚集在广场或礼堂，排成整齐的队列，精神抖擞地受“入社式”的洗礼。仪式显得庄重整肃；虽然也有彩旗的飘扬，但是巨大的公司社训，或写着经营理念的条幅悬挂在会场的正中，则增添了神圣之感。如“和诚积极进取”（日立制作所），“产业报国，和亲一致，斗争向上，礼节谦让，发扬精神”（松下电器产业）等等。那情绪激昂、震耳欲聋的“社歌”之声，那力竭声嘶的经理训话，那宣誓献身式的新人代表发言，更使整个仪式充满了与狂热的“入学式”绝不相同的庄严神圣的气氛，似乎昭示着：新的人生开始了！

新参加工作的公司职员，一般要经过相当一段的学习（研修）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式开始工作。学习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公司的历史发展、营业规模、贩卖业绩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目的不外乎激发“社员”的雄心壮志与自豪感。当然学习还包括对公司纪律、规则要求方面的了解与认识，因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既然你参与到同一个集团当中，那么你的思想方法，特别是思考问题的标准尺度，就都应当自觉不

自觉的认同到新的集团的理解与认识当中去。这是你成为“集团成员”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将来你能够发展、创造的牢固基础。这样待你的心被充满惊心动魄的“业绩”狂热起来，且又诚心诚意地愿意为公司服务的时候，“初审”也就告一段落了。

开始工作后，每一个新职员都要认真负责地填写统一规格的“工作日志”，把工作中的想法、遇到的问题，对工作场所的气氛、条件、以及周围合作者的印象、感受等详细地记录下来，定期上交自己的部门领导与人事干部审阅。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于记录仔细认真的新职员都加以肯定；尤其是对那些在“日志”中能够提出问题、愿意动脑筋的“出谋献策”者，则更给予相当的勉励。在记录“工作日志”的同时，公司还要求每一个新职员不定期地写“自我评价书”。“自我评价书”的内容包括任现职以来的工作情况，成绩与问题，下一步挑战的目标，以及对自己晋升级别的设想等等。对于这种不定期的“自我评价”，新职员也必须特别认真对待，因为这是公司的基本要求。人事部门先要认真阅读，然后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并针对其秉性品格、习惯特点等具体事项，再写出详尽的报告。公司除去要求“新人”常常做“自我评价”之外，还要求部门领导定期对新职员做“指导谈话”，并把这种谈话记录在案。有时在与新职员谈话之后，指导者还要详细写出对新职员的“领导评价”。“领导评价”不仅包括与新人的面谈内容情况，还要把对新职员工作成绩的考察、品格的鉴定，以及将来工作的安排设想等等写进去。人事部门根据新职员的“自我评价”与部门领导的“领导评价”，再来进行综合分析，并为之填写“成绩能力卡”。“成绩能力卡”就显得更完整了，因为它不仅有新人的工作态度、工作精神、工作成绩，而且还有新人的人际合作情况与进一步的“潜在的能力”开发预测，以及任用意见、晋升和薪金级别等等。另外，公司系统的领导，无论是部门领导，还是人事领导，都有权随时找新职员谈话。谈话可以采取比较正式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谈话内容也没有统一的要求，可以是公司情况、社会新闻，具有相当的针对性，也可以是历史问题、世界博览，漫无边际。虽然是说者无心，但照例是听者有意，总之，所有的方式，目标只有一

个，就是评价考察。所以，大凡日本公司的部门主管与人事领导，对部下的了解都是比较全面的。

于是，新职员们的一切（在公司的时候与不在公司的时候），也仿佛总处于监督之下——部门领导与人事领导的目力确实无处不在。因而，新职员在大学时代里养成的随意、潇洒、自得其乐，逐渐被压抑住了。况且在公司的工作时间又是那么漫长（说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实际则远远超过八小时，还别说特殊的加班加点），甚至有时公休日还要与上司和同事一起活动（郊游或修学旅行），因而在公司的时间几乎就占去他们的全部时间。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仅仅是供睡觉与休息用的客栈。不仅如此，公司还不定期召开“发展研讨会”——围绕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等事项展开讨论。公司的研讨会不仅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常常利用“研修旅行”的形式），而且多数人还得发言。新人们更把脱颖而出机会放到公司的研讨会上，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全公司的这种“检阅”——研讨会。他们绞尽脑汁地琢磨问题，并且千方百计地试验着开出药方。而公司则正是在动员人们珍视出人头地机会的同时，把整体的科研水平也提高到新的水平。

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新职员们就要不停地学习；同时，更把公司给的学习机会视为至宝。因为这既体现公司对个人的青睐，更是个人超越别人的资本；因而在大学里并不那么认真学习的人，现在也变成“学习家”了。公司则更是把安排学习看得非常重要，因为公司是金钱社会里掏出钱的消费者，所以它不会让自己的钱白白浪费掉。他们到新职员学习的地方调查学习情况，把最终的学习成绩张榜公布，并永久地地保存作为提升、加薪的参考材料。

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意识的社会。因此，强调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制度化，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下级惧怕上级是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下属必须无条件履行直接上级的命令，这是人的金科玉律，因为这种联系是这位下属同这个集团关系的惟一体现。”公司就最体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司也要求新职员接受这种关系。于是在经过最初的研修之后，公司希望新职员能够

把等级意识渗透到自己的思想当中，而新职员也确实抱定了无条件服从上级的根本宗旨。

这样经过相当的一段时间下来，新职员对自己与自己的前进道路似乎也更明确了，由此开始的一切显得既简明扼要、又具体实在。因为干得好的，可以升迁；干得不好的，或淹没于竞争之中、或被赶出公司大门，终身至老遭遇不幸。渐渐地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公司的命令不容违背，都自觉成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当然，倘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干下来，公司职员们、特别是大公司的职员们，也是可以获得相当的待遇，退休时还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养老金。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反倒把大学里所受教育的各种不足弥补起来了。假如公司需要传统知识，或者是工作中需要“儒学”什么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切都是可以学习的。虽然，学起来“味同嚼蜡”；可公司的“蜡”则不敢不嚼，亦不敢不嚼好。一般说来，公司需要的是用知识武装的职员，远不是著书立说的学问家；因此，只要是用心学习，条件是可以达到的。可怜的只是在这种转变中，本来属于优秀品德的东西已磨灭、丧失殆尽了；可居然又把大学教育的隐患给消除了。如此之人根本不可能会对社会有影响力，因而日本教育中所谓“人的危机”，始终也不可能被表现出来。

从大学到公司是学生们从自由时代步入专制时代的巨大转变。尽管这种专制对于大学时的青春浪漫、自由松散的缺陷不无裨益；但最为根本的人的危机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只不过是改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尤其是这种转变更为触目惊心，大学教育的自由主义，在现实的公司当中竟变成标准的工具与奴隶主义。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的危机吗？不过，人们怕看到这样一个现状；因而采取用高叫危机的方式来掩盖真的“危机”。

讲这番话的是日本教育界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这种“慷慨陈词”，据说反响更小。因为公司的老板们，追求的不是职员的精神自由，以及人性的最充分的表现，而是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这里利润的杠杆，无情的专制，就是所有公司的一色旗帜。只是在这种旗帜之下的队伍，却充满了

奋斗精神与活力生机，则颇使人琢磨不透。

由“大学而公司”使日本教育的指导思想，从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印证。这里没有“新儒学”，也没有“孔孟之道”与自由幻想，这里有的只是伟大而万能的上帝——金钱主义。

日本的“战争遗族会”

在日本列岛上，如果说“创价学会”是最大的宗教政治团体，那么“战争遗族会”则就是最大的历史政治团体。

“战争遗族会”成立于一九五三年，它的前身是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厚生联盟”的参加者，均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丧生的家属。最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有关抚恤金等有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会宗旨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具有了一万多个支部、一百零四万户、三百多万人的规模之后，“遗族会”也变得愈来愈与和平、正义的精神背道而驰。首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顽固坚持“皇国史观”与“大东亚圣战”侵略有功的立场。这些人根本无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亚洲的罪恶行径，只认为他们的父辈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因而美化侵略战争。他们强烈反对将过去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更不容忍日本通过什么“不战决议”。另外，他们要求恢复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的权力，从而将那些死去的人供奉到国家的神社里，就像日本在结束战争前那样。因而他们试图翻案，仇视“盟军”曾颁布“对政治、社会和宗教自由不得限制”的备忘录与《神道指令》。因为备忘录要求社会要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国民可以对天皇、国体、政府的自由评论；《神道指令》更规定国家与神道等所有宗教的彻底分离，废除国家神道，国家和公务人员停止对神道神社的特别保护监督等。他们希望靖国神社应当作为国家神社，政府首脑也要来参拜神社，以便对战死的“英灵”表示“追悼和感谢”。他们认为如果不如此，就不能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他们自己脸上也显得无光。因此，他们疯狂反对任何形式的道歉。用日本遗族会副会长阪江的话来说，“道歉是对阵亡者的亵渎和不恭”。因为这些战死者，“他们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遗族会的势力极为强大，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是现在遗族会的会长。许多国会议员是遗族会的成员，更有不少的议

员为了讨好遗族会，为自己将来拉选票，也纷纷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由此使靖国神社里的香火不断，顶礼膜拜者不绝。

正是在日本遗族势力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公布了《有关战伤者、战死者遗族等护援法》，并且决定从同年四月一日再次追加补偿金。这样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到一九九三年为止的四十一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救援立法，向受“战争之害”的日本人（即“根据‘国家补偿的精神’，是以救济军人、军队职员或战死者的遗族为目的的”）累计支付了大约三十五兆日元补偿金。直至今，日本政府还对尚存的大约一百七十万旧军人进行补助，仅一九九六年他们就平均向每人支付九十一万二千元（约一万美元）。对那些伤残者，政府也平均向每人支付大约三百万元（约三点四万美元）。

如今日本遗族会的真正目的已经远远不是抚恤金和津贴了，而是所谓“还历史的真相”的问题了。一九九五年在日本纪念“终战五十周年”（现在他们也只承认“终战”，根本不承认“投降”或“失败”）时，以日本遗族会为主的“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的声明，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动向。这篇声明叫嚣：“终战五十周年，把真诚的感谢献给英灵，要继续陈述大东亚战争的真相。”

八月八日天皇陛下向战争死难者家属发表讲话，向许多由于战争而罹难的人的在天之灵表示深切哀悼。

在此，我们感谢天皇陛下对战死者表示的深切关怀，与此同时，我们对那些为了祖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解放而贡献出了宝贵生命，并为今日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的英灵，再次表示衷心的哀悼和感谢之情。

正如有五百零六万请愿者和签名者反对道歉决议和全国有四十七个都道府议会以过半票数通过对战死者表示哀悼和感谢的决议这件事所表明的那样，要同虚构的罪恶史观诀别，并按照自己的历史观把大东亚战争的真相传给下一代。在此我们宣誓要为完全摆脱战后一直束缚日本人精神的东京审判史观，并为把这一关键的年头变成一个新的出发点而使国民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人类已经跨入新的千年的时候，真希望和平与民主的春

天能够永驻人间。可是听到如此的声音，我们做何感想！？

今天的日本似乎已经完成了“脱亚入欧”的战略，正把“回归亚洲”与所谓“构筑亚洲新秩序”当作自己的目标而全力以赴。今天的日本好像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新的抉择。当然，日本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执政党；而它的执政党的抉择又似乎离不开“日本遗族会”。真希望他们的“遗族会”能做出理智的判断，也真希望他们在新的世纪里别再创造出新的“战争遗族会”。

战争赔款的民间索赔

一九九二年三月，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重要议案：《关于允许民间个人和民间团体向日本索要战争损失赔偿》。与此同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秘书处也收到了《议请全国人大、政协依法主张对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损害索赔权利》的议案。

当时适逢两会举行，因此采访的中外记者广泛地报道了这两份议案的有关情况。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的索赔呼声愈来愈高！

申泮文等人的议案特点，就是强调日本政府应当对侵华战争进行赔偿；虽然作为代表政府的《中日联合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权利，但这并不妨碍和限制作为民间团体与个人可以有对日索赔之权利与要求。

中国大地上的索赔之声，也传到了隔海的日本列岛。不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这一情况。虽然他们知道钱其琛外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一次强调了：“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达半个世纪之久。对于侵华战争中造成的一些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应当妥善处理。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中国政府在一九七二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作了明确表述，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所表示的，则颇耐人寻味：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但一部分中国被害者与日本的当事者接触，我们也不干涉。

日本政府和日本人重视这一情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们从中国人民的民间索赔声浪中，看到了中日两国表面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实际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还远没有解决好！日本人虽然侥幸躲过了赔偿，占了便宜，但中国人民心中的那股强烈的民族情绪使他们不寒而栗。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整整十五年的侵华战争，三千五百万的人员伤亡，直接、间接达六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最后竟以轻轻的“对不起”“添麻烦”画上了句号！呜呼，难以想像！

对于日本的不深刻反省、不赔偿的恶劣行径，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表示不能接受。记得有一次与日本朋友在一起交谈，当中村女士谈到日本不赔偿的问题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罪行，绝不是赔偿所能完全解决的，原因我们都清楚。但是，假如根本就不想赔偿，或者还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侵略找各种借口，那简直就是我们日本民族的耻辱。我们只有从口头与实际上，都深刻反省并且进行完全的赔偿，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同中国和亚洲的关系。特别是我们日本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了，以为我们有钱了，所以中国和亚洲都应当对我们亲善。尤其是我们更不能觉得：你们要，我们不会给的；你们不要，那我们就更不会给的。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宽大不领情，而且得了便宜还要卖乖，那是要得罪老天的！”

日本著名律师、社会活动家内田雅敏先生在他的《战后补偿的思索》中也说道：“在实现战后补偿时，给受害者以经济补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不能把战后补偿仅仅作为经济问题来处理，同时，还要正视本国的现代史——那是一部加入列强对亚洲实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面对这一历史有必要（1）彻底调查战争受害的事实，弄清其责任所在；（2）向受害者作出诚心诚意的谢罪；（3）必须对下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我们必须理解今天向日本提出战后赔偿要求的亚洲人们真正的要求就集中在以上几条。”¹⁷

但大多数日本人以为：既然中国不要，那么我们何必再给？而且似乎也没必要再区分什么政府与民间之别了。因为不管这种没有赔偿的情况由什么历史原因造成的，反正已成事实；既然已成事实，我们还有必要再重新做什么吗？不如维持现状。至于对战争的反省，我们尽量做就是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根本就谈不到什么赔偿；不仅不应当赔偿，而且亚洲各国还应当为日本，以及日本战犯送上“解放勋章”。因为按他们的说法，“对华战争‘积极地讲是重建东亚

的序幕之战’”。这种歪曲日本侵略战争性质，从根本上否认对中国侵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错误观点，没有比崛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更典型的了。

《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与所谓“大和”的“民族生命力”：

对华战争从大局来看，同满洲事变、大东亚战争一样，都是（日本）民族生命力的表现。

这部《指导史》还歪曲整个战争的侵略性质：

近代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继而实行文化渗透的结果，终于威胁到了东亚的存在，促进了东洋的觉醒，从而产生了重建东亚的思想……亦即所谓日满联合与合作。

在战争爆发的同时，战争指导当局就英勇地举起道义解决的大旗，提倡在复兴东亚以促进东洋觉醒的基础上，建立日满华睦邻关系。

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使这部代表日本右翼势力战争观的著作，虽然出版近四十年，但依然有着相当地位与影响。

由此可见，民间索赔也肯定要走一条充满艰辛与坎坷的道路。因为无论是劳工刘连仁，还是花岗事件的幸存者，以至于那些充满痛苦的“慰安妇”，所有的民间索赔者都一无所获。但所有的索赔者都在继续努力，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索赔是惟一索赔道路。因而不管怎样，他们都必须坚持下去。

顽固的根本太郎

根本太郎是我在立体停车场打工时的同事。原来是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退休后因为不愿意干动脑筋的活儿，于是到停车场作临时工，只是按按电钮，比较轻松。根本那年六十五岁，他身材高大，五官也显得较为清秀，说话文雅，和和气气。表面上看根本不像是那种疯狂的、坚持侵略立场的“鬼子兵”。

根本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到中国华北前线的，正赶上日本侵略者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刚刚高中毕业的根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兵的残忍、狠毒，以及华北人民抗战的坚忍。他恨老百姓的抵抗，恨八路军的游击，他觉得如果中国人不抵抗了，那么日本人就不必再打仗了。后来，他又随侵略军到过中国的杭州、苏州，至今记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再以后他又到了中国的东北，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根本于一九四五年底回到日本，当了一年的“浪人”就考上一所师范性质的大学学习生物。毕业后，根本先是在熊本县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又曾任过东京都内一所专门高中的校长，一直到一九八五年退休。

根本虽然只当过三年兵，打过大小十来次仗，但他自己却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盟军”占领时由于害怕，一直小心翼翼，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小兵的身份，真的掺和起来也没意思，所以倒没显出什么。谈到对战争的认识，对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战犯，他都不觉得有什么。因为他认为：反正日本失败了，你美国怎么审判我，我也只有挨着，没办法。至于说承认日本侵略有罪，那根本就没想过。一切都是胜利者的天下，没有失败者说话的份儿。谁知几十年之后，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日本人鸟枪换炮了！可以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了，甚至有时还可以斗胆说几声“不”！这可真是先前那些顽固的法西斯分子作梦都不敢想的！于是当年被打怕的恨和恐惧，竟也随着经济的冒泡跳了出来。根本开始有些忘乎所以了。又加上当年官阶高的死硬分子几乎都死光了，小兵现在也正经可以算草算豆了，

于是原本已经不胡思乱想的根本，也不想安稳度日了。他先是把退休金拿出来作经费，和几位昔日的“战友”组织了一个忆旧的小团体。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酒、聊天，一块唱日本军歌。他们还准备写作在中国的作战回忆录，题目也已经想好了，叫《八千里路云和月》。根本为自己能想出来用岳飞的词，作自己回忆录的题目沾沾自喜。但他有时也着实心虚，常常对朋友说，他夜里作梦，不是梦见“八路军”的地雷乱飞，就是梦见美国大兵横着枪对他喊。每每这时他便醒来汗流浹背，接下来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可害怕归害怕，白天仍旧神气活现地信口雌黄。但是，他们自己又深知，他们的这一套也没有太大的市场。因为大多数日本人都清楚自己的先人在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只是揣着清楚装糊涂，不说出来而已。况且他们以为：他们现在已经阔了，他们就应当有理。他们庆幸自己躲过了“赔偿”，占足了便宜；假如今天他们还能把铁案给翻过来，那么他们先人的所有罪恶似乎就可以更名正言顺了。所以，日本人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多半采取的都是瞪着眼睛说谎的方式。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干，因为他们只能昧却良心，除此之外别无良法。不管是冥顽不化者，还是那些“动摇者”，以至于所谓的“受蒙蔽者”，他们大都如此。所以说虽然表面上他们装得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的。他们在那里愚弄你，让你解释，让你拿出证据，把你累得找不到北。

对于根本的所作所为，我原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时间不多，上下班时的交接则多半是忙碌的，所以就更没有时间谈彼此的思想与认识什么的。然而一次偶然的“新年会”，使我有机会知道了根本的冥顽不化。

在日本“新年会”是极为盛行的。一个公司或单位如果没有开新年会，似乎一年也痛快不了。我们在停车场做临时工的四个人（只有我是中国人，其余二人与根本一样也是退休职工），本来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迎新之类的会，因为我们四个人倒班时彼此都看得见。但那一年不知为什么由老板出钱，一定也要大家都去开新年会。于是，总公司派人来替我们值班，换下我们一起去看新年会。边吃喝边说笑，本来气氛也挺好的。可是

没过多久，根本就开始唱起卡拉OK。他唱着唱着就请服务员给他找日本军歌的曲目，他还说他要高唱日本军歌给那些死去的战友听。服务员摆弄了半天没成，于是根本不高兴了。他说：“为什么不时刻准备好军歌，难道死去的英雄们不值得怀念吗？没有他们，我们日本能有今天吗？我们不能自己过上好日子就把那些牺牲者忘了！”服务员一时感到愕然，他不明白根本这是要干什么；而同去的另外两个日本人则一边劝阻根本，一边尴尬地看着愤怒的我。

这之后我与根本几乎没再见过面，因为怕我们冲突，排班时就把我们给岔开。与我常交接班的牧野还特意替根本捎话说：那天他那样做并不是故意对着我的。他还说他是日本的旧军人，他们是跟我们上一辈的人打交道记仇的；但他们对中国的年轻人没有敌意，所以他希望我别恨他。我也请牧野转告他：我永远都不会饶恕他！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根本太郎在他们的一次小团体聚会中贪杯而中风偏瘫。虽然侥幸活了过来，但永远也说不出话和站不起来了！像根本这样冥顽不化的“鬼子兵”，看来只有带着花岗岩样的头脑去见上帝了。对这些仅剩不多的死硬顽固分子似不必过虑，而要警惕的是那些新的死硬顽固分子！

不协调的声音

公元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经历了八年（东北地区十五年）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我们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上，这是个奇迹！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是以胜利而告结束的！我们怎么能不兴奋、不引吭高歌呢！因此，我非常理解我们的先人们在欢呼这一胜利时的心情。

光阴荏苒，五十年过去了。一九九五年的八月十五日，我是在日本的东京度过的。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他们对“败战”的“纪念”。

一进入一九九五年，特别是一进入八月份，日本的报刊和电视等各种媒体的“纪念”就连篇累牍地开始了。客观地说，虽然多种多样的“终战纪念”各有各的不同，但强调日本是“原子弹的惟一受害者”的内容，则是最为突出的。至于日本“应当彻底反省战争责任”，日本“应当向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谢罪”的内容则不是很多。要知道整个日本朝野争论了半天，主张不通过“不战议案”的保守势力竟然有占上风之势，最后只得勉强通过了仅三百余字，却又含混不清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不仅如此，“纪念”当中还有着强烈的别种声音。这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所编辑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之出版。

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历史研究委员会”并不是什么民间团体，而是由一百零五个日本众参两院议员所组成的堂而皇之的政府行为机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前身是自民党的“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遗属议员协议会”和“大家一同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三团体。这三个团体的议员早在一九九三年的八月十二日，即新首相细川护熙答记者问的第二天，就针对细川所说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召开紧急会议，交换情况，磋商意见。并且，他们还就细川所承认“侵

略”的“不当”与所谓“过失”，向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样到八月二十三日，仅经过十天的紧急运作，便正式成立了以三团体正副会长、顾问为骨干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历史研究委员会”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成立的自民党“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公开宣称日本“不能忘记期待日本自存自卫与亚洲和平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二百多万战死者”；并且威胁说：如果日本国会通过了承认日本侵略的“不战决议”，那么将“给先人们的努力和名誉抹黑，使我们永远被扣上残暴无道民族的帽子”。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活动，就成为他们的主要的任务与基本宗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一九八六年中曾根内阁时曾因否认侵略战争而辞职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一九八八年竹下登内阁时也曾因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罪行而辞职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顾问。而这个委员会秘书长（事务局长）则是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被处以极刑的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本正。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其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导致日本失败，并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皇国史观”。因此，《总结》的歪曲历史事实，颠倒黑白，也就不言而喻了。他们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罪恶，说成是一场“解放殖民地的伟大战争”，是“日本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的国际贡献”。“日本毫无侵略中国的意图”，“芦沟桥事变”是“中国人先打了第一枪”。而惨绝人寰、屠杀三十万平民的“南京大屠杀”也被认为是“虚构的”，“日军进入南京，既未发生一起火灾，也未发生交战，到处是一片和平景象”，所有的南京市民们“全体平安无恙”。不仅如此，这部《总结》甚至否认日本当初无条件投降的历史事实，以为《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只是“日本军的无条件的投降”，而并非“日本国无条件的投降”。对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他们更是大放厥词，污蔑所谓的审判“只不过是单纯的复仇仪式而已”；审判所反映的纯粹是战胜国的意志，因而它是既不公正的，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如此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能够出版，深刻说明了日本

翻案势力的强大：所谓“有五百零六万请愿者和签名者反对道歉决议和全国有四十七个都道府县议会以过半票数通过对战死者表示哀悼和感谢的决议”本身就不容忽视。同时，被认为是右派势力的代表者——自民党，他们不仅党员人手一册，而且竟有六百零五名议员，出席《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出版发行纪念会。据此，人们也就更加清楚日本社会里所有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现象的深刻思想根源。

我们在靖国神社前的广场，又看到了昔日杀气腾腾的魔鬼，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气焰尤为嚣张！高举着太阳旗，肩扛着三八大盖枪，迈着正步，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岁月的巨轮曾经把那些倒行逆施者碾得粉碎，但是，仅仅过去五十年的时光，他们的同类就又忘记昔日惨痛的教训，意欲重蹈覆辙。我站在新宿车站的广场上，以及涉谷的街道旁，看到那些缺胳膊、短腿的伤兵，他们也疯狂地表演着。他们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哀怨放到心上，也更没有把民族的不幸与痛苦放在心上。在他们的意识里，正是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使他们的“人生价值”、梦想与光荣，都得到了实现！在这里，我闻到了飘来的阵阵血腥；我的心在为自己的民族垂泣感伤、激烈壮怀！说真的，我的心也在为我面对的这个民族而悲哀。他们中的有些人竟是如此的信义全无、天良难再！

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日本却用他们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发出翻案的叫嚣！这种叫嚣的声音，是与人类和平、正义不协调的声音！

读《日本人》和听日本人骂他们的政治家

在日本这个岛国上，读美国打油诗大家——那施的《日本人》，真是感慨良多！那施简直绝妙透顶，浑身上下显着灵气！

日本人

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
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
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的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
他咧嘴笑，然后友善的鞠躬，
“真抱歉，现在这里是我的园庭。”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会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那施打油诗的含义。日本人的疆域明明就是他们自己固有的几个岛屿，可他们却偏偏要到中国、到亚洲来“开拓”疆土。日本在强占中国的东北，并扶植起傀儡的伪满洲国之后，就把整个的中国东北当作自己的又一块“岛屿”。因为无论是对昔日的侵略者，还是对今日的翻案者而言，中国的东北都已经不再属于中华民族，而是归他们所有。“确实，把中国的满洲作为‘日本生命线’的主张，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侵略主义。”“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满洲事变当时，日本已经在那里拥有条约上的‘特殊地位’。”所以，侵略、掠夺的罪恶就变成了“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命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日本人在出动大量军队的同时，还派出了他们以农民为主的“开拓团”来开发中国的东北！甚至有些人士干脆建议把中国东北改名为“满洲道”，成为日本的另一个“北海道”。那位参与策划侵略阴谋的本庄繁，在

“九·一八”之后（之前本庄氏曾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并且还“私交甚好”）竟以东北地区新主人的身份退还张学良的个人家产！

那施的诗虽然是写于几十年前的，但至今读起来并不觉得有那么遥远。

在日本听有些比较激烈的日本人谈他们的社会、骂他们的政治家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特别是其中的言论还不乏真知灼见，他们或以激昂慷慨的态度来抒发，或以颇具哲理的语言来表达，总之，给人的感觉是自成体系，有血有肉。

整个日本社会，就像是一架被金钱这个杠杆支撑着的、巨大而高速运转的机器。机器的魔力与魅力，在各行各业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政治家队伍亦不免被其侵害而蒙灾难。或者可以这样说，政治家队伍的腐败堕落，又恰好更进一步地刺激了金钱的魔力与魅力，使之无往而不胜。随着一连串金钱丑闻的相继曝光，可又莫名其妙地不了了之，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政治混乱之真实写照。人民对于政治家已经彻底绝望，因为今日之政治家似乎已经到了不知信义为何物的程度。他们中的堕落者，被斥之为“言而无信的贪婪者”是恰如其分的。

一位具有否定精神的哲学研究者是这样概括他们的政治家队伍的。

日本的政治家都是职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把从事的“政治”当作一种职业来对待的。而既然是一种职业，那就当然带有职业性的特点。日本政治的最大职业特点，或许就是存在于其中的金钱色彩。这些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什么理想信念，也不是什么愿望追求，而是个人的无尽欲望与集团的利益需求。于是，“政治献金”“政治捐款”的丑闻便频频发生，而政治家接受贿赂、出卖灵魂的事件也络绎不绝。从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到竹下登的里库路特，再到金丸信等等，包括这些顶级领袖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与金钱丑闻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断有的政治家坠入金钱丑闻的深潭，但仍有众多的政治家不惜牺牲自己的命运前途，追逐金钱，乐此不倦。不过处在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金钱社会里，也确实更可以感受的

“政治”职业带有的强烈金钱色彩。因为金钱可以收买政治，金钱可以让政治做出妥协。因此，奔走于各处权贵者门庭中的公关专家，他们只要把自己的进攻炮弹——日（本）元准备好就可以。谁能相信呢，在朗朗乾坤之下，公关家们手提的纸口袋中，却放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日元。当然还有大手笔，动辄就是高达数十亿日元的受贿案也层出不穷，只不过主角又换成更冠冕堂皇者而已！而制度的作为，也是非常有限的。我记得大概是金丸信经济案件吧，最后仅以罚款三十万日元而了事！涉及几十亿、上百亿日元的政治家经济丑闻，就以如此结果而告结束，怎么能让国民信服呢！我的一个朋友是从事个体经营的小业主，愤怒的他简直就不知说什么才好。“这要是我们，不把你弄得倾家破产才怪呢。三十万罚款，对他们而言就好像用百元硬币买一罐乌龙茶！和这些政治家相比，我们真没有活头儿！你一辈子的辛勤所得，恐怕也抵不上人家接受的一个小纸袋！这种政治和政治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放眼望去，平庸居多；倾耳听之，信口开河。举止形象则猥琐不堪，令人难以忍受，全无风度气质可言。内心被铜臭腐蚀至极的家伙，不是非法公司的老板，也不是黑社会的老大，更不是街头懒洋洋晒太阳的乞丐，而是我们今日的所谓的政治家。

一位不乏诗人气质的教授，又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政治家队伍的。

日本人对他们政治家的风度、气质上的绝望，似乎比金钱政治更甚。这不仅因为有相当的一批政治家，其道德操守差劲，有的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更因为即便是道德操守过得去的，但其举止言行，也一点没有个人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在有些外交场合，日本政治家的形象举止，有时简直不能容忍。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时，由于紧张劳累在宴会上晕倒，但当抢救过来后，仍然谈笑风生。这给日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一位做教师的朋友，深有感触地说：“美国总统倒下，再起来还能让人不讨厌，这不能不说是人家的气质精神好的原因。我们的政治家平时就像人家躺在地上一样，让人觉得那么不愉快；可人家是躺下还能起来，我们的政治家则好像永远也起不来！”

虽然说日本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中，也屡屡谈到他们的政治家需要有人格魅力的问题，但收效如何则不得而知。可据说，持与哲学研究者和教授相同观点的人，有为数愈来愈多之势。

新年的争论（上）

一九九一年的新年，我和夫人到一位日本先生的家中拜年，并请先生一家和他的几个学生一道欣赏我的“正月料理”。这是一位相知很深的老先生，那时他还未退休，正在一所有名的大学哲学文学科，主讲中国哲学史和近代中国思想史。那天晚上，本来气氛是极为融洽的，一边是频频举杯贺新年，一边是上下古今高谈阔论。更加上先生一家和他的几个学生都会说中国话，于是一会儿是日语，一会儿是汉语，都谈得极为高兴，其乐融融，欢欣酣畅。然而一场争论、一场激烈的新年争论，使整个气氛改变了。

争论是由我夫人在不久前所作的一次演讲，即《关于鲁迅先生的生死观》而引发的。

“鲁迅的生死，他的生死观，都只是他个人的事。如果把鲁迅的生死与民族和国家联系起来，那就没有意义了。鲁迅是为个人而生，为个人而死；更因他是文学家，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业，与国家和民族根本无关。”先生是这样评价我夫人的讲演。

“先生所说只是您个人的看法，也许不无道理。可是鲁迅作品中那强烈的忧国忧民色彩，那种矢志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自己的诗，并不是我硬加给他的一种评价。”夫人这样答道。

“你要知道，文学是个人的事。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感受，他自己的生和死，那才是真正的文学。总是强调民族呀、国家呀，那是共产党的宣传，不是鲁迅作品的事，更不是鲁迅作品的作用。”

“鲁迅作品所表达的当然是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思想。同时，鲁迅的感受，鲁迅的思想，又是作为爱国者、思想者的心灵记录下来出现、表达的，这也是事实。当鲁迅把自己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爱与思考，熔铸到他的创作当中的时候，他的作品确实又起到了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当时，中国的

许多年轻人，就是在鲁迅作品的感召下，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浪潮当中的。这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宣传，而是一种历史的实际情况。另外，鲁迅先生是文学家，但文学又是与时代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鲁迅先生从来是作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奋斗的先行者形象之一而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他的奋斗也是始终与苦难的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作品极为鲜明地反映着历史时代，他本人也为改造我们中华民族而贡献出自己毕生精力和生命。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才把写有‘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鲁迅先生的身上。”我夫人又是这样回答道。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文学传统的民族。从最早的《诗经》时代起，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诗人的使命感，就给后人以极大的影响。即便是浪漫派诗人的作品，诗人也同样是把国家与民族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像伟大的屈原，他可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但他的追求始终是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国家利益永远是高于个人利益的；‘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乡，更不能离开忧患之中的黎民苍生。唐代的杜甫，把这种精神发扬至极了。他于艰难之中，于贫病交加之际，所想所念的还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因而获得了后世人的特殊尊敬。鲁迅先生也是如此，他继承并且发扬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因而他的一切，不论是生死观，或是什么别的，都有着古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闪光。这种情形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所致，这恐怕是不能与日本的私小说相提并论的。”我于此时补充了这一点。

“你们的这种看法，只局限国家和民族是不行的。要把作家看成是‘地球人’，不能总是想着‘我是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此时先生有意将话题岔开，显然是对我们平素的言谈有意见。

“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当然是不够的，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但是先生别忘记，即使是地球人，那么每个地球人的存在，也还是离不开相对的具体位置吧？”

像川端康成，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讲演题目是《我美丽的日本》，而不是《我美丽的阿非利加》，或《我美丽的巴塞罗那》。因此，我觉得先生也不应只从作家个人，地球人的事先界定的角度出发，更应当把作家的作品的实际作为出发点。”我微笑着对他说，算是对他极力称赞川端康成的一个小小的回答。

“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有我的观点。我觉得应该从更高的、更深的层次上研究鲁迅，那么个人主义是一把有用的钥匙。”

“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先生所说的更深、更高的层次，这当然是我所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个人主义这把钥匙能否是惟一的，我则不敢苟同。”我的夫人这样回答说。

至此，关于鲁迅文学的争论，暂告一段落。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是一场更激烈、更尖锐的争论：关于战争与历史的。话题是从张学良将军答日本记者谈话而引起的。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八日前后，日本的国家电视台，即NHK，接连在晚上九至十点的黄金时间里，播放了张学良将军在台湾寓所里与日本记者的谈话录相，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张学良的谈话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可以对张学良个人经历有一些新认识，譬如他原来是想当一名医生的，这个我不知道。至于沈阳事变，以及当时的日中关系等等问题，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参考价值。梁先生，您看了吗？您听懂了吗？（因张学良谈话全被翻译成日语，由播音员播出，张先生谈话的声音只是偶尔出现一点儿）您以为如何？”先生的一个学生这样发问道。

“当时我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一位朋友根据录相，又给我大概讲解了一些。中文材料，我至今尚未见到。我觉得张学良先生是实在的，他作为仅存的当时亲历者之一，任何叙述都是有极大的参考研究价值。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新’是指的什么？您又是根据什么认为谈话没有新的参考价值？”

“原来我想张先生可能会把沈阳事变的情况讲得更多、更细些，那样也许会改变目前对于事变的有些看法。或许可以开拓出更新的研究局面。可他没讲这些。尽管如此，我以为他讲

的情况是真实的，是历史。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那就是说，‘九·一八’不能算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应当是‘芦沟桥事变’，即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有的事情，就应当承认；没有的事情，就不应当承认，这是基本点。像南京大屠杀，这是事实，就应当承认，石原慎太郎说没有，那是他的胡说八道。可没有的，也不能承认。你们中国总是说日本侵略始自‘九·一八’，我就想不通。”

先生没有让他的学生说话，而是自己站出来申明了。

“那么九·一八事变，据先生的看法算是什么呢？”我耐着性子发问。

“那是因大豆纠纷而引起的结果，是少数军人的莽撞行事的偶然。其中原因很多，牵涉到满洲国独立的问题，比较复杂。外务省保留了许多文件，都表明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独立的内在关系。”

“先生，满洲国从来就不能算作一个独立国家，它只是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傀儡，一个阴谋的流产儿。满洲的东北三省，虽然是清朝祖宗的发祥地，是他们兴邦立国的根据地，可从来都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着的。对此日本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所以说，‘满洲与中国的关系’这样的命题，只是少数日本人的心怀叵测的命题。这不足为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溥仪复辟的野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从来都是纳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阴谋当中的。而且九·一八事变在前，所谓的‘满洲国’在后，这中间除去日本的赤裸裸的侵略与阴谋之外，似乎不存在什么内在的因素。另外，我也想提请先生注意，您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日本人没有权利，堂而皇之的谈‘九·一八’算不算侵略，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这是历史，这是事实，我们不是在讨论第三国的问题。那么，面对历史，除去对历史看法的问题之外，还应当首先把道义、公正的眼光考虑在内，也就是说应当有一定的道德水平与资格。如若没有这种先决的条件，随便一个日本人来与中国人谈历史与战争问题是不合适的。更不用说，先抱住一个什么‘不是’‘不算’的主观尺度，来评说如此巨大的历

史命题。”

“我强调的是：满洲国的建立是很复杂的问题，日本外务省保留了许多文件，你们大陆中国人是没有看到过的。看到之后，你也许会改变看法，就此问题我不想和你多谈。”

“真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吗？如果有，恐怕日本早就公之于众了，不会让它们埋没这么久。还有，这些文件被外务省精心保留着，我觉得或许更可以说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试图灭亡中国的。应当看到，九·一八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正是日本企图实现所谓：‘欲征服亚洲，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先征服蒙满’，这样既定国策的中间一环。特别是联系到后来的整个战争，就更可以看到九·一八是对这种‘国策’的最明显的诠释。如若说到这些文件，那么只能证明这样一点，那就是有些人从一开始，就预感到阴谋将会失败，所以才把中国内部的某些可供将来口实之用的材料精心加以保留，以便作为抵赖的依据。从历史上看，许多侵略者，往往是利用内外勾结的方法，因此即便是有些像先生所说的‘可改变看法’的东西存在，也不足以说明巨大的历史本质问题。所以，先生似乎不必过分夸张强调外务省的那些文件，因为只要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的话，其结果未必有像先生所预期的那样，或许还是先生所始料不及的。暂且不表其他，就说这次张学良将军的谈话，不是又一次地清楚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阴谋诡计吗？对此，我不知先生更重视哪个？还有，先生对张将军的谈话，还有什么高见，这我也想知道。”

“张学良先生谈的东西是历史、是事实，对此我不说什么。但我还要强调的是另一点，也就是说九·一八是历史造成的；具体地说是日本乘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各个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瓜分的余绪，所进行的一次行动。日本只是加入到这种瓜分当中而已，所以它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中国侵略的开始。”

“先生所说的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浪潮，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境遇加深了这是事实；但这种瓜分也是被作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载入历史记录当中的吧！这应当

说是没错的吧！那么先生何来只是乘所谓余绪的感慨呢！另外，还应当看到，这种瓜分至本世纪初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或最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大致告一段落。而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制造的九·一八阴谋，是侵略中国，试图征服亚洲的序幕，从日后的战争发展来看，它也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脉相承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远东阴谋，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划分到上个世纪末的瓜分浪潮当中的。全世界范围的第二次大战，在亚洲是从日本九·一八侵略中国东北开始。全面讨论研究上个世纪末的殖民主义瓜分，以及所引起的各种结果，全面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问题，这些或许是复杂的。然而，确定九·一八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

“你读过甘地论殖民地的文章吗？印度和中国差不多，所以中国应当吸取印度方式中的有益启示，对殖民地有一个比较完整而正确的认识。另外，中国人仇恨日本是不正常的。英美及其他国家，都是殖民弱小国家、瓜分世界范围，可是从未见英美人对此道歉；那么为什么要让日本对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不止呢？”

“先生此言太差矣。刚才先生还强调地球人如何如何，可现在为什么又口口声声是日本人如何如何？难道所谓地球人，只是‘口诛’之用的吗？此其一。

“从来的殖民地侵略，都是一种罪恶，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这种殖民罪恶是被当作灭绝人性，被当作罪孽深重而被书之于史的；那些殖民主义头子，也是作为刽子手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中国人民对于任何殖民主义都是深恶痛绝，更不用说是亲历其苦的。不劳您的提醒，我们中国人民对于殖民侵略罪恶的仇恨，是心中永远扑不灭的火焰。此其二。

“日本侵略中国，我指的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侵略，并非只是单纯地上承十九世纪末期的殖民主义瓜分中国的余绪，此中界线是分明的，前边我已经说明。先生还没有否认侵略吧！假如退一步讲，就依先生之见，侵略是从‘七·七’开始的，那么这两者之间，即‘九·一八’与‘七·七’，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吗？也还是侵略吧！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地闪过这

中间几年，难道就真如先生所言是另有原因吗？说穿了，无非是减少年数，五十步与百步就真有如此之遥吗？那么为什么表面上承认，可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退到那么远呢？此其三。

“至于说到仇恨的不正常，那不是中国人的不正常，而是日本人的太不正常！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本投降，这十五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的残忍、酷烈程度，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像先生所承认的南京大屠杀，像东北地区的日本细菌部队的罪恶，像在广大平原地区所制造的无人区政策，哪一桩的罪恶不是罄竹难书呢？日本侵略者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不认识、不反省、不赔偿，这就正常、不特殊？而中国人民遭受凌辱、蹂躏、被屠杀，反而不正常、特殊。如此这般，那我问先生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良知？这成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我都承认，我觉得日本政府应当赔罪、赔偿，应当连利息都加在一起赔偿中国人民的损失，以洗我们先人的罪恶。我只是说，你们应当参考印度方式。”

“先生，就是赔偿了，可那些死难的人却不能复活了。因此，赔偿并不是惟一表示反省的方式，但它毕竟是一种惩罚的有效方式。日本人也不要以为，金钱可以洗去先人的罪恶。罪恶是罪恶，金钱是对中国人民损失的赔偿。当前这种诸多不正常，我看正是由于日本人没有赔偿的原因。你们日本人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吃着苦头。没有苦头，必然是健忘的。再有，我还要问先生了，你凭什么要我们采取印度方式呢？且不说印度方式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适合不适合中国；就是从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来看，你似乎也不应该把某种方式认为是中国应当采取的。我认为倒是日本更应当采取德国方式，来进行对战争的反省，对周围国家的赔罪。这种方式我以为是日本惟一应当采取的。可日本人并没有采取必须采取的方式，那么有什么理由要中国人来采取印度方式呢？另外，我还要重申的是：中国人民是反抗侵略的人民，凡是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中国人民都会对之有刻骨铭心般的仇恨。但是，中国又是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极为大度，且勇于开创。如果日本政府真像先生所说的那样，反省和赔偿都做得很充分，中国人民还会那么

斤斤计较吗？先生博学，应当知道鲁迅先生的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请先生体味一下，鲁迅先生的诗有何等的襟怀，何等的度量。对此，难道日本人只能说同踩人家脚一样的‘对不起’吗？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我无端将先生的父亲杀死，而我只说一句‘对不起’‘添麻烦’，或者连这句话也不说，那能算完事了吗？完得了吗？同样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民，可连这样一句话都不说，或者都言不由衷地说，能算完事？完得了事吗？不仅如此，还要挑剔对方应当如此，不应当如此，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先生就以为这样合适？”

一时间，室中的空气像冻住一般，周围的一切也显得特别安静。

“中国圣贤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不忘’中的含义，那‘为师’的缘由，难道在座的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学的诸位先生们，都理解不了吗？”

“你太激动，也太能说。我所说的甘地的文章，你还是应当看看。”

“您所说的我一定学习拜读。但是，倘若我阅读后，仍不能达到您要求的尺度，那也请您别介意。”

“你太善于辞令，我们私下讨论，你不必采取同政府相同的论调。那没意思。”

“先生，你不必以没意思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承蒙您的夸奖，我还不是外交家，并且我所说的，也不是根据政府的文告。我只是个学生，普通的学生，只是根据我的所学同您来讨论问题的。您如果以为我的看法，同我们政府的相一致；那只能表明人民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是中国人，我追求真理，我尊重历史事实；只是我现在还成为不了您心目中的‘地球人’。”

又是一阵沉默。师母的殷勤劝酒，似乎冲淡了一些争论的色彩。

“日本政府协助当时的中国地方势力，也做了些好事，这也是事实吧，比如修建南满铁路。说实话，九·一八的发生，还有日本想保护南满铁路的成分。对此，中国人研究得不够。”

“先生，过去的所谓协助，‘做好事’，我想是不能与今天的合资，共同开发相提并论的吧！就中的根由，先生不会不知道。至于说保护南满铁路，则尤为荒诞不经。试问先生，南满铁路是修在东京至大阪之间？还是修在横滨至名古屋之间？那是修筑在中国大地之上的吧！日本在侵略之前，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渗透，掠夺中国的资源以及财富，并且还总以此为契机，肆意为侵略张目。当进行侵略时，又以此作为借口，屠杀中国人民。时隔几十年，先生还认为是理由，也太过分了吧！”

“我说你缺少历史观点。”先生表示了极大的不快。接着又说：“今天世界上许多人，就知道日本有钱，于是就拼命希望日本人花钱、投资，把日本人当成有钱的动物，而根本不把日本人当回事。中国人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吧！”

“先生既说到这里，我又有不同的看法。日本人的形象，假如正像先生所言，那恐怕也还是由日本人本身造成的吧！一个人的形象，一个国家的形象，难道不是自己表演的结果吗？难道是别人硬加在他们身上的吗？如果日本人的形象真到了像先生所说的那样的程度，那么改变这一形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日本人自己通过努力，改弦更张，多作些有利于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的善举。如果相反，已知自己的形象不够美好，却不思改变，而只是一味地申斥于人，这恐怕不是好办法。其实与先生说了半天，日本人的认罪，赔偿的这些所作所为，对于亚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至多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对于日本人民改变自己的形象，倒是最明智与最切实际的一种选择。我真希望日本人对此能够有所动作！那样的话，将来地球人的境界或许倒会有些希望。”

话至于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沉默是外表，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是浪涛汹涌的。在这万家灯火，喜迎新年之际，如此这样的一场争论是显得多么不协调呀！然而它又是如此鲜明而真实的客观存在！但愿能像常说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向更美好的方面变化。但是我愿意再加上这样一句，是否能更具有现实意义。这句话是：

记下吧，记下我们应当记下的；

忘却吧，这可要看我们能忘却多少，以及怎样忘却！

新年的争论（下）

与先生的“新年争论”之后，我在比较固定的师友圈内，一般都高悬“免战牌”，所谓“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因为一谈就打，多谈便觉无益。只是在极少数的几个朋友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正义感与真正的责任心；让我觉得他们的可贵之处，似乎还有些地球人的味道。至少他们的思想方法，还能让人接受。于是，如此这般地“维持治安”，平静了数年。谁承想又恰是新年，同我的一个“学生”又发生了争论，结果当然又是不欢而散。说是“学生”，其实是一位女长者；只不过她跟我学习中文就是了。

岗田女士原来是国家高级公务员，当时六十六岁，已退休了多年。为了发挥“余热”，岗田和几个朋友，合伙开着一家不算太大的公司，经营旅游、饭店装潢等业务。由于工作量不大，岗田女士很是清闲；又因为她一直独身，且有不低的养老保险金，房子又早已买到了手，故而或是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或是出外旅游，极为优哉。岗田女士曾在中国一所著名大学里留过学，以其年岁大，学习刻苦而广为人知（当时她已经六十岁）。未退休之前，她曾给一位女国会议员当了十余年的政治秘书，到过中国几次。她虽然当时中文说得不算太好，但读写能力极强。退休之后的学习及留学的一年半，使她的会话能力也大为提高。她曾经在半年内，手抄五大本讲义，即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吓坏了同时留学的日本年轻人。岗田女士能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而且字正腔圆，颇使中国人感到惊讶。她在东京的一所著名中文学校上过课，但那里的几位中文老师似乎都不能对付她，于是他们便经过介绍，找我来教岗田女士中文。

初见岗田女士，确实吓人一跳，她的中文发音，几乎无懈可击。如此高龄，能把中文会话学成这般程度，不能不让人敬佩。岗田女士稳健深沉，情感很充实，人也极好，只是太厉害，

概念中那种能干的女强人的作风和特点，她都一应俱全。

岗田女士的学习内容，由她自行选择，几乎是她喜欢什么，就学什么。第一次她选的是巴金《随想录》中的《怀念肖珊》一篇，古文则是《孟子》中的“舜发于犬亩之间。”我圆满地把课上了下来，回答了她所有的提问。有些回答可能是岗田女士意料之外的，我看到她由衷的敬服之情，并且很简捷地记在她的大本子上。课上过之后，她请我稍坐片刻，急忙走进自己的卧室。不大一会儿，她手捧着一只白色大信封又出来了。她轻轻地说：“您这么好的老师教我，我特别感谢。但我没有更大的力量，因此也不可能给您更高的工资，非常抱歉。”然后是一个大鞠躬，几乎是一躬到底的。这是日本人习惯，他们把报酬放入信封内，以所谓“谢礼”的名义，付给应该给的人。虽然，岗田女士声称对不起我，不能再给高的报酬了；但信封中的钱数，还是超过了事先订好的数目。我猜想，岗田刚才走进卧室，是往本来已放好钱的信封中，又加上了新的数目。

就这样从夏天开始，大约在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已读完了《随想录》中不少文章，《论语》也学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岗田很愉快，每周两个晚上的学习，不仅几乎没有耽误过，而且她还极认真地准备。我也很高兴。说实在话，自到达日本之后，除去自学之外，如此比较正规地上有些深度和分量的课，还是不多见的。“温故知新”与“教学相长”的效果，我算是又一次领略到了。岗田的兴奋有时是掩饰不住的，为了自己学习上的进步，她竟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大笑。所以在新年将近之际，她特意约我的一家，无论如何在新年时到她家作一次客。我推辞再三而未允，于是就答应了。考虑到岗田女士一个人清静惯了，就事先请朋友帮我们看管孩子，怕孩子去会使她太紧张。临到约定的日子，我夫人因学校有急事，故而打电话给岗田女士道歉，结果只由我一个作全权代表了。岗田女士倒也没挑礼，实际上她还是清静惯了，怕麻烦，约请我全家主要还是为了礼貌吧！

互送礼品，共道新年安好之类的客套话后，不愉快的事又发生了。

话题是从一本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而引起的。日本某

大学的一位教授，以“世纪的谎言”为题，出版了从根本上抹煞侵略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发生的这样一本书。这位良知丧尽的“教授”，用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声称所谓南京大屠杀纯属子虚乌有。倘若作为一本极不负责任的出版物倒也罢了，有些人可却别有用心，试图炒热这本书。对此，岗田女士说道：“把日本法西斯暴行说成是‘世纪的谎言’，是没有真凭实据的。这位先生根本就没去过南京作实地考察，使用的材料也只是日本有限的资料，并且这种资料背景还有问题。因此，这种书在日本能够出版，应当说成是日本学术界的耻辱。”如果岗田女士话止于此，真是恰到好处。谁知她一下子又把话岔开去了。

“中国方面总是说，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达三十万人；还有的数量更多。这似乎不怎么准确吧？因为中国所出具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例如牺牲者名簿、以及户籍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更精确一些呢？像日本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受难者，名单、户籍等供统计之用的材料是极为准确的。中国方面所提供的这类资料，显得不够充分。”

“您的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一座城市毁灭性的屠杀、洗劫，之后又是由日本人一直占据南京，直到最后失败为止。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今天的中国政府把当时受害者的人数，搞得像今天人口普查材料一模一样，这是没有道理的。另外，大量流动人口曾滞留南京，这恐怕也不是能完全依户籍情况而确定的吧？对于这样一个惨案的受难者人口的统计，既得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也就是之后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强行管制，一直到最后失败为止；也还须考虑到大量的流亡者曾滞留南京的特殊情况。今天中国政府所统计的数目字，不就是长期以来所进行整理统计的结果吗？你们凭什么说这个数字不准确呢？”

“我是说你们的数字，统计数字，而不是否定这个历史事件。据日本方面统计，受难者最多也就四五万人吧！不可能再多了！”

“岗田女士，你们总是说承认大屠杀的事实，可又拼命地缩小屠杀数字。其实，既然承认了屠杀存在的话，那么依你所说的数字就能减轻罪过吗？不客气地说，你们有些人一方面承

认事实，可一方面又把数字缩小到不能再小为止，并且近而由大而小以至于无。你们的这位教授之所以敢如此颠倒黑白，其实正是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内心的看法：不反省、不认罪；或者承认侵略，但要从他们所能接受的时间算起，‘九·一八’不是侵略而是别的什么，或者承认大屠杀，却拼命缩小数字，把这场灾难轻描淡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小动作，这种不做彻底反省的恶劣作法，不仅对中国人民、亚洲人民是不负责任的，就是对日本这个民族本身来说，也未见得就有多大的好处吧！它能使日本民族更道德，更讲信义，更公正起来吗？不会，而是恰好相反！还有您所说的广岛、长崎如何如何，这是绝对不能与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无辜百姓的疯狂屠杀、残害，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结果。没有日本人惨无人道的侵略屠杀，怎么会有所谓的‘原爆’呢？如此的‘因果’是不能颠倒与等同的。您所说的统计数字上的相提并论，应当说也是非常不恰当的。也许您不是这样，但日本确实有些人直至今日仍不反省自己的侵略罪行，却一味大谈特谈‘原爆’，把日本说成是‘原子弹惟一的受害者’，这种将因果、正义与道德，都抽掉的作法，目的其实是很清楚的。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最终也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当然更谈不到获得被日本侵害最深重最惨烈的中国人民的信任了。”

“您说得如此深切，又颇耸人听闻，确实值得日本人深思。但我还坚持我的意见。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统计数字的更精确，是会治愈两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那么我们各自看法最终都将会改变。”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但是，我想说您的所谓‘两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更不是确切的。因为只有日本创伤了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并未创伤日本人什么。所以，笼而统之地谈两国的所谓创伤是不合适的。还有一点，我也想再强调一下，那就是中国是被压迫、被侵略的，而日本则是压迫者、侵略者。这种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也改变不了。如此说来，倘若‘害人者’没有诚意，或者没有对基本问题的起码认识水平，而只要求受害者改变这、改变那，尽管有岁月的流逝，也是困

难的。”

结束了这方面的争论，又引起了另一方面的争论。

据岗田女士说，她的一位中国朋友，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天文专业，后来嫁给了她的日本同行。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中国女性动员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工作，他们被分配到一家有名的天文台。但是，因为这位朋友的丈夫是日本人的缘故，因此在所有的工作中都被闪在一边，不被重用。文件不用说不能看，就连一般的专业研究也不能干，惟一能做到的只是简单的日语翻译。这样持继了十几年。这对夫妇在中日邦交正常后，终于又申请返回了日本。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不可能再进入正式的研究机关，大公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先在很小的公司干了一段，由于所在的小公司破产，故而只能在有些临时性的翻译机构和日语学校打短工，工作很不如意，生活也很艰难。于是，岗田女士这样评价道：“你们中国人是不信任外国人的，尤其是不信任日本人，而日本就不是这样。”她还笑着问我：“你来了几年，应当有所体会，日本还是非常信任外国人的吧？”

“这对夫妇是确实不幸的一对，尤其是这位日本丈夫。他们愿意为新中国工作而未能遂其愿，这是比什么都更伤他们心的，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悲剧。不过这件事，除去我们各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如何结合当时具体环境来认识的问题，如果把这种具体个别的事件，放到当时历史时代背景中去考察，认识也许能更深刻些。但是，能否就这样一个例子，得出中国人不信任外国人的结论，我则不以为然。”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研究，都避开这对夫妇，特别是她的丈夫呢？”

“因秘密的原因，有些工作不便于外国人做，这似乎不难理解，就是中国人当中，也未见得都一律平等地能做任何研究工作。这里有些得具体分析，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对夫妇的经历不是一场悲剧。我来日本有几年了，据我所知，许多工作则是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外国人做的。”

“日本好得多。特别是科学资料等等，几乎都是公开的，不像中国那样神秘。”

“所谓的公开恐怕是有条件的吧？各个公司之间的所有资料，都是保密的，自己的东西，惟恐被别人所窃取，因而防范甚严。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对那位日本朋友的不公正开脱，不是，我非常同情您的这位朋友的丈夫。他和夫人为新中国的一腔热情，应当永远为我们所牢记。但是不能不承认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个阵营的存在，也成为这种悲剧的一个客观原因。不然的话，为什么当时会对苏联、中国实行禁运呢？前几年，东芝公司卖车床给苏联的事件，不还是被重罚了吗？今天尚且如此，那么当时相互防备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世界已开放到这样程度，恐怕全地球范围内也尚未达到‘不设防的境地’吧！”

“好了，这件事我们不谈了。”岗田女士尽管还是平静的，但极大的不愉快则是掩饰不住的。

“中国的当官人，不大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可下边的生活还相当悲惨。有一年，我随日本的议员代表团去中国访问，招待得我们极豪华。可是到下边参观时，我们还是看出老百姓的生活不怎么好。”岗田女士说到这里时，又把话题一转，说道：“中国人都非常爱周恩来，我最初也是如此。可是后来，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也是那次访问，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我感觉到他太了不起了。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总像是在演戏。不怎么真实可信。就是他当总理时，同田中谈判建交，声明不要日本战争赔款的。这笔赔款是大家的金钱，是日本赔偿中国人战争损失的，它能帮中国做很多的事儿。但是，这是经周恩来之口说出不要的。”

“岗田女士，我很想用中国话中不怎么客气的话对您说一声：‘住嘴！’你们日本人是没有这个资格来讲周恩来的，特别是把他同赔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镇静了一下精神，平稳了一下内心的激动，继续说下去：“您假如作为一个外国人，站在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立场上来谈论我们的政治家，并把你们个人的好恶放进去，这是你们的权利，我没有理由干涉您。但是对于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特别是把他同日本赔款放到一起谈论时，你们日本人是没有资格的。西方一位圣哲说过这样的话：对有些历史人物的缺点，只能是跪着讲。这是指一

般伟大的人物而言；具体到特殊的周恩来与日本赔款问题上，你们日本人是没有资格来对周恩来品头论足的。就中根由，你们日本人心中是应该明白的。”

饭没吃，酒也没喝，我礼貌地告别了岗田。走在张灯悬彩的大街上，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又一个新年的争论，难道只要新年相逢就要有一个争论吗？那么究竟会争论到何时呢？

这场争论后，岗田女士放弃了跟我学习中文的计划；我没有、也根本不想再与她有什么联系了。看来，彻底地放弃现在的地球上的具体位置而成为抽象的“地球人”，还远没有成为今天的时尚。又一场新年争论给我的思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而是同我前一次与先生争论后的思考大致相同的；虽然我已在日本度过了几年的时间。尽管包括岗田在内的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时间的流逝之上，但我还是坚信我的那句话：

记下吧，记下我们应该记下的；

忘却吧，这可要看我们能忘却多少，以及怎样忘却！

再见了 白山君

在东京的几年里，除去经常与学校的师友一起学习切磋而感欣慰之外，就属与白山君的一段交往让我难以忘怀的了。与白山君的相识是极为偶然的，全部的经过，后来被我们戏称为“目黑大雨奇缘”。

我兄长一位朋友到东京访问，顺便帮我捎来了一大包书籍。白天因为他们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难得空闲；于是经过几次电话商议之后，约定在一个晚上的十点半钟，由我到他们的住地去取东西。当时他们住在离目黑站（环行电车山手线）不远的一家饭店里。

六月下旬的东京，白天异常炎热，夜晚却又往往阴雨连绵。那天即是如此。我到达目黑站的时候恰好十点钟，而此时雨点开始飞落。待等我走上前往饭店的道路时，雨则由小而大，慢慢地竟至瓢泼一般。大雨中，我终于走到从地图上查定的地点。可谁知，我来回跑了四趟，却仍然没摸到门径；就在我撑住伞，再次取出写有地址的纸条、想借着街灯确认一下时，一个和蔼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

“您找什么地方？我能帮您的忙吗？”

纯正的发音、声调，虽然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人学习汉语者，但还是使我兴奋不已；因为这一下可算能有人询问了，况且还是用中文。那时，我到日本的时间还不足四个月，能说几句日文，但远不熟练。

“我想找这家旅馆，地址应当是对的；可是我找了几遍都没找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能把地址给我看看吗？”

询问者伸出一只手，这时我看到他是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他的个子不很高，脸色苍白，显得有些憔悴；但声音中却流露着热情。

“请看，这是地址。”我把纸条儿递给他。

他接过一看，就笑了起来。“哈哈，方向正好相反。因为

您找的地方是他们的‘别馆’，即中文的‘配楼’，而这里是他们的主楼；这里有一个牌子，您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那里果然有个牌子，上边画着这一带的地图，并附着这家旅馆关于“主别”的说明。“您恐怕没注意到这个地图。”他一边说着，一边又看了看手表。“这样吧，我陪您过去。反正我的家也在那个方向上。”

“这样虽然好，可是太麻烦您了。我们……”

“不必客气，您大可不必为我们刚刚相识而客气。我这也是顺‘手’推舟，不很费事。我们走吧。”

听他所引用的汉语成语我也觉得愉快，虽不甚恰切，到也着边际。于是就再一次谢过他后，跟着他走了。

这时候雷声轰鸣，大雨如注。“我们找个地方稍微躲躲雨，待雨小些时再去吧！因为反正不远了。另外，你还可以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的朋友是否在家；因为假如他们外出的话，雨太大，或许不一定能准时返回。”

我觉得他说得在理；另外，更以为大雨如此之猛，让初次相识的人领我去找，实在过意不去。于是我便说了声“好，我们避一会儿。”

我们跑进街旁的一家小咖啡店，擦干、坐定，并喝了杯热茶。他又陪我去打了电话，果然因大雨的缘故，我兄长的朋友还未返回饭店；但已给服务台来了电话，返回的时间大约要比原来推迟半小时。

“这下好了，我们可以谈一会儿话再去。我姓白山，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法律专业。现在是厨师，是做日本菜的。请多关照！”白山君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向我鞠躬，一边作自我介绍。

我也起身，一边还礼，一边把自己的姓名、何时来日、毕业学校、所学专业、现在什么学校、以及住处等等，一一对白山君言明。

“你原来是学习中国文学专业的，已经硕士毕业了，那太好了。我们交个朋友吧。另外，我还想同你作个交换：我请你教我中文，我教你日语。行吗？”白山君很高兴，原来的疲惫一扫而空。

“我在大学里学习了两年中国语。本来毕业后要去一家公司搞法律工作，还要到中国进修。可是，由于我的兄长突然病故；作为次子，我得继承家业。于是，我就只好到自己家经营的饭馆里实习，准备将来接班。为了继承家业，干什么都行，这中间是没商量的。可是，作为个人兴趣来说，我很想搞法律，也想继续学习中文。”

“没问题，我可以教你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学知识。你的发音不错，两年的时间能学到这样的程度，相当难得。你能教我日语，那太好了。你看怎么学好？你能抽出时间吗？”

“大概没关系。我刚才听你说你的住处就在池袋附近，那儿离我家的店极近。我想如果学习的话，我早出来一两个小时就是了。到时候我们再电话联系，你看如何？还有，我也不到你的家里去，那样太麻烦；我们就到外边的咖啡店，在里边学习也不错。你看行吗？说真心话，我非常高兴。如此幸运我一点也没想到！”

白山君显得很愉快。他接着又告诉我说，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开饭馆的厨师，但他们都非常喜欢中国文学。祖父和父亲虽然都不会中文，但他们把翻译过去的中国古代名著都认真学习过了。祖孙三代人还常常一起开读书会，讨论学习中所碰到的问题，并且坚持了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只是由于最近祖父身体不好，他们才暂时中断。白山君郑重地说，祖父讲“中国文学是父，日本文学是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父与子”。

就这样，短短二十分钟左右的交谈，竟使我们如同老朋友一般。及至白山君陪我取好东西，我才知道他的家根本就不在“别馆”那一带。

“目黑大雨奇缘”之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和白山君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了。我们坐在不很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开始了有计划的学习。白山君从书包中取出一个大笔记本，他说这上面记录了他们祖孙三代学习时，常常弄不清楚的问题；他诚恳地讲：“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教。”

我拿过本子看了看，就开始给白山君慢慢地讲解。白山君极用心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并且飞快地记录。遇到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时，我们就用英语，或者用笔写，直到明白

为止。虽然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安静，但并没有妨碍我们进行学习。到结束时，白山君先站起身来，向我深深地一个大鞠躬，兴致勃勃地说：“太感谢您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祖孙三人过去怎么也弄不清的，今天好了，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回去之后，我马上就向祖父、父亲好好传达，他们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就这样，我和白山君每月两次的“咖啡学习班”，坚持了大约半年之久。

最后一次的那天，白山君打电话告诉我：别到平时的咖啡馆，而要我去他工作的饭店见面。这次学习距前次，已经中断有一个多月了。电话中，白山君声音沙哑，更没有平日的欢快愉悦。我心里想：该不会有什么不幸吧！因为，据说他祖父的病情很不好，病危通知书已经早就下了。果然，见面时我发现白山君两眼通红，人也消瘦了几乎一圈。白山君用低沉的语调告诉我，他的祖父已于十天前去世了。另外，他家在加拿大投资的两家日本餐馆又濒临倒闭；他须马上到那边，亲自坐镇，再作拼搏。他说：“祖父没有了，父亲须在日本招呼、指挥一切；我就只得去那边了，因为那是海外最大的一处。倘若失败，那是很麻烦的。”停了一下，他又说：“非常感谢先生，这半年来我学到了很多，实在是受益无穷。另外，祖父逝世前，还要我代他向您谢罪，向中国人谢罪。因为战争的时候，祖父在中国呆了六年。他说那是‘恶魔一般的日夜’，为此他表示深深的忏悔。”此时的白山君掉下了眼泪。

“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国家，对你们的先人，对你们的国家，曾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恶。我们应当对你们的人民和国家，进行赔偿；并且应当连同利息加在一起赔偿。就是赔偿了，中国人民能否原谅我们还是个问题，因为那些死去的人是无法复生的。更何况现在这样，既不赔偿，又不从心底里认罪，这是天理不容的！祖父死了，他在临终前，很是想向您说这番话的；可终于没有勇气。”白山君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他没能说出来的，就让我替他讲了吧。”

白山君深深地低下了头，半天也没有抬起来。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只是紧紧地

握起了拳头。

白山君远走高飞了。我希望他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同时，我更希望他所转达的他祖父的忏悔，以及白山君对战争与历史的认识，能够成为更多的日本人的忏悔和认识。或许只有这样，两国人民的友谊才会有真正的、长长的未来！

我没再打听过白山君离别以后的情况，但我忘不了他。
再见了，白山君！

①爱弥儿·路德维格《怎样管束德国》，见安徽人民出版社《傅雷译文集》第十四卷，第六五六页。

②东京入国管理局的简称。

③铃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日本现代哲学家，尤其对禅与佛教思想的研究更为精辟。他的《禅与日本文化》已翻译成中文。

④见庞德《高狄埃——布热泽斯卡：回忆录》，转引自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第44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⑤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日本最著名的俳句诗人。他的《野田纪行》《幽深的小路》等俳文，创造出被称之为“蕉风”的新俳句风格，并对后世俳句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松尾芭蕉的很多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吟咏、喜爱。

⑥加贺千代（一七〇三——一七七五）日本著名的俳句女诗人，影响极大。

⑦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每一六七页，陶刚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初版。

⑧据考证最早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典籍当为《离骚》、《文选》、《庚信集》、《太宗文皇帝集》等，时在奈良时代（七一〇——七八四），由当时的遣唐使抄写带回。平安时代（七九四——一一九二），唐初四杰的作品、陈子昂、王维、李白、白居易、元稹及张志和等人的作品也传入日本。嵯峨天皇的《渔歌》五首（时在弘仁年间[八一〇——八二〇]，即唐宪宗元和间），就明显为模仿张志和《渔歌子》之作。

⑨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¹⁰中江兆民（一八四七——一九〇一）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与宣传家。兆民精通法语，留学法国时又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归国后他成为彻底的民权主义者，曾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民主思想的传播与党派的建立，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有“东洋卢梭”之称。

¹¹即今天东京大学法学部，当时称之为东京大学法科大学。

¹²中江丑吉毕业后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部大连任职，时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¹³中江丑吉自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起来中国，至一九四一年底因病归国前后达二十八年。

¹⁴铃江言一（一九〇〇——一九四五）是日本战前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关系最为密切的共产党员。他曾于五四前后开始与施洋、李汉俊、黄日葵、陈翰笙、胡鄂公、以及画家齐白石等联系。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杀害时，铃江也曾被张作霖通缉。据说齐白石赠画给铃江言一的题词为“赠给对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战斗的同志”。后遭日本帝国主义迫害，被捕入狱，旋又释放。一九四四年归国，一九四五年逝世。

¹⁵曹汝霖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在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屈辱的“二十一条”时，作为中国代表签字。曹早年在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时，曾借住中江家中，并得到中江兆民遗孀多方面的关照。他与中江丑吉相识也在此时。中江丑吉来到北京以后，他的住宅和生活费都是由曹汝霖提供的。据《曹汝霖回忆录》载，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曹汝霖的住宅被愤怒的示威学生所袭击，当时曹便很快躲进另外一个房间；于是恰巧在场的章宗祥便被误认为是曹汝霖而遭痛打。中江当时在场，于是他帮助章宗祥逃脱。后来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时，曹汝霖在日本军部的煽动下准备出马作汉奸。这时中江出来规劝曹，要他在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走绝路。后来证明中江的论断是正确的；为此曹汝霖对中江感激终生。一九四二年，中江逝世后，他的部分遗骨安葬在北京东直门外日本人墓地，墓碑题词便出自于曹汝霖之手。

¹⁶“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于一九〇六年，是一家包括业务部门（管理铁路、煤矿、港口等）、行政

部门（管理铁路附近属地的卫生福利、教育、文化等事务）和调查部门的垄断性殖民地公司。它从一开始就把统治南满洲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并且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整个中国大陆服务。

¹⁷内田雅敏《战后补偿的思索》，骆为龙等译，学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